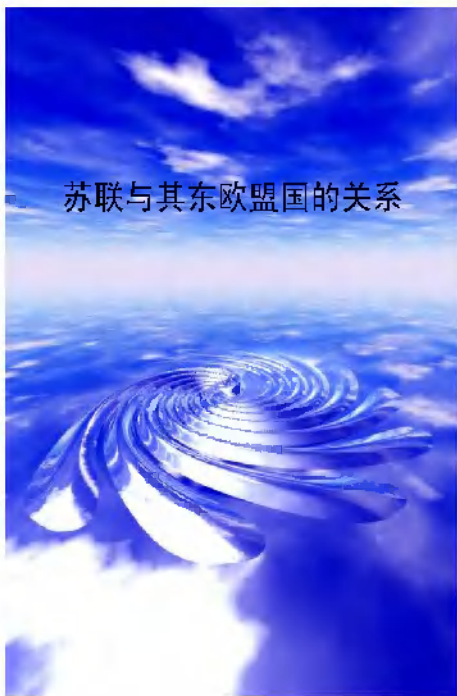


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





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

〔美〕 J. F. 布朗 著

商 正 郭济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J.F. Brown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EASTERN EUROPEAN ALLIES:
A SURVEY**

Rand Corporation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U.S.A. 1975

提 要

本书是美国兰德公司出版的一份调研报告，对1968年到1975年期间的苏联在东欧的目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此同时，又就其双边关系作了扼要的论述。作者布朗是兰德公司的顾问，慕尼黑“自由欧洲电台”的分析研究处主任。

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

(美) J. F. 布朗 著

宣 正 郭济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1/32 5印张 100千字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统一书号:3217·265 定价 0.41元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2
第一部分 苏联在东欧的目的	7
苏联对东欧的看法	7
赫鲁晓夫指导下的实验	10
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调整工作：各种触动因素	18
勃列日涅夫主持下的调整工作：目的和方法	23
全面恢复正统观念	31
团结一致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独立生存能力？	34
第二部分 苏联-东欧关系最近出现的因素和 发展情况	38
整个地区的因素和发展情况	39
经济因素	39
军事因素	44
政治和外交政策	48
意识形态上的和组织上的党务	51
与苏联的双边关系	55
保加利亚	55
捷克斯洛伐克	6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79
匈牙利	89

波兰	96
罗马尼亚	108
阿尔巴尼亚	119
东欧国家内部关系的各个方面	129
第三部分 型式、结论和预测	138
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	139
苏联国内的问题及其对东欧的影响	144
苏联的继承问题和其他问题	148
文献目录：兰德公司关于东欧的出版物	152

前 言

自从1968年苏联带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面形成以来，迄今未见有何对苏联-东欧关系进行全面分析的著作问世。本报告打算填补这一空白。它调查了1969年以来的苏联-东欧关系，剖析了苏联在东欧的目的，以及苏联为达到那些目的而奉行的政策的成败及其前景。

兰德公司有一项研究项目，对1968年以来苏联-东欧关系的军事和体制方面进行比较详尽的研究，这一工作目前正由A.罗斯·约翰逊主持进行。兰德公司有关东欧问题的出版物已开列在本报告所附的书目之内^①。论述西方盟国团结前景的《西方团结的展望》是一份与此类似的研究报告，现正由霍斯特·门德肖逊负责撰写，不日即可问世。这些出版物所报道的研究工作都是根据“兰德公司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安全问题的空军研究项目”进行的。该项研究工作广泛地考察了欧洲两个联盟体系的现状和前景，其目的在于向那些负责欧洲事务的空军计划人员提供评价资料，使他们了解现有欧洲安全安排中可能出现什么样微小的或显著的变化。

本报告的撰写人J.F.布朗是慕尼黑欧洲自由广播电台分析研究处主任，兰德公司的顾问。

^① 见本书末页。——译者

绪 论

本研究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苏联在东欧的目的，重点在于研究苏联的愿望而不是其实现的程度或实现的可能性。这一部分试图扼要地分析一下苏联对东欧的重要性有什么看法，继而探讨一下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东欧政策和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东欧政策的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别。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力求明确指出这些差别的原因。

第二部分叙述并分析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之间相互影响中的最重要的发展，特别着重讨论1969到1975年这一时期。这一部分概括地探讨了整个地区最重要的发展，以及以苏联为一方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为另一方的双边关系。

第三部分根据第二部分的材料得出结论、格局和概念，评价苏联的东欧政策或功到什么程度，认清苏联在追求这些目的时所遇到的严重障碍，最后稍稍推测一下苏联与东欧之间未来的相互影响。

这种探讨的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内容难免有些重复，并且容易使人觉得仿佛是把一个问题的那些事实上彼此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各自孤立地加以论述。例如，在分别地论述苏联的种种愿望时，它可能使人觉得好象苏联的中心计划得到了严

格执行并不断取得成功。但是，与其说是苏联的“中心计划”，还不如说是苏联的“迫切需要”较为确切，并且在执行的时候往往是暂时凑合，而不是审慎地预作安排，这一点非常突出。此外，本报告第二部分论述苏联与东欧之间地区性的和双边的关系中最近的主要发展情况，不仅着重谈到挡在苏联成功道路上的种种严重问题，而且还着重谈到东欧仍用一条名副其实的百衲被掩盖其对苏联政策的内在不满和客观上不易执行这一事实。其实，尽管苏联控制东欧二十五年以上，按照大体相似的方针彻底改造该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并把公开宣称的统一思想强加于人，但是，“东欧”一词本身仍然基本上是为了使用方便而不是表示和谐统一的名称。

第三部分至少有几分是专门想要减少第一、第二两部分所表现出来的把各个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各自孤立地论述的缺陷。它试图把苏联的愿望同显然妨碍其实现的现有和预料的问题作一番比较。最后，它希望会呈现一幅大体上铢两悉称地混杂着目的和阻力、成功和失败的明暗相当的图景，从中可以约略看出苏联和东欧关系的未来进程。

“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团结一致”这一概念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主要总目标，这个概念在本研究报告中一再论及。在这方面，“团结一致”是指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虽然由于局部条件不同而有某种程度的差别，却存在着对内对外政策的总的一致性以及苏联和东欧各自执行这些政策的同类机构。再从苏联的观点来讲，“独立生存能力”将被解释为东欧各国某种程度的自信、可靠和效率，这些性质将不断地使那里的共产党统治正统化，从而减少苏联忙于对该地区采取预防措施

的必要。

这一概念提供一个可以把全部讨论内容放进去的框框，并为以后的叙述提供有用的助力。我们在研究苏联的东欧政策的目的之后可以推断，团结一致和独立生存能力（或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团结一致）被当作苏联的必要条件或政策规定。它们是互相补充和互相影响的必要条件，按照苏联的目标来说，这两个必要条件是容分不开的，更不必说可以被看作互相排斥的了。两者不应当单独存在，两者应当协调地、和谐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苏联-东欧关系却已表明——并且我们希望这份研究报告也会表明——苏联旨在把团结一致和独立生存能力保持平衡的企图已经成为苏联在东欧处于“困境”的根源，今后也可能仍然如此。事实上，我们至今获得的证据倾向于说明，这两个目标不是互相影响和互为补充的，而往往是在实践中互相矛盾和互相排斥的。

例如，独立的生存能力在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确实开始有所发展，但是按照苏联的观点来看，它使得团结一致的精神很难维持下去，更谈不上加强了。苏联领导集团自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一直想强加给东欧的那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根据至今所掌握的证据来看，似乎不会象苏联人希望独立生存能力成为平衡发展的共存体那样的程度得到充实。

未来的事态也许最后将证明，这两个概念是不能并存的；团结一致精神确实排斥独立生存能力，反之亦然；这种共存体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之间缺乏利害关系的任何根本的关联或共

同性，这一状况固然会容许东欧国家享有为其独立生存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及为其自发的变革倾向所必需的自由，另一方面却依然维持苏联人认为其盟主地位所必不可少的那种程度的团结一致。

上文已经指出，在1948至1968年期间，苏联领导人和东欧若干领导集团——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集团——已经用迥然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团结一致和独立生存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因此导致了严重的不团结现象甚至危险的不稳定状态。这方面另一个有关的因素是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集团内部各个阶层对这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例如在苏联，甚至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战胜了“反党集团”之后，人们还会设想，纵然赫鲁晓夫认为有必要实行试验和创新以促进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东欧，也仍然有人反对的。在1968年，领导集团中间对于如何处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问题肯定有意见分歧。苏联的一些经济和技术知识分子欢迎过六十年代东欧的经济改革，他们现在也许还希望那些改革在东欧和他们本国重新出现。在非俄罗斯民族的加盟共和国，有些阶层——固然不一定是高级领导层——会欢迎东欧民族自主权的生长，希望借此推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同样发展。

在东欧，情况甚至更加复杂和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的国家各有特点并有时候存着彼此抵触的愿望。即使那些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最听话的东欧领导人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顺应这些民族愿望，至少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是如此。不大听话的领导人走得更远，以致肯定已经同苏联的团结一致

概念发生了矛盾。每一个领导集团内部对于应该争取的自主的程度如何，也有意见分歧。关于国内政策，保守派和改良派往往公开发生争执，主要是关于一些直接影响团结一致精神和独立生存能力之间平衡的问题。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令人感到难以应付，它却并不一定有损本研究报告所用的“团结一致-独立生存能力”这个框框的实用价值。它确实表明的——以及本研究报告旨在阐述的——是，既然各个东欧国家自觉地要求得到国际、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进展，苏联在使它对东欧的政策原则与东欧国家上述要求相调和时便遇到了一大堆问题，并将继续如此。到目前为止，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无论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还是从东欧的观点来看，都没有使团结一致精神和独立生存能力达到令人满意的和谐程度，反而造成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反复循环的转变。尽管苏联作出种种努力，这种双方都不满意的状况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而如果这些转变变得过分剧烈，还会在转变过程中突然在东欧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第一部分 苏联在东欧的目的

苏联对东欧的看法

在苏联看来究竟东欧有多么重要，这不是单凭一个因素可以说清楚的。的确有不少因素（其中有些是互为作用的）可以用来说明三十多年来为什么苏联对外政策优先考虑的最重要的课题也许就是如何保持和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然而已经发生变化的是，苏联先后几个领导集团在任何特定时期对这些不同因素有其重视的侧重点。

这些因素可以简单扼要地概述如下：^①

军事安全因素。 对苏联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欧的控制意味着取得了一个缓冲地带，以防西方国家可能的进攻。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冷战时期，这个因素大概是苏联领导人首先考虑的问题，在现今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军事领导人的心目中，它可能仍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在这三十年中，战争的方式和技术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在

^① 下面一些分析依据理查德·洛温撒尔“改变中的苏联政策及其所关心的问题”一文，见《苏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两国和多国》（柯德尔菲论文集第 65 号，伦敦战略研究学会 1970 年 3 月版，第 11—23 页）。这项分析工作还受影响于弗里茨·厄马恩所著《国际主义、安全和合法性：对苏联在东欧利益的挑战，1964—1968 年》（RM—5909—PR，兰德公司，圣莫尼卡，1969 年版）。

核武器时代，东欧缓冲地带的价值远不如从前区域性常规战争时代那么重要。然而，甚至在这个新时代，苏联关于核战争的军事设想还显然强调欧洲地面部队的重要性，而在有限的常规战争的情况下，地面部队的价值当然更不待言。总之，苏联今天仍旧在东欧驻军三十一个师，远远超过任何警察任务可能需要的数量，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他们是多么重视东欧这一安全地带的。

跳板因素。 在这方而，受苏联控制的东欧被看作一个基地，用来对西欧或其若干部分、特别是西德进行军事侵略或施加政治影响。当然，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已经引起激烈的争论，只要有人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个假设，他就受到有力的责难，哪怕这种责难只有几分道理甚或准确性。可是，纵然对柏林的封锁归于失败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以后苏联领导人越来越感到不容易采取武装侵略西欧的办法，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否认，以保持东欧现状为基础的对西欧的政治渗透和外交上对它的控制仍然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各时代苏联国际政策的重要目标。

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因素。 从扩大意识形态影响的观点出发，苏联人把东欧看作同苏联一起推进世界革命过程的共产党国家的先锋队。这种信念无疑地在赫鲁晓夫的思想和政策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完成苏联以世界革命为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政策方面，东欧负有特殊的任务，因为该地区的执政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要起重要的模范作用。

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因素。 这是理查德·洛温塔尔提

出的一个概念，^①它意味着苏联领导集团目前在力求使其关闭的政治制度免遭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渗透方面大部分处于守势。在这方面，与其说是把东欧看作军事缓冲地带，还不如说是把它看作意识形态缓冲地带，因此就有必要加紧对东欧的控制，并尽可能把相类的正统政治制度强加给东欧各国。使苏联感到进退两难的是，缓冲地带也是共产党改良主义思想滋生的沃土，而这种思想比任何可能从西方渗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来得危险。显然，对东欧的这种看法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来说是很突出的。

显而易见，这四个因素中的一些因素已经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三届苏联领导集团的决策，同时其他因素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来说，军事安全因素在他们对东欧的重视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跳板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差不多，虽然关于它在特定时期所占的比重如何，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把东欧看作军事侵略的基地的观念是另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观念在过去二十五年期间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的 意义。但是，作为政治渗透和外交控制的基地，东欧在苏联人的心目中仍然保有它的价值。感情容易冲动而又颇有自信的赫鲁晓夫至少部分地是透过意识形态的三棱镜观察世界政治的，这种倾向并没有使他不 去破坏西方的制度或利用其种种弱点，反倒 是使他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以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来说，对内采取守势和对外采取大胆行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

^① 见前引“改变中的苏联政策及其所关心的问题”一文。

不同的方面。因此，竭力要求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的目的并非单纯是想用合法手段保持现状，虽然这可能是主要的动机。正如苏联的政论家所公开强调的那样，其目的在于促进西欧的有助于社会变革的形势沿着苏联所赞同的方向发展。^①

在考虑上述第三和第四因素——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安全因素——时，情况证明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连续性；但是从研究苏联-东欧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因素是最为直接有关的。它们反映了为方便起见可以称之为赫鲁晓夫对东欧的时代和勃列日涅夫对东欧的时代之间的差别。赫鲁晓夫对东欧的颇有自信的“国际主义”观点至少可以部分地说明他是准备实行试验和变革了。与此相反，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形态不安全感”或多或少有助于说明苏联近来为什么要坚持加紧控制和在国内强调正统观念。由此可见，根据我们概括地观察苏联政策的结果，这种对东欧的大不相同的看法已经直接影响了所用的方法、所规定的优先考虑事项，以及这两位苏联领导人在比较狭隘地安排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直接关系方面所遇到的困难。

赫鲁晓夫指导下的实验

撇开残暴和恐怖的特点不谈，斯大林主义体系在东欧主要想推进两方面的革新，在国家一级强行扶植莫斯科所信任的领导集团，在国内方面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改造，借以为未来

^① 参阅查尔斯·安德拉斯，“欧洲安全和‘社会进步’”（自由欧洲电台研究和分析部背景材料报告，1975年7月21日）。

的社会主义发展奠定基础。^①

这里所谓国家一级，是指苏联和东欧有关国家通过政府、政党、军事等渠道而产生的关系；所谓国内方面是指各个东欧国家的政府、政党等统治核心与有关社会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显然决不是互相排斥的。

自从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在东欧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实现团结一致和独立生存这两者的正确结合。然而，在他去世后四年左右的期间，苏联并没有前后一致的东欧政策，主要因为莫斯科领导集团内部有意见分歧，并且看不到那种不仅需要采取治标办法而且需要采取治本办法的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在1953年比尔森和东柏林的暴乱中几乎立刻就可以看出来。苏联的反应是开始实行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让步，这两方面的让步合起来叫做“新方针”。^②然而，这些让步基本上是对斯大林留下的不稳定局面的反应，而并不表明莫斯科关于怎样治理东欧国家的问题可能有什么崭新的想法。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赫鲁晓夫于1954年对中国以及1955年引人注目地对南斯拉夫作了修补篱笆的访问。至于莫斯科在东欧的其他盟国，苏联对其中某些国家的领导集团进行了大量的干预，力图确保它们在国内享有更牢固的合法地位，但是很难说这些措施合起来能够构成“新体系”这类的东西。

事实上，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所以发生暴动，是由于斯

^① 论述苏联-东欧关系的最卓越的著作是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团结和冲突》（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1967年版）。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方针”实际上是在1953年6月27日东柏林骚乱之前的几天宣布的。但是在骚乱以后进一步宣布了经济让步。

大林的体系缺乏生命力，也由于没有建立基本上新的体系以取而代之。1956年以后，赫鲁晓夫想要设法纠正的，正是这种缺陷。在发生匈牙利革命和波兰暴动的一年之内，他的领导地位在苏联得到了承认和巩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团结一致的表面现象，他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在东欧建立一个新体系这样的任务了。

赫鲁晓夫试图在东欧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生气勃勃的体系以及他在这方而只取得了部分成就的情况，至今已为众所周知，用不着在这里一一提及。^①以刚宣布的指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平等原则这一理论基础为背景，赫鲁晓夫把华沙条约组织、特别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这两个机构当作工具，用来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以及在东欧国家彼此之间建立一种崭新的、较为坚实的团结一致的局面。可是，赫鲁晓夫比他的继任者更强调苏联目标所要求的独立生存和团结一致的方面，而比起他的前任来就强调得格外多。我们现在无从断定他或他的顾问们是否有意识地认为独立生存的能力愈强就愈加能够团结一致，还是他认为两者之间没有辩证的或其他任何性质的统一。我们也无从断定赫鲁晓夫究竟有没有成竹在胸。也许他比大多数领导人更倾向于依靠若干必需的初步（但通常是合理的）打算，然后依靠一些信手拈来的、特定的（有时是不合理的）手段力求加以贯彻。然而，不论他的概念化过程多么不够完善，也不管他实行的方法多么想入

^① 参阅弗朗斯瓦·费伊托，《人民民主国家史：斯大林以后的东欧》（弗雷德里克·普雷格书店，纽约，1971年版）。并参阅J. F. 布朗，《新东方：赫鲁晓夫时代及以后》（弗雷德里克·普雷格书店，纽约，1966年版）。

非非，赫鲁晓夫直接在国内和间接在东欧推行了一些政策，为了追求生动活泼的局面而形成了一种打破斯大林主义铁板一块的严格框框的气氛，以便使共产党的体制对其本国公民以及对其他体制下的劳动者更有吸引力和更为合理。

他在东欧的努力对国与国之间和国内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东欧各国逐渐变得能够提出主张，即使不能强调它们具有民族特点，也至少能够强调它们与别的国家有所不同了，而这在斯大林统治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当然，赫鲁晓夫从来不打算让它们越出装点独立门面的范围。如果它们为此面产生什么幻想，赫鲁晓夫就立即设法把它打消。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造成一种局面，使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其中有些成员是他协助更换的）逐渐享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甚至在对外关系方面享有某种程度的讨价还价的力量。东方联盟开始显出历史上传统联盟所特有的紧迫、紧张和讨价还价的面貌。

东欧各国逐渐形成的自主权有助于加速刺激国内方面的变革，当非斯大林化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国内变革似乎很可能在苏联本国出现时，情况尤其如此。东欧各国国内变革的程度彼此差别很大。有许多因素影响了这种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的压力和掌权人物的自信程度也许最为重要。有时候，各领导集团当时享有的自主权本身有助于防止而不是促进重大的变革，例如在罗马尼亚、1962年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58年以后的波兰就是这样。但是，国内的种种需要加上苏联的创新事例在东欧引起了很大规模的国内改革和试验——走向独立生存的重要步骤以及犹犹豫豫地走向共产

统治合法化的最初几个步骤。

在东欧经历了所谓非斯大林化的十分崎岖的过程之后，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最显著的、积极的改革措施是那些影响经济结构、计划工作和政策的措施。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受到这些措施的影响，并且由于莫斯科的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同东欧改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苏联在1962年通过发表利别尔曼的建议而向它们发出前进信号这件事看来决不是偶然的巧合。^①提高经济效率的行动计划或一系列单项措施此后便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出现，甚至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也勉强作出一些努力，实行零零碎碎的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而且也是花样越来越多的例证——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遭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它们以后将取得显著的成效；在捷克斯洛伐克，它们成了改良主义者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提出的关于政治改造的令人陶醉的内容之一；在保加利亚，它们几乎还没有机会实行就被取消了。可是，它们对有关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酝酿中的和潜在的影响，同它们成败的程度一样重要。甚至那些比较审慎的改革措施，由于背离了早先的经济控制制度，也往往助长了公共生活其他部门中的多元性质。这就是那些有胆略和见识的改革者认识到并力求加快进行的；它也是那些感觉灵敏

^① 苏联利别尔曼教授的建议在1962年的发表为东欧的改革者们开了绿灯，但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各种有关改革的办法都来源于苏联并向东欧输出。很可能是大多数的改革想法产生于东欧本身，但在能够付诸实施以前必须征得苏联公开的赞同。

的、忧心忡忡的党机构认识到并力求制止的。尽管有这种情况，政治生活的某种萌芽的形式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在匈牙利重新出现（更不必提到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发展其自身体系的南斯拉夫那种与众不同的事例了）。在这些国家，社会和专业利益集团的存在（它们本来就是一直存在的）不但得到了承认，而且悄悄地被接受了下来，其结果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力量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开始悄悄地稍加修改。由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逐渐有了相互影响的余地，党对公共生活的直接的全面控制趋于削弱，尽管官方竭力否认正在发生这类的事情。

当然，决不当夸大这种事态的发展程度。我们这里事实上正在讨论的只是可能的趋势而不是实际的情况，并且，除南斯拉夫之外，上述的那些迹象仅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①正在变得明显可见。可是，尽管有种种限制，一些东欧国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是六十年代政治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事实。

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失去了权力，但在其当权期间在东欧开始的那些演变在该时期结束后继续了若干年。就这一点来说，东欧的赫鲁晓夫时代是在1968年8月而不是1964年10月结束的。在他掌权时已经开始的势头在他下台后有

^① 关于1968年和在此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有很多优秀著作可资参考。加利亚·戈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是论述我们在这里简单介绍的这个过程的极好书。关于匈牙利在这方面的形势发展，可参阅威廉·F·鲁宾逊《匈牙利改革的型式：一项政治、经济和文化分析》（普拉格国际政治和政体专门研究报告，普拉格书店1973年纽约版）。

所增长,如果他继续执掌政权,恐怕他比谁都要更加竭力加以遏制了。他看来已经过分低估了他当初容许其活动的力量。其中一股力量当然是东欧的民族主义力量——对于一个在乌克兰得到政治锻炼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失算;另一方面是一些东欧国家社会内部其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对共产党专制主义的威胁。这样,原来认为可以用来使共产党统治正统化的容易驾驭的力量结果变得非常强大,以致损害了他们本来打算用它来巩固的正统地位。在争取提高独立生存能力的过程中,团结一致的目标变得不太容易达到了。

这方面有三个突出的事例:一是阿尔巴尼亚的颇为特殊的情况,那里的领导人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利用中苏争端把莫斯科的监护换成了北京的监护。然而更重要的是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例。前者把民族自主发展成为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政策,它虽然不象阿尔巴尼亚那样公开表示出来,却巧妙地利用各种因素(中苏争端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拒绝接受苏联的霸权。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它国内的改革大踏步地趋向于否定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一切已知的变种。这两个过程都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发动并因此而有可能实现的;二者在他的离职后都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1964年以后的这种加快速度有若干原因,其中两个也许最为突出。一个原因是,在赫鲁晓夫垮台后大约三年期间,苏联领导集团在对待东欧的问题上缺乏果断精神。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却是以苏联为首的联盟在整个六十年代必须正视的最重大的欧洲外交政策问题。基辛格-勃兰特联合政府在1966年后期向东

欧提出的包括建立外交关系在内的建议看来已使莫斯科很难作出决断，结果在苏联盟国本身的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混乱。除了非常乐意地作出反应的罗马尼亚之外，匈牙利、保加利亚甚或捷克斯洛伐克似乎都无疑地准备以欢迎的态度响应西德的倡议。但是，苏联犹豫不决的态度结果使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在这方面对联盟的决策施加了极不相称的影响。因此，当罗马尼亚在1957年初单独同波恩建立外交关系时，联盟的其他成员国紧密地团结起来拒绝了西德的建议，接着莫斯科就带头发动了一场强烈反对西德的运动。但是在1966年12月和1967年1月这两个月里，东柏林和华沙似乎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不过是苏联的领导出现真空的十分明显的例子，而这种真空甚至比斯大林逝世后出现的真空还要大。这也许或多或少是可以理解的，苏联的新领导一心一意忙于巩固他们在苏联本国的地位，无暇考虑在东欧采取果断行动的问题。

加速赫鲁晓夫垮台以前，就已开始的改革进程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不过是，东欧有关国家要到很久以后才能认识到有些进程的后果和影响的重要性。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的根本改革。这种演变开始于1963年，虽然它的爆炸性的意义要到1968年初才真正显露出来。

可是，纵然很难预料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人们对苏联的犹豫不决还是有很多猜疑的。凡是密切注意过“布拉格之春”事态的急剧发展的人现在都感到，苏联领导集团的踌躇是综合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莫斯科不满意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当时人们还不清楚它准备采取什么对策。不管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原因——内

部的意见分歧以及更全面的政策考虑——这是最后酿成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暂时离开正题，观察一下两大危机以前的时期中，苏联有其政策和缺乏政策这种情况的若干可资比较的因素。这两大危机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它们曾使莫斯科在东欧的霸权时期一时发生中断。这两个事件都是在统治东欧的苏联领导人下台之后不久发生的。在这两个事件的前后时期，苏联在东欧的政策要缺乏果断得多，并至少部分地关于这一点，该地区的骚动迅速地和危险地蔓延开来。1956年，关于对匈牙利的局势应如何作出反应的问题使苏联领导集团举棋不定，倒是当时处于次要地位的盟国——中国——起了一些重要的作用。1968年的局势也并非毫无相似之处：7月份和8月初的事件显然反映出苏联领导集团踌躇不决的心理状态。次要的盟国（这次是东德，或许还有波兰）可能再度帮助苏联领导集团下了决心。

这些相似之处足以证明有必要进行比较广泛详尽的讨论。不过，这里更适当的办法是着重指出苏联两个领导集团每一个在两次危机过去以后从中吸取的教训。两个领导集团都着手制定旨在防止今后再发生同类事件的政策。

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调整工作： 各种触动因素

赫鲁晓夫在东欧采取的步骤开创了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

时代；苏联带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标志了那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新时期里，团结一致精神和独立生存能力之间的关系硬是被逼退到偏重团结一致的一面。捷克斯洛伐克本身的痛苦的经验，以及“布拉格之春”可能给东欧其他国家和苏联本身带来混乱的前景，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他们必须大大地限制东欧在六十年代兴起的创新和试验精神以及改革的风气。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局势要求实行反改革措施和重新确立正统体制，以恢复对东欧的控制并防止苏联本身遭受8月以前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发展的内在的危险。

然而，尽管迫切需要采取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病毒”可能复发的措施，这却并非促使苏联领导集团在东欧恢复团结一致精神和正统体制的唯一因素。华沙条约组织1969年3月在布拉格发表宣言，重新呼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召开欧安会，在此以后不过几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就遭到罢黜，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上年8月军事镇压的效果。这两件事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但在时间上的紧凑衔接却有助于突出地说明下列两方面的联系，即苏联决心要消除其东方势力范围内的污染，同时它又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防止在勃列日涅夫西方政策规定下较为密切的关系可能从西方带来的感染的危险。

苏联人在这方面的推理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既然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后已经开始了恢复东欧稳定局面的过程，他们当然就不愿看到从西方扩散过来的分歧意见破坏这种稳定局面。他们和东欧所有的领导人都意识到，西欧的存在本身

就是使东欧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东西欧两种社会之间任何真正的相互影响都可能引起不宁、对原有准则的怀疑、视野的扩大、可资比较的新标准的产生——事实上，可能导致一种甚至比六十年代远为易变的、更不可逆料和更具有破坏性的局面。确实，任何这样的相互影响都势必不仅危及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而且危及该地区共产党的统治，至少就其至今所实行的统治的方式和方法来说是如此。

基于这样的认识，苏联和东欧才最初在赫尔辛基，续而在日内瓦力图抵制西方所提出的“自由交流”情报、人员和思想的建议。（罗马尼亚差不多没有表示拒绝，但这主要不是由于它对西方的建议毫无戒心，而是由于它不喜欢同名义上的盟国采取集体行动。）苏联和东欧领导集团可以容忍的赫尔辛基和日内瓦议事日程上“第三个一揽子建议”所包括的接触，主要是那些在此以前它们已经赞同的、审慎地进行的交往。它们甚至自己已经承认愿意允许有更多一些这样的交往。至于西方所说的那种“自由交流”，它们并不希望出现，虽然在1975年夏季为了加快结束审议工作，它们在最后一分钟作了让步——将来大概会证明是虚有其表的面而不是实质性的让步。

而且，苏联已经清楚地表明它不准备贸然同意它也许打算容许的程度有限的真正缓和。从1972年秋举行欧安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到1975年夏终于在赫尔辛基举行最高级会议这两年半以上的时间里，苏联加快了1968年8月以来一直在东欧进行的要求团结一致的过程。的确，苏联在这个时期加紧采取了行动，以致有些观察家得出结论，认为要求团结一致的趋势是苏联纯粹为了担心局势缓和所产生的影响而促成的

较新现象。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苏联的这种忧虑是已经存在的变态恐惧心理的另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而构成这一变态心理的各部分一直是互相增强的。

所以，缓和紧张局势——要求缓和的压力，对缓和的认识和展望——肯定已经成为苏联在东欧力求团结一致的另一强大动力。几乎在同一时间发表布达佩斯宣言和由胡萨克在布拉格接替杜布切克，典型地表现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痛苦经验和随着国际局势缓和而产生的恐惧心理之间的关联。情况既然如此，在这里举出另一种关联是颇饶趣味的。这种关联由于几乎与1969年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事件同时发生的另一事件——乌苏里江中苏军队的冲突——而显得相当突出。

显而易见，就对华战争或所看到的战争紧迫性来说，苏联任何领导集团都必须选定一种可以保证东欧稳定的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它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那多半是合乎实际的。并且，既然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决心要恢复东欧的团结一致精神，如果莫斯科把乌苏里江事件看作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的序幕，它当然就会觉得有理由把这一因素和上述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作为在东欧采取安全预防措施的一种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动力。但是，虽然莫斯科认真看待乌苏里江事件，因而事实上有大量军队调到苏联东部地区，我们却看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证明它把这一事件看得十分严重，以致确实要转而采取一种其势必会涉及东欧政策的立足于战争的策略。所以，我们实际上不能把乌苏里江事件和中国人的威胁包括进去，作为苏联从1969年以后推行

其东欧政策的一个环节。

中国对苏联在东欧本身的势力的竞争性威胁，在七十年代已大为减弱。在此以前，中国的威胁曾经断断续续地是一种有点重要的因素。1956年，中国的势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了苏联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政策；它也在1957年影响了苏联旨在重新建立正式的社会主义团结大厦的努力。后来，当中苏冲突成为公认的现实时，阿尔巴尼亚同莫斯科决裂，接受了北京的监护，同时罗马尼亚巧妙地利用当时的局势，扩大了它自己的自主范围。晚近，在1971年夏季，当苏联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关系看来明显地恶化时，人们纷纷推测有可能出现一个由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指望得到中国保护的“巴尔干三角地带”。然而，由于苏联对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的政策有了和解性质的改变，以及两个首都对于利用假定的中国方面的保护以对抗苏联压制的做法是否切实可行这一点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上述的推测立刻就消散了。从1971年以来，虽然中国一直保持着它同阿尔巴尼亚的联盟关系、同罗马尼亚的密切联系以及同南斯拉夫的真挚关系，它对欧洲的主要兴趣却集中在西欧而不是东欧。它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发生联系，它坚决支持北约组织，它蔑视所谓加强欧洲安全的整个活动，所有这些都表明它现今认为在西欧比在东欧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打击苏联。

关于中国对东欧内部发展的影响，这个因素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除阿尔巴尼亚这个特殊的事例而外，保加利亚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在此以前的宣传运动是表明东欧政权国内政策受中国影响的唯一明显例子。究竟齐奥塞斯库

1971年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小文化革命”，还有争论的余地，但是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也足以表明中国影响东欧各国国内情况的现成例子委实不多。

中国对东欧社会中“非官方”人士的影响要大得多，甚至有可能变得更加如此。北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战斗精神，已经吸引了一些心怀不满的老共产党人以及更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学生，因为这两类人把东欧——更不必说苏联——所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是降低而不是实现了原来的革命理想。然而，可能除了六十年代上半期的保加利亚以及也许还有最近匈牙利的老资格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外，他们还没有对他们所鄙视的政权产生显著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主持下的调整工作： 目的和方法

由苏联发动而施之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调整过程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胡萨克政权所强迫推行的“标准化”却不应当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不去留意最近五年苏联和东欧关系中比较广泛的发展趋势。在1968年8月以后，立即有许多人表示担心，唯恐在搞垮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验以后接着会在苏联和东欧之间强迫推行一种类似斯大林时代存在过的关系。但是，苏联并没有企图推行这种关系。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复杂得多的努力，想要通过在各级实行多方面的一体化政策来加强团结一致的精神。由于苏联领导集团自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依靠华沙条约组织控制着东欧的武装部队，由于对捷克斯

洛伐克的入侵使它经常想起最后下定决心动用武装力量的历史事实，以及由于它在万一动用武力时有勃列日涅夫主义作为它的理论根据，它便开始实行一项综合的政策，以便终于造成一种不再有必要采取入侵手段的局面。

一体化这个名称通常是同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就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来说，它更是经常这样被用来谈到苏联通过经互会不断作出努力，以便充分利用它本国以及盟国的经济力量和潜力的情况。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当然还沿着赫鲁晓夫开始实行的政策。但是，赫鲁晓夫鲁莽地力求通过超国家的计划机构自上面下地实行一体化，结果遭到了失败，而勃列日涅夫却比较重视实际并富有耐心，他通过东欧各国经济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彼此之间、特别是同苏联的有组织的紧密连结，“自下而上地”力求达到一体化的目的。这是一项多方面的长期计划，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曾公然承认不讳。这项计划至少已经有了个开端，甚至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东欧若干国家的政府在1971年发表一体化“综合计划”之后同意向苏联的原料工业投资，并同意在成员国各个国家计划之外制定全面的合作计划，于1976年起生效。大概这种紧密的连结关系最后有希望臻于完善，使超国家的计划工作成为合乎逻辑地、几乎是水到渠成地达到一体化的高潮。

因此，经济一体化仍然是苏联各项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它的一体化概念现在比以往深广得多。目前更强调的是政治、文化、思想、当然还有军事上的一体化。党的领导人行行的最高级会议不过是金字塔式的各种各样会议的顶点，这些会议经常在各统治集团的较高一级、中间一级和较低一级

召开。表面上，苏联同它盟国的这种协商办法可能象是真正的政务会议制度，从各种会议多半在东欧城市举行以及由东欧官员主持召开这一点来看，更使人有这样的印象。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政务会议制度；商量当然是有的，但并非共同的协商。伙伴们的不平等地位是有目共睹的，无论讨论问题或作出决议都根据这一点来进行。这并不是说没有发生热烈的辩论，也并不是说有时候很容易按照苏联的意图唯命是从地取得一致意见。罗马尼亚人肯定已经多次回避了苏联就他们所反对的问题作出决议的企图。他们的既定政策是不去参加那种作出的决定可能违反其主权概念的会议，而在他们所参加的会议上，他们的代表有时也拒绝承认未经一致同意的决议。在这方面，罗马尼亚人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这可以从匈牙利的经济新闻中推断出来，例如在经互会的各种会议上，匈牙利代表就曾提出明确的观点——可以互相兑换货币，实行企业对企业的合作——这是与苏联人的观点相抵触的。波兰人和东德人想必也有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设想，在那些对苏联不大重要的问题上，它的代表允许出现名副其实的会议气氛，或者偶然让自己被人说服，改变原来的主张。如果他们在任何一级的会议上对一切问题都采取僵硬的、盛气凌人的态度，那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另外，苏联人容许在会上进行一些广泛磋商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摸清盟国对范围广泛的许多问题的想法。^①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东欧盟国偶然有表达不

^① 这种讨论也许过分简单化，因为它倾向于认为苏联代表是体现莫斯科领导集团的统一观点去参加所有这些会议的。显而易见，未必每次都是这样的情况。当苏联代表并不体现莫斯科的统一观点时，东欧人大概不仅在磋商过程而且有时在决策过程中起较大的作用。

同意见和主张自身利益的机会。可是，在苏联领导集团认为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或关系重大的问题上，那就必须加以引导以取得一致意见，而罗马尼亚人对于苏联协商方法所持的态度却显然是准备恰恰就这样一些问题表明他们同苏联人有意见分歧。

这种加以引导以取得一致意见的策略，并不意味着苏联领导集团在它认为必要时避免直接施加压力。1971年春撤换乌布利希以及同年夏季向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就是这方面的明证。人们有理由推测，苏联在某些方面还稍稍直接干涉波兰的国内政策。匈牙利的一些人事更动以及1974年3月开始的政策侧重点的改变，反映了苏联的意志。然而，如果说苏联领导人没有突然变成幕后的说客，他们却确实力图使苏联和东欧的相互关系中需要直接施加压力的程度，远比在共产党政权的最初三十年为少。

事实上，在需要有高明手腕才能应付的最近东欧的局势中，他们已经表现出相当老练和克制。乌布利希无疑地受到了压力，但他年老多病的情况提供了方便的借口，可以借此排除勃列日涅夫贯彻其西方政策道路上的严重障碍。苏联对1970年12月波兰危机的反应是个十分显著的例子。这次反应表现了克制态度、对于新领导人盖莱克的信任以及希望帮助消除爆炸性局势的意愿——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决定都是成功的。

在这方面，最近几年苏联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政策值得特别加以考虑，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对莫斯科的团结目标提出了挑战。罗马尼亚的挑战是在十一年以前

1964年的“四月宣言”中首次在思想上系统化的，它一直在国家一级反对苏联的霸权。只要齐奥塞斯库继续掌权，那种挑战将仍然不变——1974年3月底他所采取的使他个人统治制度化的步骤表明他下定决心还要进一步捍卫他的权力。可是，大约从1971年夏季起，苏联领导人似乎已经认为有可能把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刺激减低到可以容忍的程度，这是因为，尽管齐奥塞斯库周游列国，由于该国经济日益脆弱，以及若干部分的人民对齐奥塞斯库的异常独特的统治方式日益不抱幻想，大国外交多半会象苏联所希望的那样加深罗马尼亚的孤立状态。以这些假设为依据，似乎因此就只需要对罗马尼亚施加更间接一些的压力就够了，并且毫无疑问，苏联的这种政策肯定在1971年冬和1974年春之间产生了效果。两国的关系并不太紧张，并且布达佩斯也许表现出了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合作精神，特别是在它同苏联和经互会的经济关系方面。

但是，决不能保证这种令人满意的平静状态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事实上，到1974年春，出现了那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的明显迹象。1974年4月华沙条约组织最高级会议显然表明，主要关于罗马尼亚不愿自认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是联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罗马尼亚和苏联人之间有意见分歧。关于罗马尼亚在日内瓦召开的欧洲合作和安全会议上所持的独立态度、它对筹备举行欧洲共产党会议所持的态度、它对苏联要强迫别人接受在经互会设立超国家机构这一建议所抱的疑虑，以及它日益主张经互会的主要宗旨之一是平衡其成员国的发展水平这种坚决的立场，都进一步加深了

两国的分歧。在寻求同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方面，^① 罗马尼亚也在力求进一步疏远它同苏联的联系。这些分歧中有一些未必会永久存在下去，并且，同那看来已经出现的苏罗关系的周期性相一致，当前的紧张局面可能不会维持下去。然而，只要罗马尼亚保持它同中国的关系——不管它可能多么谨慎或克制——严重倾轧的原因始终还会存在。正是罗马尼亚“独立政策”的这个方面一定远比其他方面使苏联人感到忿恨，而如果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就可能引起剧烈的反响。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既威胁苏联的国家安全，又威胁它的共产党利益和所承担的义务。然而，尽管如此，罗马尼亚仍旧保持着它同北京的十分真诚热烈的党和国家关系。甚至苏联主要人物中比较通情达理的人也一定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其他人一定觉得这是大逆不道。^②

匈牙利提出的问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匈牙利的外交政策几乎同苏联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即使偶然可以看出，例如和西方的经济关系问题在细节上有分歧；关于中国问题，布达佩斯是充分支持莫斯科的。不过，对于苏联当前的党治观，对于东欧各国应该建成什么模样，匈牙利有几年含蓄地、悄悄地表示的异议要比罗马尼亚的异议严重得多。齐奥塞斯

^① 关于这方面罗马尼亚政策的讨论，参阅肯尼恩·乔伊特“罗马尼亚的政治革新”，载《研究》杂志，第20卷第4期，1974年秋，第182—151页。

^② 当然，在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比在苏联和中国之间潜在着一种甚至更带爆炸性的问题，罗马尼亚要求收回1940年让给苏联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正式承认苏联有权控制这些地区，但是从1964年以来，它以许多间接的方式表明，它不满意这种控制，并认为这些地区、特别是比萨拉比亚是理所当然地属于罗马尼亚的。

库的国内政策尽管有其别出心裁之处，却没有对苏联的正统观念提出责难；卡达尔有几次倒提出了疑问。以“新经济结构”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匈牙利国内政策，已经变成可以称之为“赫鲁晓夫时代错误的产物”这样的东西。它所包含的危险是经济和社会多元化、政治上的真正相互影响以及体制改革，这些事当当初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发而不可控制，苏联领导人从1968年以来就一直想加以排除。

在匈牙利改革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它包含着危险的因素，苏联对它的反应却又一次表现了镇静和克制。其所以有这样的克制，一部分是由于匈牙利方面施展了大量的手腕和策略，卡达尔本人也同样如此。匈牙利领导集团不仅支持了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且经常向莫斯科保证，匈牙利党一定尽力控制局势，并竭力驳斥那种认为它的国内政策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说法。它就这样先发制人地拒绝了所谓匈牙利是污染的媒介这种指责，而这种指责是曾经针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更早一些针对南斯拉夫发出过的。而且，卡达尔从一开始就顺利地对待苏联领导人运用了他所掌握的讨价还价的力量。许多人似乎有所怀疑，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或者至少是在1969年4月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以后，不知道匈牙利是否还能着手贯彻它的新经济结构计划。当匈牙利领导人不仅继续进行改革而且扩大改革的范围时，人们感到非常惊讶。然而，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卡达尔在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时所采取的行动非常得体。他曾支持勃列日涅夫向捷克斯洛伐克开刀，虽然他怀疑这样做是否明智，并且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个行动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要冒极大风险。它成功

了，因此酬劳卡达尔的（心照不宣的）奖赏在当时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看来似乎决不会太高。归根到底，既然苏联在其决心惩罚不听话的盟国时已经引起了1956年以来东欧最糟糕的危机，它当时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酬劳听话的盟国了。

只是到了后来，也许是在1972年的某个时候，苏联领导集团对于匈牙利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容忍，似乎为接近关注的心情所取代。它当时的策略，是要使它自己对局势的怀疑态度增添匈牙利改革本身已有的和日益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若干纯经济问题，例如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倾向。但远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广大阶层对于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从新经济结构计划给予整个社会的繁荣中所得的报酬太少这一点越来越感到不满。匈牙利党本身内部的一些稳健派看来已经赞同工人阶级这些持不同意见者的主张，想要放慢或改变改革的进程。正是匈牙利这两个共同发生作用的因素，再加上想必多半是独立发生作用的苏联领导集团，终于能够不是打破匈牙利的改革计划（谁也不希望那样做），而是把它朝向苏联显然认为可以同意的界限拉回去，纵然还不是拉到界限以内。

匈牙利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72年11月在这方面采取了第一个重要步骤（在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立即前往访问）。第二个重要步骤是1974年3月在中央全会上把“新经济结构之父”涅尔什·雷热和其他一些与匈牙利改革的各个方面有密切关联的领导人降了级。同一次全会还着重重申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工人阶级方向和理论上的正统性质，这种主张隔了若干年之后，在1972年11月全会上第一次十分明确地

重新出现了。从1975年3月的党代表大会可以看出，涅尔什和正式在农业方面主要负责执行新经济结构计划的费赫尔·拉约什实际上已不再在公共生活中露面；同年5月，改革运动的热心支持者福克·耶诺丧失了总理的职位。在这实行紧缩的整个期间，匈牙利政治家（包括卡达尔本人在内）和新闻宣传界都竭力向公众保证，不会有重大的政策改变。谁也不希望让新经济结构计划一夜之间完全取消；所实行的改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步的、几乎是不引人注目的。可是，差不多没有人认为匈牙利在将来会象过去几年那样与东欧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全面恢复正统观念

即使很据这种粗浅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1968年以来在整个东欧国家的国内方面都有力地恢复了可以称之为“保守的正统观念”这种思想。然而，这并不是单纯通过苏联的控制就能达到目的的。实际上，1968年以后莫斯科关于团结一致的概念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对前十年的改革趋势心有余悸的许多官员中间很容易被接受。如果说赫鲁晓夫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苏联顽固的党机构的反对，那么，东欧很多党的官员对赫鲁晓夫主义有所怀疑就是他们接受苏联政策中新的着重点的主要原因。^① 这种恢复正统观念的反改革运动，已

^① 这份研究报告不可能分析东欧党的核心人物的态度和心理状态，虽然这在苏联-东欧关系的整个问题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方面关于事实的有益的分析研究是卡尔·贝克、小弗雷德里克·J·弗莱伦、米尔顿·洛奇、德里

就意味着在重申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意识前提下对他们权力的支持。有关权力——执政共产党的权力——的考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1968年年底以来在东欧开展思想攻势的基础。

我们正是应当按照这些情况来判断这种思想攻势的效果。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是它对东欧各个国家中党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简单地说，党的力量正在得到加强。这方面有一些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匈牙利的情况刚才已经提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则毋需详加说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经济体系、即相当温和但非常成功的东德经济改革，终于在1971年宣告结束。^①商业和服务行业中相当大的私营企业部分，尽管在沃尔特·乌布利希长年累月的显然严格的控制下能够幸存下来，却在他的继任人昂纳克的统治下几乎削弱到荡然无存的地步；在农业方面，以前低级集体农庄的私人所有制和私人利益的各个方面未被触动，现在却已变成私人利益占极小比重的正式的集体农庄。在波兰，1972和1975年的地方行政改革以及所建议的教育制度的广泛改革本来预定要推行若干年，今后也要变更党和社会的相互影响的比重以有利于前者。不可否认，波兰人民生活中这两部分的改革早就应该实行，它们将产生更有效的地方行政工作以

克·J.沃勒、威廉·A.韦尔什和M.乔治·扎尼诺维奇合著《共产党政治领导的比较研究》(戴维·麦凯公司,纽约,1973年版)。

① 实际上,为了提倡“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新经济体系”这个名称在1967年即不再使用,并在当时重新强调了中央计划工作。在1971年结束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及更好、更现代化的教育设施。然而，它们深远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对许多看出改革优点的有头脑的波兰人发生作用。与此相似，大概从1973年年初以来，波兰领导集团一直在广阔的战线上逐渐推行它所说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已经取消了那种拙劣的传统的集体化方式，全神贯注于从财政上实行区别对待和鼓励的办法，以加强国营农场和农业领域而不利于私营部分，虽然私营部分在1975年年初仍旧占波兰可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次，波兰的许多私人小农场即使经过一场危机很快恢复了活力，根据其他绝大部分的标准来判断却显然效率极低。因此，提高效率是这场刚在波兰开始的温和的革命的一个目的。可是，权力、思想动机和效果这三者的紧密关系也是非常明显的：党和社会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向有利于党的方向发生变化。盖莱克的波兰的显著特征之一事实上就是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

在所有东欧国家中，也许可以拿保加利亚作为例子来十分清楚地证明这种采取意识形态攻势和建立一个由党统治的指挥机构之间的关系。在有必要激发人们更多的思想热情时，政府的许多发言人往往泰然自若地公开谈到党的权力及其权力的扩大。事实上，根据党所统治的中央集权管理机构以及领导集团所阐释的一套完整的统治哲学（它同时已经表明在其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容许大胆创新）来看，保加利亚很可能被莫斯科看作一个模范的东欧国家，一个亦步亦趋地完全符合苏联领导集团意图的典型的但决非毫无生气的卫星国。另一个这样的范例也许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为它别具一格地占有在经济上比较先进和效率较高的不可估量的优势。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莫斯科的心目中，昂纳克领导下的民主德国已经完成了乌布利希的民主德国试图奋力从事而收效不大的工作，成为其他国家都应仿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代国家的榜样。

团结一致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独立 生存能力？

上述的过程目的在于恢复团结一致的精神，或者更正确地说在于造成苏联和东欧之间一种崭新的结合。这是近六年来苏联全神贯注的主要事务。然而，团结一致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社会稳定，这是苏联和东欧执政党屡次凭经验知道的不容忽视的明显道理。在捷克斯洛伐克看起来刚刚可以重新得到巩固的时候，波兰在1970年12月就爆发了工人的骚乱。这次动乱不仅导致了波兰领导人的更换，而且在东欧其他国家造成了前途未卜的震动。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的一些重要的物质让步缓和了波兰的趋势。至于其余的东欧国家，看来盖莱克在1971年初所采取的孤注一掷的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其他东欧国家政府和苏联政府，使它们把“消费主义”列为其各项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部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消费主义”甚至在波兰动乱以前就有了基础。它也是匈牙利新经济结构中的一项内容。它要在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政权下成为“标准化”政策的基本部分——也许是该项政策至今唯一真正取得成就的方面。它在1972年底也包含在保加利亚特别庞大的规模之内。只有在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

由于它的领导人几乎拚命要求发展工业，它才没有成为官方政策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即使那里大部分人民的实际收入已经明显地增加了。

关于“消费主义”的现阶段，值得着重指出的一个重要之点是，它起源于东欧而不是起源于苏联。这一点应当指出来，因为从1968年以来风靡一时的看法认为，如果在东欧发生什么相当大的变化，那一定是来源于苏联。这种判断将来也可能是正确的，并且，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继续保持目前的保守主义气质，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心怀不满的青年和愤怒的少数民族硬要它作出的改变就只会格外广泛和难办。这样的改变几乎可以肯定会对东欧立刻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一时不容易解释清楚。然而，我们决不当对于重要的变化还可能来自东欧这一点持怀疑态度。

需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以把勃列日涅夫的“消费主义”同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思想作一番有趣的虽然决不是令人满意的类比。彼此的类似之处是明显的，无需过分详细地加以阐述。它显然引起这样的问题，即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的政策或宗旨之间的差别从上述类似之点来看是否确实是基本的。这两位领导人的最终目标大概可以被认为有相似之处，但为了达到那些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和方法未必尽同。在这具体的场合，“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和“消费主义”显然指同一个目标：较高的生活水平。可是，这两位领导人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自准备使用的手段却看来截然不同。赫鲁晓夫似乎认为放松经济控制和对政府机构的一般控制，就可以实现“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在勃列日涅夫这

方面，由于“消费主义”至少部分地是由波兰危机迫使他实行的，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恢复中央集中计划和管理经济工作，加强党的控制以削弱政府或社会的其他机构或权力中心。这或许也被看作一种安抚手段，一部分旨在补偿公共生活其他领域为满足社会需要而蒙受的损失。

然而，有些人可能还不仅从避免纠纷这一消极的意义来理解“消费主义”，而且更积极地把它看作重新刺激经济生活、促进一种伴随经过改造的团结一致精神而俱来的面目一新的独立生存能力。如果这一点有可能做到，那么，不必经历赫鲁晓夫时代在东欧某些部分似乎相当危险的那些险象丛生的体制和社会演变，当然就可以达到独立生存的目的。事实上，看来东欧和苏联有很多官员认为这是办得到的。也许最适当、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爱德华·盖莱克本人。盖莱克以他在波兰重工业中心西里西亚担任十三年党的领导工作的实际成功经验为理论基础，似乎真正认为丰厚的工资、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管理部门和工场之间公开的但仍然是家长式的双向意见交流制，将同时平息工人的不满，减轻他们提出建立真正的工人委员会这样的体制改革的任何要求，并为生产方面的有效高涨创造条件。

盖莱克是个致力于现代化的领导人，并且看起来确实关心社会福利。他本人不是专家治国论者，而是一位尊重专家在推动现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并接受其建议的政治管理人。因此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代表着苏联和东欧领导集团的一些做法的当前趋势：培植经济和技术知识界作为经济政策的执行者。在最近十五年来，这个社会阶层在东欧一直不断

地扩大。显而易见，政治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这个社会阶层尽可能精通业务而且不关心政治。他们已经准备对这个阶层的成员作重大让步——走得很远，以致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已使工人大为不满——并把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安置在经济统治集团的真正负责岗位上。在新制度下求得生存的希望，看来正是要依靠这一同物质上感到满足的工人阶级进行合作的阶级。然而，就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技术知识界来说，东欧各个政权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授予责任而同时并不给予实权的问题。只要政治领导集团仍旧保持团结和充满自信，这一点想必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同床异梦并缺乏决心，这个知识界的成员就会对政治决策施加强大的影响。正如本研究报告的第三部分将表明的那样，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所产生的局势也许实际上会考验这种可能性。

第二部分 苏联-东欧关系最近 出现的因素和发展情况

这部分的探讨分为三段：首先讨论 1969 年以来苏联-东欧关系中最重要的全地区发展情况以及影响这些情况的因素；其次，简单地叙述一下影响华沙条约组织各个成员国与苏联的双边关系的一些主要因素；第三，讨论东欧各国内部的关系。第二段还简单地说明阿尔巴尼亚局势中可能在将来影响该国同苏联的关系的一些因素。当然，把阿尔巴尼亚包括在探讨之列，只有使得我们把南斯拉夫排除在本研究报告范围之外的反常做法格外引人注目。然而，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其他研究报告中已经分析得十分详尽，^① 并且这个题目非常重要——且不说它可能还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这样一种概括的探讨大概难以把问题说得很透彻，并且可能会低估那种关系的重要意义。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当然是独特的，因为在将近十五年来两国的关系几乎并不存在。可是，这决不是说它们在彼此的考虑中不起什么作用。在将来，这种作用可能会变得更大。为了这个缘故，并且由于 1961 年莫斯科同地拉那的关系破裂以来人们对于苏阿两国可能彼此

^① 例如，请参阅 A. 罗斯·约翰逊“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黄昏时幕”（《华盛顿论文集》第 2 卷第 16 期，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塞奇出版物，贝弗利希尔斯/伦敦 1974 年版）。

发生影响这一点缺乏分析，^①我们就决定在这里把苏阿关系一并加以讨论。

整个地区的因素和发展情况

本研究报告所探讨的时期中苏联政策的总目标已经在第一部分有所论列。与追求这一目标有关的一体化概念可以大体分为四个主要方面，经济因素、军事因素、政治和外交政策，以及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党务。在头三个方面，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体制被苏联人看作促进他们的目标的主要工具。为了实现意识形态上的一体化，至今还没有创建象斯大林在1947年建立、由赫鲁晓夫在1956年解散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那样的工具。然而，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苏联正在企图使一种以特定方法或临时措施为特征的手续合法化。

经济因素

经互会是在斯大林主持下创立的，但赫鲁晓夫加强了这个组织并把它看作提高团结一致精神的潜在的有力手段。^②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它仍然是促进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工具。

① 路易斯·赞加的著作不属于这个论断之列。他最近写的两篇重要文章是：“十字路口的阿尔巴尼亚领导集团？”（自由欧洲电台，研究和分析部背景报告，1974年11月6日），以及“科索沃：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恢复邦交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由欧洲电台，研究和分析部背景报告，1975年6月2日）。

② 关于经互会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发展情况的研究，请参阅迈克尔·凯塞《经互会：计划经济的一体化问题》（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比赫鲁晓夫审慎，不那么鲁莽，因此它把经互会看作一种手段，用来奠定东欧各国经济体系在经济上依附于苏联经济体系的基础，然后使其进一步得到巩固。^①

毫无疑问，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1969年4月，经互会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正式决定制订一个经济一体化方案，但正如预料的那样，探索一体化的工作已证明是缓慢和困难的。在1970年5月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这一方案的各个方面的起草工作有了一些进展，但从最后公报和与会代表有些发言所表达的保留意见来看，对于一体化的步伐和性质似乎存在着很大分歧。然而，这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同意设立经互会投资银行；银行的创办资本由各成员国按比例分担，它已经向成员国提供巨额贷款以帮助发展某些工业。

可是，经互会投资银行的设立也表明经互会和以前的做法大不相同。这家银行在经营业务时并不遵从经互会历来在其工作中所采用的必须取得一致同意这种做法，而是服从多数通过这一原则。^②如果该银行的多数成员国赞成某一工程项目，那么反对这项工程的一国或几国就不能用拒绝参加的办法加以否决；占多数的国家还可以在反对国不参加的情况下依旧进行那项工程。罗马尼亚最初拒绝参加该银行，但后

^① 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经互会发展情况的详细研究，请参阅亨利·威尔科克斯·谢弗《经互会和一体化策略》（普雷格有关国际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专题研究报告，普雷格书店，纽约1972年版）。

^②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必须取得一致同意的原则在经互会建立后十一年即1960年发表的经互会宪章中没有提到。但是，在第四条第三节里却提到了“宣布一项兴趣”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承认多数通过的原则。不过在1970年以前，经互会的一切活动都采用一致同意的原则而不是遵从“宣布一项兴趣”的原

来改变了主意，这部分地由于它显然相信参加该银行并不会侵害它的主权，也部分地由于它自己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妙，不能不顾该银行对成员国提供的好处。后来，人们更通常地把这个多数原则称为“有关当事人”原则，特别就最近已经成为经互会活动中主要特色的联合投资项目来说是如此。共同参加这样的投资项目的行动不是强迫的，那些不感兴趣的国家干脆就不参加。这种废除否决权的做法和采用“有关当事人”的概念，排除了干扰经互会的发展和效率的严重障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原则想必还会起很好的作用。不过，它本身包含着最后即使不是分崩离析也至少是发生分裂的危险。更多的国家——不仅是罗马尼亚——会对工程项目进行挑选，破坏经互会事业的协调一致，并威胁一体化概念的本身。

然而，这种情况可能在将来是很难应付的。1971年7月在经互会理事会的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最后通过并发表了所谓“全面方案”这一关于一体化的文件。但这并不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初步公布的文件那样会使一些观察家认为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方案。它包含了显然由不同的工作小组起草的十七项条款，这些条款虽然并不互相矛盾，却没有表现出协调一致的迹象。在整个文件里，只有极少数几处地方表明成

则。这是证明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这样一些东盟机构的活动方式中采用不采用什么习惯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极好事例。与此相类似，在五年期间规定货物和商品的价格不变曾经是经互会贸易的惯例，因此，当苏联于1975年初决定提高其原料价格时，许多观察家断定经互会的条例已经打破。这是误解：所打破的是惯常的做法。苏联还能够指出1958年经互会的一项决定，这项决定授权在情况需要时可以变更五年期内的价格。

员国一致同意为真正的一体化奠定基础所必需的各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和协调一致地规定价格与成本的办法，可以自由兑换卢布的办法以及跨国企业进行合作的办法。在一体化的这些经济方面，问题倒多半不在于苏联对其并不心甘情愿的盟国施加压力，而是恰恰相反。例如若干年以来，匈牙利经济分析家在制定其影响整个经互会的新经济结构的原则时，已经竭力主张有必要实行这样的改革，并且相似的呼声也已经从波兰听到，虽然调子比较低一些。不消说，如果承认这样的改革，那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变苏联的经济体系，而这是苏联领导人还没有准备考虑的。

在“全面方案”公布之后的三年期间，经互会几乎没有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有有关在苏联联合兴建的工程项目上进行多边投资的协议，其中也许以库尔斯克冶金工程项目宣传得最多。然而在1974年，经互会的条例作了许多修改，部分地反映了一体化过程已逐渐为成员国所接受。但是1975年6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经互会理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方针，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极为重要的先例：各成员国通过了一项联合协作计划——那就是说，和它们各个国家计划有所不同的计划（当然，它们之间彼此的协作目前已经成为经互会活动方面一个正常的特征）。这个新计划的最突出的部分是一致同意兴建或扩建以采掘工业为主的十个联合企业，经费约为九十亿卢布。然而，苏联能够使大家同意在有关成员国的各个计划之外实行经互会一项共同的总计划这一点，比上述的

细节更为重要。苏联今后想必还会扩大这一想法，使以前属于个别国家计划范围内的计划工作的更多方面纳入受经互会直接领导的共同计划工作的轨道。

这种共同计划工作得以进行——连罗马尼亚也表示赞同——这一事实，或许反映了1975年东欧各国的经济地位同苏联的经济地位相比出现十分严重的恶化现象。事实上，这种恶化已经成为几年来影响苏联-东欧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1975年初以来，东欧各国一方面已经感到西方通货膨胀的影响，另一方面还不得不为苏联原料的交货支付急剧提高的价格。这些价格目前仍然比世界市场上大部分通常的价格低得多，但那种加价造成的损害是很大的。例如，东欧各国支付苏联石油的价格比1974年高出百分之一百二十左右。对将来来说，已经制订了一项新的原料定价办法。按照旧的办法，价格在五年的期间始终固定不变，但按照新的体制，价格将在前五年有关商品的平均价格的基础上每年进行修改。西方的经济专家估计，按照这种新的办法，到1977或1978年苏联的石油价格大致会同世界价格相等。

面然，苏联已经给予东欧国家某些补偿性的让步。它们向苏联出口的制造品的价格已经提升，并且至少就匈牙利来说，苏联的贷款可以用来帮助缓和财政上所受的打击。然而，东欧国家向苏联出口商品的涨价幅度是比较小的，不论莫斯科给予什么样的让步，东欧国家的发言人还是毫不犹豫地表明，这些新的价格对它们经济的打击是严重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在原料方面比较丰富，可能受害最小，但甚至它们的经济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避免遭受打击。其他国家由于大量依靠苏联的

原料,特别是能源部分的原料,也许面临着五十年代初期以来最困难的经济时期。

当然,苏联人所做的事情在经济上是有正当的理由的;这决不是猖狂剥削的问题。以前的定价办法意味着东欧各国在若干年内一直以低于世界水平很多的价格获得苏联的原料,特别是石油。人们曾经预料价格是要向上调整的——但不是从1975年初,而是从1976年新的五年计划周期开始时实行的。然而,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所讨论的问题在经济上的是非曲直这一方面,而是这种剧烈的经济手段对苏联-东欧关系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它使苏联掌握了支配其弱小盟国的另一种十分有效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是经济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它也把经互会内的重心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推进,从而削弱了经互会中较弱成员国的能力,使它们无法抗拒或拖延苏联力图利用这个机构作为强制实行更密切的团结和加强控制的工具这一步骤。

军事因素

华沙条约——或者更确切地说华沙条约组织——于1975年5月14日庆祝了它成立的二十周年。按照协议,该条约有效期限为二十年。然而,有一项条款规定,如果至少在正式失效日期前一年没有提出解散的动议,就自动再延长十年。同样地,如果任何成员国在1975年5月14日至少一年以前预先通知,它就有退出条约组织的合法权利。没有一个成员国要求退出,这是不足为奇的,虽然在1973年和1974年初有人推测,罗马尼亚固然不想退出条约组织,可能会利用机会坚决

要求实行变革，象人们认为它在1966年曾经做过的那样。^①

在本研究报告所探讨的时期(1969—1975年)以前不久，华沙条约组织的武装部队(罗马尼亚除外)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被积极动用，1968年8月实行动员，不是去对付一个明显的敌国，而是去对付条约组织本身的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动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个组织的一种基本真实情况——苏联既把它看作用来对付联盟疆土之外“外部敌人”的工具，又把它看作控制东欧国家的工具。

由于显然有必要在这种警察行动中动用条约组织的武装力量，莫斯科便重新估计了条约的作用、组织和前途。这种重新考虑的结果看来是作出了一项决定，让东欧成员国比以前有较多的协商权。

1969年3月，华沙条约组织宣布了若干改革，其中包括设立国防部长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正是前一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使苏联显得愿意让它的盟国享有更多的决策权。该委员会由各成员国的国防部长组成，其主席始终由会议东道国的国防部长轮流担任。从成立以来，该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罗马尼亚人早在1966年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革新派在1966和1968年之间都提出过享有较多平等地位的要求，上述的这些让步大概就是为了顺应这种要求而作出的。

^① 关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其他论述，请参阅A.罗斯·约翰逊“苏联-东欧军事关系概观”(草稿，兰德公司，圣莫尼卡，1975年)以及马尔科姆·麦金托什“今日的华沙条约组织”(《生存》杂志，1974年5—6月号，第122—126页)。在探讨该条约组织的历史方面，请参阅托马斯·W.沃尔夫《华沙条约在苏联政策中的作用》(兰德公司，圣莫尼卡，1973年3月版)，以及罗宾·R.雷明顿《华沙条约：关于共产党内容抵触的决议的情况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年版)。

就苏联七十年代在东欧许多方面所推行的“有指导的意见一致”政策的一般内容来说，也可以看出这些让步。然而，外表似乎在这里又比实质更为重要。从1969年以来，苏联好象已经较多地同东欧各国磋商和征询它们的意见，但并没有给予它们决策的权力。这显然还没有使罗马尼亚感到满意，因为它已经在作为联盟成员国所允许的范围内继续独立地发展和组织它的武装力量，同时仍然坚决要求在联盟的活动方面享有更加有效的发言权，以便阻止它所不能同意的重大决定获得通过。

在联盟的军事行动方面，虽然该组织在1969年有过改革，苏联却一直保持它的控制权。这个关系重大的领域是苏联怀疑东欧国家不尽可靠的心理似乎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方面。东欧盟国的军队占驻扎在欧洲的华沙条约组织军队总数的大半，苏联不断地使之现代化，但它仍然不让这些盟国在条约组织的活动中享有任何实权。事实上，正因为华沙条约组织深受苏联的控制，它作为一个军事统一体来说仍然带有虚假的性质。它的指挥机构还主要操在苏联军官之手；苏联单独控制着联盟的核弹头；华约指挥部在通讯、运输和给养这样一些关键领域里缺乏它自己的后勤支援（这些是由红军凭它本身的资格供应的）。正是这些事例使人怀疑华约在军事上是否可以算作一个联盟。最后，正如在第一部分提到的，主要由于1968年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驻有军队，今天东欧有苏军三十一个师，比1967年多了五个师。虽然苏军在数量上不如东欧本地的军队；正是苏联的这一庞大因素为东欧地区提供了军事实力。

作为军事行动联盟的华沙条约组织的这种缺乏真实性的

情况,也许可以说明或反映出这样一点,即苏联同每一个东欧盟国以及东欧盟国彼此之间都订有为期二十年的双边友好条约,其中载明双方负有互相防御的义务。原来的条约在六十年代后期期满,接着又重新签订。这些条约的存在,从盟邦之间彼此的军事义务来说,使得华沙条约即使不是多余,也大部分并非必需。因此,纵然苏联及其盟国断断续续地宣称,如果北约组织宣告解散,它们也准备同时解散华约组织,但这种解散也未必会大大影响受苏联控制的东方联盟的军事态势。

只有罗马尼亚人似乎已经采取步骤,通过典型的宪法策略,给予大国民议会以决定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是否需要履行双边条约中所承担的军事义务的权利,从而削弱了那种军事义务的意义。苏联的其他任何盟国都没有采用这种方法来实行自卫,罗马尼亚的预防措施进一步说明它对联盟的军事义务是抱有戒心的。从军事上说,它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程度很浅;它仍然拒绝参加华约指挥下的作战演习。它通过军事代表团的经常互访,力求同北约国家、欧洲中立国家和中国的防务机构保持联系。它可能还在谋求用来自华约组织以外的装备重新武装它的部队;至少从1972年就开始进行的同南斯拉夫联合制造战斗机的计划在1975年初获得成果,据宣布已经造出了样机。

当然,对于无论双边的或华约主持下的军事义务,只有罗马尼亚才抱有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其他国家对于联盟的领导方式似乎偶然也有怨言,但并没有认真地对苏联的控制和操纵的手法提出异议。然而在一个问题上,即使苏联提出要求,它们看来也普遍不会愿意赞成给予支持;同中国进行军

事对抗的问题。1969年3月，在华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通过前面提到的体制变更的那次布达佩斯会议上，苏联显然力求其盟国公开承担义务，在万一同中国发生战争时给予支援。（布达佩斯会议是在乌苏里江冲突之后不久召开的。）它在这方面没有达到目的，后来它提出的华约义务不仅适用于欧洲而且也适用于亚洲的主张遭到了东欧国家的忽视。在万一同中国发生战争时，苏联大概会竭力援引它同东欧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中的军事条款。然而，它恐怕只能得到表态性质的响应。事实上，苏联考虑到由红军扶植起来的东欧武装力量也许需要用来对付国内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局面，或许只要它们表表态罢了。

政治和外交政策

本研究报告第一部分叙述了在赫鲁晓夫时代逐渐出现比较多样化的变动以后，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怎样力求恢复东欧政治团结的情况。虽然这方面至今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苏联领导人却还没有找到最方便的结构形式或方法来促进这种政治团结并保证其持久不变。

可能看起来手头已经有了十分方便的形式。归根到底，华沙条约组织象北约组织一样，既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它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历次会议由成员国党的第一书记参加，其原来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满足这种体制上的需要。本来，这个机构应当每年至少开会两次，但这一意图显然已经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个时期内，这种最高级会议每年召开，然而在1968年以后就不怎么如期开会了。事实上，从1970年

底以来，只召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1972年1月在布拉格，另一次是1974年4月在华沙。

从1959年以来，华约组织不时召开外长会议，但这些会议也相隔时间太长，不能起何种正常的协调作用。苏联人显然希望设立一个由一位总书记领导的强有力的华约常设书记处，这个总书记既能作出决策又能采取行动，而无需就每一项重要的决定向各成员国政府征求同意。该书记处想必象华约军事指挥部一样，将由苏联官员所控制。总之，这个新的机构如果成立，就将基本上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

苏联谋求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意图，可以追溯到好几年以前。1964年4月，在赫鲁晓夫垮台前不久，他在布达佩斯的一次发言中竭力暗示建立这种机构是合乎需要的。在担任党的领导一年之内，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9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在华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1974年4月的会议上，很可能讨论过相类的想法，而这一点连同关于军事合作的意见分歧也许是齐奥塞斯库在整个会议期间扮演了显而易见的局外人角色的原因。在较近的时候，即在1975年春天，我们又根据可靠的报道获悉，苏联人还曾力图强迫盟国接受同样的想法，并遭到罗马尼亚同样的抗拒。我们不应当认为只有罗马尼亚才反对那种想法——它在发表反对意见时肯定会是喊得最响的，但其他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可能会有相类的疑虑。

当然，出乎意外的首先是并没有设立这样的机构。例如，经互会一向有一个设置一位秘书长的秘书处；华约的西方对应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不容易

说明苏联方面为什么在行政管理上要采取这种非正式的措施，特别是在最初的时候（1955年），那时它要设立这种机构本来是并不困难的。（经过必要的修正，同样的论点也可施之于经互会。在它于1949年成立时，本来不难授予它以超国家的权力。可是在十三年之后，当赫鲁晓夫提议设立一个超国家的计划机构时，他由于遭到东欧各国、特别是罗马尼亚的反对而不得不把这一建议搁置起来。）大概苏联人指望他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足以使他们达到目标。赫鲁晓夫显然非常重视他同东欧领导人的个人接触。苏联和它的盟国之间还订有双边条约，其中包括协调对外政策的条款。在过去六年间，正如在本研究报告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勃列日涅夫已经鼓励召开了一系列多边的各级会议，以促进政治一体化。然而，尽管多边会议频繁召开，它们基本上带有特别的性质，甚至七十年代初期似乎曾经每年如期召开的联盟各党领导人的克里米亚最高级会议在1974年也并未举行。

在苏联人看来，为了协调政治和外交政策而采用的这些手段——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外长会议、双边条约、纷纷召开的各级多边会议——显然没有一种手段是他们所满意的。目前，在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和签订欧洲安全和合作协定的时代，苏联人一定把需要实现某种如意的事项看作当务之急。显而易见，如果说同西方和解所带来的担忧已经成为强使东欧各国实行新团结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它也一定使苏联人感到亟需设立一个机构，来更有效地控制东欧各国的外交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苏联在华约初成立时没有设立协调机构，正如它在1949年没有授予经互会以超国家的权力一样，而它

现在却显然渴望两者都能实现这一事实，十足反映出苏联和东欧关系的总的发展趋势。最初，苏联人当然是能够随心所欲地予取予求的；目前他们却必须通过明显的集体作用或通过耐心的基本工作和说服工作来力求达到他们一些最重要的目标。

罗马尼亚对于苏联要求设立政治团结机构的倡议所作出的反应当然不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可是，上文已经提到，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很可能也有疑虑。甚至对苏联的赤胆忠诚和对它依附得最紧密的心理状态也决没有消除它们希望在外交事务方面尽量享有灵活性的意愿。在现今国际局势松动的条件下，例如象匈牙利和波兰的政府虽然没有忘记国际局势缓和给内部带来的危险，并准备凭藉苏联的支持来防止危险的出现，却很可能希望享有较多的而不是较少的自由来利用新的国际气候。^①由此可见，部分地使苏联重新力图设立外交政策控制和协调机构这一因素恰恰就是可能会使它的一些盟国更加决心要抗拒这种事态发展的因素。

意识形态上的和组织上的党务

苏联谴责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的主要重点在于说明，在他们的领导下，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公共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在遭到灾难性的削弱，党本身正在解体。从1969年4月杜布切克被罢黜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过程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罗伯特·R·金和罗伯特·W·迪安编《东欧对欧洲安全和合作的看法》（普雷格关于国际政治和政府的专题研究报告，普雷格出版社，纽约，1974年版）。

的主要推动力是清洗党内的一切“改革”分子，恢复党在公共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这种强调党的权威的做法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得特别引人注目，但也是其他东欧国家政治生活中色彩强烈的特征。当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所涉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巩固而非恢复党的权威，以遏制六十年代至少在若干东欧国家已经不断地发展起来的多元化趋势。

伴随这个过程而来的是由莫斯科新发动的意识形态攻势，这一攻势由于国际紧张局势逐渐缓和而更形猛烈。它经常强调指出，国际关系的松动带有从意识形态上进行颠覆的危险。因此，宣告国际局势缓和意味着要加强而非削弱在意识形态上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学说的斗争。这种加强的斗争不仅要以防御的姿态在社会主义阵营范围内进行，而且要以进攻的姿态深入到意识形态敌人阵营本身的内部去进行。

东欧意识形态上的攻势不仅劲头很足，而且范围很广。这种攻势是在影响一切广泛的宣传工具、文学、艺术以及教育等等的许多方面进行的。当然，这在基本上既不新奇，也不出人意外。不过，在本文所考察的六年期间，其新颖之处在于这种广泛攻势的超国家的性质。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代表参加的多边会议的次数以及从事各种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新闻记者、作家、音乐家、广播电视评论员、宣传鼓动员、党的理论工作者等等——参加的会议的次数，已经明显地有所增加。这种在苏联指导下进行的思想再教育过程是争取团结运动的一个必要部分。

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已经开始在同苏联联盟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方面引起严重问题和矛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则更其如此。如果带有其一切特征的这种攻势是由苏联授意的，如果它力求按照苏联的要求和型式确立意识形态的一致性，那么，在斯大林之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正式姿态之一——承认党与党之间地位平等，其中并无单一的指导中心——就显然丧失了它以前所具有的任何效力。这个论断不仅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而且从组织方面来说也可以适用。作为目前意识形态攻势的主要动力，苏联共产党把它自己不但看作盟国小党的指导者，而且看作它们的指挥者，使那些小党的任务只限于传达而不是共同决定在目前历史阶段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基本准则。

东欧的党大部分在实际上始终承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然而，苏联本身在其讨好南斯拉夫的各个时期曾经不时地正式承认平等原则，于是罗马尼亚人便利用这一点来对付莫斯科，他们把党与党之间地位平等的原则列为维护其独立自主政策的原则之一。

可是，时到如今，党与党之间地位平等的神话似乎正在使苏联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的宣传对于消除象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样一些东欧国家执政党的疑虑来说仍然是必要的。对于大胆召开象所建议的全欧共产党会议来说，它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打算在1975年后期举行的这种会议正由于某些党——如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样一些执政党和非执政党——对于苏联信誓旦旦的友好平等原则是否出于真诚抱有怀疑而仍然遭到巨大的困难。而且，在国际

共运中有越来越多的党要求召开一次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如果这种会议有机会顺利召开，关于地位平等原则的宣传也是必要的。^①

然而，正由于越来越多的执政党和非执政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关于地位平等原则的表白固然在政治上做起来日益方便，同时却带来日益增多的危险。在东欧各国，必须由苏共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毫不含糊地占统治地位这一点是苏联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但它仍旧遭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更不用说阿尔巴尼亚——的激烈反对。这些党以及包括亚洲日益增多的新执政党在内的其他党一定看清楚，过去六年间东欧大部分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在党的关系上如出一辙，表明公开的表白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包含着截然相反的内容。

苏联人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所采取的办法是要防止现有的分歧继续扩大，那就必须一方面巩固苏联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使友好平等的概念永远存在。这个难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它的难以处理的情况必然会加强苏联已经存在的趋势，那就是从不断发展的世界革命进程中脱身出来，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外交和政治的理由上面。可是，只要中国出于无论何种的动机决心继续关注世界革命的进程，苏联就很难完全脱身。这个难题看起来既是不容易解决，又是摆脱不了的。

^① 凯文·蒂夫林的著作关于欧洲和世界共运范围内的这种发展所提供的资料最为丰富。特别参阅他所写的“党与党之间的戏剧性事件”（《共产主义问题》，1975年7—8月号）。

这番题外的话是必要的，因为它表明苏联同东欧各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苏联在欧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比较宽广的欧洲和世界共运的背景下，苏联坚持要在东欧本身比较狭隘的环境里支配意识形态的问题。

当然，没有什么人会希望谁出来重新建立类似斯大林在1947年创设的、赫鲁晓夫在1956年解散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那样的组织；这种组织在奉行比较独立的方针的党中间造成的疏远状况势必大大减损其无容置疑的优点。但在1973年12月，苏联和东欧各党的中央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意识形态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至今所能证实的情况来说，还是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1975年3月，在布拉格召开了一次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会议。（罗马尼亚党由于对可能采取的活动方针显然有所警惕，派了一个职别较低的官员出席这次会议。）这两次会议上究竟审议什么问题，很少透露出来，但这种会议的举行及其定期召开却是应当密切加以注意的。也许正在酝酿建立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交换情报”的非正式机构——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与会的人员级别也并不很高，不致引起人们的惊恐，但很可能是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指挥党务的一条渠道。

与苏联的双边关系

保加利亚

自从1948年特莱乔·科斯托夫被清洗以来，保加利亚已

成为苏联的所有东欧盟国中最忠实和最富有合作精神的国家。在内政方面，它也最没有使苏联担忧的理由。十分有趣的是，过去发生的那些复杂情况颇有中国的特征。保加利亚在1958和1959年有它自己的“大跃进”；党的有些干部在1957年^①后期显然对中国的人民公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5年4月，党和军队内发现了一个阴谋集团，虽然官方声称它带有亲华的动机，但它可能是受民族主义思想的鼓舞而不是受外来的“挑拨”。这些事态的发展非常使人发生兴趣，但它们比起其他东欧国家给苏联造成的问题来说就简直是微不足道了。

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原因。受到高度赞扬的保加利亚历来对苏联的同情当然是确实的。与此紧密相关但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保加利亚人对俄国人的厌恶肯定不象对任何毗邻国家的人特别是土耳其人、希腊人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人那样厉害。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是西方联盟的一部分，中立的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是它的组成部分)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岁月里由于它保持中立一直受到西方的支持，并恰恰由于同样的原因往往道受苏联的敌视，这种事实本身已经成为巩固索非亚和莫斯科之间不平等联盟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另一层原因或许应该到保加利亚共产党1945年以后的初期历史中去寻找。保共是巴尔干半岛历史最长、原来最强大的共产党，它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显得力量雄厚、比较

① 原文如此，按我国人民公社化是1958年夏季开始的。——译者

② 关于主要从1953年以来的保加利亚历史，请参阅J.F. 布朗《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保加利亚》(普拉格出版社，纽约，1970年版)。

受人民爱戴和颇有自信。它的国内派由特莱乔·科斯托夫领导，它的“莫斯科”派由该党公认的领袖、国际上著名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领导。每一派似乎都根据它自己的理解认为保加利亚的前途在于成为苏联忠实的但享有自主权的盟国，而并非成为斯大林主义变种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卫星国。到1949年底，科斯托夫和季米特洛夫都去世了。科斯托夫在一次装点门面的臭名远扬的审讯后被处决，而季米特洛夫则据称由于自然原因但在莫斯科的不可思议的情况下死去。这是保共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能恢复过来的一次心理上的打击；它似乎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该党在其对外关系中本来可能抱有的任何程度的自信心理。

保加利亚和苏联关系比较平稳的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苏联通过两国政府官员的多次互访和苏联驻索非亚大使馆的积极活动以大量财政和经济援助以及密切的注意表现了关怀。苏联的这种关怀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首先，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半岛上的社会主义前哨。由于它事实上与北约组织的两个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毗邻，它对苏联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而且，这两个西方盟国国内局势不稳，使保加利亚更有必要显得象是另一种效率颇高的稳定国家（然而，保加利亚在这方面可能具有的任何吸引力却由于希腊和土耳其对保加利亚怀有民族恶感而减弱不少）。其次，自从南斯拉夫在1948年和阿尔巴尼亚在1961年相继背叛以来，并且由于罗马尼亚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显得不很可靠，保加利亚已经成为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唯一忠实盟国——因而有必要把它保持那样的状态。第三，莫斯科似乎

已经决心要大肆铺张地奖赏保加利亚的忠诚，显然希望这种行动也会对其他东欧盟国发挥作用。作为除阿尔巴尼亚以外东欧最不发达的国家，保加利亚明显地比其他国家需要更多的经济援助。不过，单从援助的数量而言，几乎可以肯定还有政治方面的意义。

保加利亚大力支持并参加了1968年8月由苏联带头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它的贡献很小，并且带有其他入侵部队所没有碰到的地理-后勤问题。可是，把保加利亚纳入军事行动的决定显然有其政治目的：必须尽量让人把这次入侵看作获得广泛的支持。如果保加利亚没有参加，那就势必引起某种猜测，怀疑索非亚事实上可能对入侵计划缺乏任何热情，并且，由于邻近的罗马尼亚拒不参加，那就更其容易引起人们的推测。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保加利亚已经比其他任何东欧国家更加露骨地支持苏联所倡导的一体化想法；事实上，它那种不遗余力的支持已使负责的西方观察家推测保加利亚可能会自愿地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这种推测的依据是托多尔·日夫科夫和保加利亚其他领导人关于正在进入或准备进入一体化的较新和“质量上较高”阶段的言论，以及最近六年来保加利亚经济和苏联经济确实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这一事实。保加利亚共产党在1973年7月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的情况公布得很少），讨论一体化的进一步措施，同年10月在勃列日涅夫于一个月以前访问保加利亚之后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从这第二次全会结束时公布的决议中摘取的十分简短的两段文字，足以

有力地证明那种使西方对保加利亚前途作出这样过分推测的思想根源：那两段文字谈到“全面促进两国更紧密的团结、合作和一体化”，随后赞扬日夫科夫“为了一种以原则为基础的理论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奉行保共与苏共、保加利亚与苏联之间一贯的全面友好政策的态度……”。^①

保加利亚人或苏联人所说的一体化究竟是指的什么，它在完成以后将包含什么内容，谁也不清楚。或许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从表面的价值来看，或者从文字上来解释，一体化的顶点可能意味着弱国并入强国，小国并入大国。如果有这样的打算，根据有些人的见解，保加利亚看来将是实行一体化的最适宜的第一个候选国。可是，一些性质非常严重的实际困难似乎起着阻碍作用。保加利亚同苏联并不毗邻。中间有罗马尼亚把它们隔开，而罗马尼亚对其主权的小心翼翼的保卫肯定会使这种地理上的障碍成为真正的障碍。（反过来，保加利亚同苏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密切的一体化使罗马尼亚目前保卫其主权的意图遇到较多的困难。）一体化步骤在俄国同东欧的关系史上无疑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步骤的影响甚至会显得更加重要，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地区的苏维埃化还要来得重要。不仅会有许多（或许大部分）包括党的干部在内的保加利亚人加以反对，东欧其余部分的人也会把这一步骤看作不祥的先例，竭力加以抗拒。它很可

^① 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见诸罗伯特·R.金“保加利亚-苏联关系，‘活跃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欧洲自由电台，研究和分析部背景报告，1975年5月26日）。

能会破坏苏联同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之间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在象波兰这样的国家里还很可能会激起严重的不稳定局面。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一体化似乎不是一个十分高明的计划。

许多保加利亚人可能对于本国同苏联已经达到的那种合作程度感到不安，也许还对政府领导人和宣传工具把这种合作说得天花乱坠的态度感到不满。这部分的舆论大概会欢迎欧洲局势的真正缓和，作为既扩大保加利亚几乎令人窒息的狭窄生活同时又保持同苏联的坚强联系的手段。象前外长伊凡·巴舍夫这样的政府官员也许就抱有这种看法；许多了解西方的优越性并出于爱国热忱渴望保加利亚向西方学习和从它得到好处的经济官员、经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也是如此。广大的年轻保加利亚人肯定会赞成这一主张；在人们抱怨官吏压制该国青年向往西方社会方式的呼声中可以看见这方面的许多迹象。官方一向是反对这样一些明确表示的或受压抑的期望或向往的，因此保加利亚领导集团认为有必要加以告诫和采取行动。1974年2月，显然作为1973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意识形态会议的一个后果，保共召开了一次特别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提防上述的那种异端邪说。

现今保加利亚领导集团看来自认为对苏联的作用，显然不是俯首贴耳的走狗而是忠实的副官的作用，因为它负有某些责任和获得某些恩惠作为报偿——事实上，这几乎十足是封建的关系。这不是一种应当马上把它说得一钱不值的关

内的革新，例如在农村组织农工联合企业。^①在日夫科夫方面，他很可能认为同苏联人的这种关系既带来荣誉，又能满足他的要求。1974年3月，日夫科夫庆祝了他担任保共第一书记二十周年。他是华沙条约组织各党领导人的前辈，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他具体地把可靠、经验和刚毅汇集于一身的情况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例如，1973年秋季，莫斯科多半利用了日夫科夫来试探一些主要的党、特别是北朝鲜党和意大利党关于召开一次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意见。后来，在日夫科夫访问布达佩斯期间，他和卡达尔在执政党的领导人中间首先公开倡导召开这样的会议。在本研究报告以后的部分要谈到，我们还有理由可以怀疑，苏联领导人也许曾经在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关系紧张或刚紧张时利用日夫科夫作为沟通齐奥塞斯库的渠道。

托多尔·日夫科夫生于1911年，决不是保加利亚政治局的最老的成员；那个机构包括一个八十多岁的和三个七十多岁的成员，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的地位现在顶多只能算是象征性的。可是据可靠的消息他正在变老，体弱多病，而继承人的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解决。日夫科夫统治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连续排除公认的继承人。米特科·格里戈罗夫、卢切扎尔·阿夫拉莫夫以及较近的伊凡·阿巴季耶夫，虽曾被看作

^① 关于农工联合企业的描述，请参阅F.斯蒂芬·拉拉比“保加利亚的农工联合企业”（自由欧洲电台，东欧研究和背景报告，1972年9月4日）。苏联人可能已经在保加利亚鼓励这种发展，希望在苏联本身加以实施并提倡在东欧其他部分推广。1974年，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苏联人正在摩尔达维亚按照相似的方针进行实验。

可以争取继承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却在他们的前途看来有可能成为一种威胁时被免了职。其真正的结果在于那种继承可能是不那么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会产生从日夫科夫在1954年就任起到1962年终于获得权力为止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司空见惯的那种派别活动。

显而易见，无论同苏联的一体化那时已经达到怎样的程度，索非亚和莫斯科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势必会被排除掉。日夫科夫的继承人和新领导小集团在莫斯科很可能有了新的领导人时是否将同样积极地向它表示忠诚，或者是否将另辟途径以实现其目的，争取尊严和合法地位或求得生存，从面力图恢复两国特殊关系的那个重要方面呢？任何这样新的途径都可能通往马其顿。

从1948年以来所看到的产生马其顿“问题”的环境很需要加以彻底的探讨。这个问题以若干前提为根据，其中至少有两个前提目前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言之成理。第一个前提是，保加利亚对马其顿提出的领土要求乃是衡量南斯拉夫和苏联紧张关系的尺度——这个要求提得越是尖锐，两国的关系就越是紧张，反过来也是如此。认为保加利亚甚至在面临许多公民为之颇感激动的象马其顿这样的问题时也会如傀儡一样受苏联的支配这种设想从1967年以来已经有点站不住脚了，虽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莫斯科也会为了自身的目的力求利用这个问题。在过去不多几年，保加利亚领导集团已经鼓励其宣传工具大力宣扬保加利亚本国的历史，有些时候比其他项目宣扬得格外积极。其中的一个动机是要克服年轻一代在容易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时所产生的所谓“民族虚无主

义”。另一个动机纵然未经明言，却来源于这样一种颇有见解的认识，即甚至保加利亚人也不能单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求得生存。这种事态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马其顿在保加利亚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就成为—种接替(或代替)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举动，而为苏联的对外政策着想，这种事情处理起来却不象以前那样好办。^①

但是，现在必须加以修正的另一个前提是过去只有保加利亚的领土收复主义才使两国的关系变得不大愉快。撇开领土收复主义并非索非亚对马其顿的公开态度的特征这一事实不谈，它没有考虑到南斯拉夫自1973年以来从斯科普里不断发动的矛头针对索非亚就在保加利亚边境那边皮林马其顿推行的种族政策的运动。引起南斯拉夫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其顿人的“非民族化”，他们在保加利亚1956年正式公布的人口统计中人数超过十七万，从那以后就被官方和保加利亚人混同起来了。斯科普里的《新马其顿报》一向在宣扬民族主义方面首屈一指，它也批评保加利亚在皮林马其顿庆祝民族人物或重大事件的活动，因为那里是把那些人物或事件作为保加利亚而不是马其顿的人物或事件来庆祝的。保加利亚领导集团不无理由地认为这是干涉保加利亚的内政。^②这种举动在东欧当然是独特的。在中欧，有过与此相似的情况，那就是

① 关于马其顿问题——事实上也是关于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整个关系——的一份值得赞扬的研究报告，请参阅保罗·伦德维《蜘蛛网里的鹰：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布尔戴书店，纽约，1969年版)。

② 关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有关马其顿问题的意见分歧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请参阅罗伯特·R·金“马其顿问题和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欧洲自由电台，研究和分析部背景报告，1975年6月6日)。

南斯拉夫于1975年上半年攻击了奥地利对克恩滕省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所推行的政策。然而,举例来说,匈牙利政府除非旁敲侧击,并不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或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政策,尽管它对匈牙利少数民族在特兰西瓦尼亚或斯洛伐克的处境深感同情。

到目前为止,保加利亚官方作出的反应是非常克制的。不过,如果一个新的领导集团急于获得民众的支持,不象它的前任那样受苏联联盟的约束,对巴尔干外交活动所包藏的危险又缺乏阅历,那么它就可能以同样的手段对它所认为的南斯拉夫挑衅作出答复。它可能更进一步,利用这种所谓的挑衅作为借口,决定以分明是要求恢复领土的措词来重新提出整个马其顿问题。这样的推测未必完全可以斥之为想入非非;从1974年7月塞浦路斯的战争可以看出东南欧民族主义感情不断恢复活力的迹象。

莫斯科根据它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看待南斯拉夫的局势这一点,甚至可能支持或纵容保加利亚在马其顿问题上的敢作敢为的行动。可是,即使它支持这样的行动,从而赢得保加利亚政府和人民的感激,保苏两国的关系也会发生微妙的但并非微不足道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保加利亚就会在没有得到苏联指示的情况下开始大幅度地改变它的政策。事实上,从斯大林否决季米特洛夫提出的让罗马尼亚参加一个巴尔干联邦的建议以来,莫斯科也许第一次会确实响应保加利亚的一项外交倡议。不用说,这可能是一项灾难性的倡议,也许会在东欧其他有争论的地区引起连锁反应。然而,东欧所实施的那种共产主义并没有解决民族问题或使这一问题得到比较满意

的结果。它一向忽视这个问题，必要时甚至加以压制，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已经使其激化。这种做法的后果还有待体验和处置。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推测，保加利亚在苏联人心目中的战略重要性很可能在以后几年还会有所增长。地中海东南部的不稳定局面使苏联有更多的机会在该地区扩大它的影响。可是，苏联目前无法集中足够的军事力量逼近这个地区——并挪动一步逼近中东——这就使它不大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一种逐渐显露的背景下，保加利亚的重要性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如果在不久的将来，由于欧洲安全会议太平无事地让开道路，苏联在保加利亚的军事力量甚至加强到在那里驻扎苏联军队的地步，那将是不足为奇的。

事实上，既然保加利亚对苏联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二十五年以来苏联在巴尔干的地位不断削弱，而保加利亚现在是它唯一忠诚的盟邦，那么，苏联人至今没有在那里驻军这一点倒是出人意料的。可以解释这个疑团的唯一论点是外交上的考虑重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假如在保加利亚驻扎苏联军队，那就会严重地损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想要同南斯拉夫和解的努力。那些驻军也会使土耳其和希腊发生惊慌，有助于两国的局势趋于稳定，也许还会促使安卡拉和雅典在防务上进行合作，并使这两个国家更加紧紧地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可是，苏联人目前可能看到一种形势正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应当放弃外交上的缩手缩脚的做法，抓住时机，直接利用一种可以变得对他们有利的不稳定局面。当然，把苏

军开进保加利亚所冒的风险和产生的影响仍然会是相当严重的。除了上一节已经提到的危险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引起新的罗苏危机，^①甚至增加东西方在东南欧的紧张局势，虽然它那时在中欧有所缓和。总之，那种行动可能引起范围很广的连锁反应。

不过，在苏联人看来，这些风险似乎不那么严重或确凿无疑；象对罗关系上产生新危机这样一些风险也许是值得承担的。苏联人可能认为可以得到的报偿或许对所付的代价和所担的风险是值得的。因此，在保加利亚驻有苏军这一问题是西方计划人员、巴尔干半岛各国领导人和保加利亚人民应当估计到的一种可能性。

捷克斯洛伐克

从1968年入侵或更正确地说是从1969年4月杜布切克下台以来苏联对捷的政策几乎完全旨在加速“正常化”过程。根据莫斯科的看法，“正常化”意味着从公共生活中根除“右倾修正主义”（即1968年改革）的一切表现及其支持者，恢复列宁主义准则（特别是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毫无保留地重新效忠于苏联。

这些大概是向古斯塔夫·胡萨克在1969年4月成为党

^① 罗马尼亚人担心苏联人事实上正在策划这种步骤，而这种忧虑也许曾经促使他们在1974年夏季透露消息，说苏联人正在要求开辟一条穿过罗马尼亚到保加利亚的“过境走廊”。苏联人也许实际上已经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同他们达成一项协议，使苏军运经罗马尼亚的行动合法化。罗马尼亚人在惊恐之下，就故意夸大了或者甚至歪曲了这项要求。

的第一书记后提出的主要要求。选中胡萨克这一决定是个大胆的决定，事实上象 1956 年在匈牙利选中卡达尔的决定一样大胆。在要求绝对可靠性的形势下，这两个人在苏联的心目中可能都不是很正统的。他们都曾被本国自称具有最真纯的正统观念和最坚定地效忠莫斯科的领导集团无情地投入监狱；他们以前都是出名的改革派，都是有了定型的人物。他们显然都曾力求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他们是处理本国具体危机的最适当的人选。然而，尽管风险很大，象两者的情况所证明的那样，苏联还是作出了那种决定。

两种情况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卡达尔似乎已经立即就博得了赫鲁晓夫的信任。另一方面，胡萨克似乎已经经受了勃列日涅夫的长期考验。当时还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猜疑，认为在 1969 年 4 月以后的一段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领导人（如瓦西尔·比拉克和阿洛伊斯·英德拉）曾与克里姆林宫有过接触，而这些接触是同忠于胡萨克的精神不相符合的。也许勃列日涅夫故意挑拨了布拉格的一些人或派系之间的关系；也许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阶层的各个集团在莫斯科都有它们自己的赞助人。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大使斯捷潘·契尔沃年科在鼓励入侵和促使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之后，又继续在胡萨克领导下贯彻的正常化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在 1973 年的召回很可能是苏联人信任胡萨克并相信正常化过程业已完成的最后迹象。

从 1969 年以来，苏捷两国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和在不同级别上进行联系，这在共产党国家和党之间是正常的关系。然而，以捷克斯洛伐克来说，这种关系的两个具体因素值得提一

下。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作为传达信息、提供意见和监视的机构的作用——基本上类似斯大林时期苏联驻东欧的所有大使馆——在上文已经略为提及。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远没有那样重要，它主要被用作传达信息的机构。可是，这两个机构作为策划阴谋和进行派系疏通活动中心的“业余”作用是不应当低估的。看来毋庸置疑的是，契尔沃年科大使与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保持接触，这些人无论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还是由于他们认为胡萨克的政策过分温和而反对他。当博胡斯拉夫·赫努佩克在1970年9月至1971年12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时，这个被认为与比拉克和英德拉这样一些领导人有联系的持不同政见的左翼集团看来有了一个在苏联宫廷或接近苏联宫廷的朋友。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现在大概也密切注视着克里姆林宫内部发生变动的集团和趋势，因为这些动态可能影响对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欧的政策。顺便提一下，赫努佩克从1971年12月以来一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已经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企图改善其对西方的关系这种努力的活跃的积极分子。也许象契尔沃年科一样，他的召回标志了苏联进一步对胡萨克的信任。

苏捷关系中第二个与众不同的因素是至少有五万苏军（仍然）“暂时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由于这些军队的存在，它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共生活产生在心理上起抑制作用的无法估量的影响，纵然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苏联千方百计想使这些驻军不引人注目和受到欢迎。除了如帮助收割之类与公众接触的突击出动之外，它们尽可能与居民隔绝，希望借此消弥他们的敌意，但他们对于驻有苏军这一点

所表示的不满是如何也消弥不了的。

这些驻军(一部或全部)究竟会驻多久，也许取决于许多因素，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局势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推测起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苏联根据在维也纳举行的共同均衡裁军谈判而在欧洲采取的军事策略。据估计，苏联人由于1968年的入侵在中欧增加了五个师。这些师使他们在维也纳的赌局中多了一笔本钱。大量的军队也许会从捷克斯洛伐克撤走，一部分转移到喀尔巴阡山背后，其他部分开进匈牙利，而匈牙利是苏联人故意把它排除在维也纳谈判范围之外的一个国家。

实际的问题在于苏联是否会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局势十分稳定，可以撤退它的任何一部分军队；换句话说，在莫斯科看来，苏军的存在究竟是“正常化”过程的一个如何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消说，这个问题是得不到任何确定不移的答案的。也许直到大约1972年为止，苏军坚定的存在被看作是保证稳定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来，随着“正常化”过程的发展，可能看起来其他因素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胡萨克似乎已经采用比较小的直接压迫手段压制了政治反对派。在政治上普遍抱有的冷淡态度代替了以前在公共生活中存在的激动情绪。在这方面，已经重新出现了某种民族宿命论。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1948年的暴动和1968年的苏联入侵，是一些本来会搞垮大多数国家的经历。特别是就捷克人来说，这些事件已经产生了听天由命的冷漠的处世态度，退避到不公开谈论国事和追求个人享乐的境地。今天普遍弥漫着的正是这种情绪。

这种听天由命的精神，对胡萨克的由苏联创议的正常化运动本身已经产生了深远的但带有双重意义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有助于推行正常化运动。在若干年期间，局势保持了平静，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或直接破坏事件，公开对抗的情况也比较少。在苏联帮助下，经济状况逐年有所改善——在消费品部门尤其显著。许多人有充分的机会顺利地利用他们在政治上不出头露面的状况来享受还算舒适的私生活。例如在1973年，经济状况的改善使布拉格的一些公民产生了在乡间建筑别墅的狂热；那时国内外制造的汽车的供应已经变得非常充足。然而，官方对正常化过程的意图中包含着一个必不可少的第二阶段。一旦局势业已恢复平静，1968年的精神业已消除，就要提高列宁主义的社会觉悟，恢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希望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的顽强精神面前显然已经破灭。因此，展望未来，多半是一潭死水，缺乏热情。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同苏联团结一致，但它出现一种真正独立生存的局而的前景看来确实相当渺茫。尽管如此，由于到1974年中期所实现的稳定和所避免的危险，苏联人和胡萨克领导集团都有更多的理由感到满意而不是沮丧。

可是，到了1974年年底和1975年上半年，出现了布拉格之春的一些最著名的改革派公开反抗的情况，这一点一定已经使这种满意的心情发生动摇。已故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的一本回忆录以及杜布切克写给斯姆尔科夫斯基的遗孀的一封信在西方发表了。1975年4月，西方报刊还登载了上一年10月杜布切克写给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抗议警察骚扰和一般正常化政策的一封长信的摘要。同样在西方报纸发表

的，还有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卢德维克·瓦楚利克以及哲学家卡雷尔·科西克的抗议书。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兹德内克·姆利纳尔^①起草的为1968年改革政策辩护的一份二百多页的文件，国内和流亡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鼓吹者都希望能够把这个文件递交给正在筹备的欧洲共产党会议。

这阵反抗风波的意义不应加以夸大。根据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整个活动场所的背景以及1969年以来已经度过的六年来看，风波可能是比较小的——用米歇尔·德布雷先生的话来说，是进一步正常化道路上的偶然事故。然而，它想必已经使布拉格和莫斯科的领导集团颇为紧张不安，根可能成为引起苏联人改变原来的打算，把更多的军队长期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重要因素。

至于胡萨克，我们可以料想，持不同政见者的这种抗议的爆发对他来说将是一次相当大的政治挫折。苏联对他的信任可能已经动摇，同他争夺领导权的手有些曾经不断地力主对1968年改革派采取更加强硬的手腕，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使他丢脸的机会。他那确立作为党的领袖的威信的任务已经变得难以完成。首先，莫斯科究竟对他是否完全信任，这还有很大疑窦。这些疑窦促使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集团内部的一些人

^① 兹德内克·姆利纳尔生于1930年，1964—1968年任捷共中央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书记。在布拉格之春的期间，他是党的行动纲领的主要起草人。1968年6月至11月，他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68年9月至11月，他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1968年1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辞去了党的一切职务，1969年9月被开除出党。

对他的权威表示怀疑，这个事实导致一系列的个人屈辱，也许其中最痛苦的是决定在1970年把杜布切克从驻土耳其大使任上召回（胡萨克当初安排这项任命是想保护他的前任不受敌人报复）。在若干场合，好象比拉克或英德拉而非胡萨克是党的实际领袖。

但是，他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才干，同时苏联人意识到他那比较温和的措施至少正在稳定局势，这些情况使许多事情变得对他有利。彼得·谢列斯特1972年在苏联的降级对胡萨克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两地的敌手来说很可能是一个打击，因为谢列斯特被认为不仅竭力拥护入侵，而且热烈提倡在入侵以后实行镇压政策。一个更直接的打击是1971年12月英德拉被调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改任联邦议会主席。至于曾经被认为是苏联人在布拉格的真正最信任的人比拉克，他仍旧畅言无忌，相当活跃，所担负的责任的范围也异常广泛。他那比较强硬的路线有时候是可以十分明显辨别出来的，但人们现在通常并不把他看作是对胡萨克的个人严重威胁。他在党机关那些喜欢采取胡萨克所不赞成的严厉镇压的部分人中间也许还获得相当大的支持，那种镇压包括对杜布切克、现已去世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斯帕采克和其他一些改革派领导人的审讯。在入侵以后不久，苏联领导集团也可能倾向于实行这样的镇压，但胡萨克似乎曾经坚决加以反对。莫斯科逐渐转变到以权宜之计为理由而支持他的观点。后来在1973年，有可靠的报道说明，苏联人同一些现今被排斥的主张改革的技术专家就他们回去担任原有专业的问题有过接触。这样一种转变招致了比拉克的失败，但不一定使他在政

治上趋于死亡。在1968年以后的东欧，在操之严厉方面犯的
错误并不象在例如斯大林以后时期那样富有危险性。不管怎
么说，这总比在相反的方向犯错误来得稳妥些。

因此，对于比拉克这样一些人来说，1975年春胡萨克遇
到的严重麻烦、特别是杜布切克所造成的严重麻烦，可能已经
被认为是提供了一个以前似乎业已消失的机会。但那麻烦基
本上是属于个人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事实上，那段插曲
看来已在政治上加强了胡萨克的地位——至少暂时如此。苏
联领导集团以及想必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领导人，显
然认为改革运动的这种挑战和全世界对此的注意应当是现状
和胡萨克本人地位的加强，而不是在布拉格出现不团结现象
的信号。这种认可也并非纯粹属于口头上的：1975年5月，
他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以代替现在完全被排斥的
斯沃博达将军，同时还保留着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目前尚未见分晓的是，胡萨克权力的这种明显的巩固是
否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策的任何改变。^①然而，我们首
先必须估计一下什么样的改变可能是行得通的。

胡萨克1969年原先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书记的情况可以
与卡达尔1958年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书记的情况相比。在这

① 一些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要问，胡萨克晋升到总统职位是否意味着他的
权力有了保证。他们坚决认为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集团内部的反对派可能继续阻
止胡萨克采取比较积极的政策。有些人甚至把他当选总统看作他政治上走下坡
路的开始，认为他在1976年4月召开的下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党代会上很可能要
被迫放弃他作为党魁的地位。（例如，请参阅1975年5月30日《福兰克福汇报》
中安格拉·纳普的文章。）不断遭受挫折的反对派将继续开展活动这种说法似乎
是言之成理的，而所谓胡萨克面临着政治上的没落这种说法却未必如此。

方面，有些人提出疑问，在正常化过程完成以后胡萨克是否会开始实行一项类似卡达尔在匈牙利实行的改革计划。因为据说只有这样的计划才会使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恢复元气，并至少稍稍有助于使这个社会与新秩序协调一致。然而，这个问题的论据似乎并不正确。它忽视了苏联的影响和意图这一外在因素。（事实上，在除罗马尼亚以外的任何华沙条约国，把苏联的影响说成一种外来因素或许是不确切的。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说法尤其不确切，因为苏联的影响在那里仍然是最强有力的国内因素之一。）胡萨克只有依靠苏联的支持和按照苏联的条件才得以巩固他的统治。这并不排除在贯彻和适应苏联意图方面有很大的余地，但它当然确实不容采取一种与苏联关于东欧统治方法的主要想法大相径庭的政策。重要之点在于政治环境与卡达尔实施其改革计划时的政治环境相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卡达尔业已巩固其自身的权力并重新加强匈牙利共产党的权力时，本研究报告第一部分所概括论述的赫鲁晓夫时代比较宽容的态度已经确立起来。这就使卡达尔的“新方针”能够开始实行并取得成功，引起匈牙利人民日益热烈的响应。胡萨克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他不能采用一项改革政策的那些革命的、多种多样的、相互影响的方面。他的框框要窄得多。

然而，在这比较狭窄的框框里面，看来还有一些胡萨克能够并希望采取的步骤。例如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很想把许多由于1968年的经历而仍旧遭到排斥的经济和技术知识界人士召回到经济部门中来。（前面已经提到，有些苏联领导人或许也表示同意。）但比拉克公开宣布他强烈反对这样的行

动，^①并且他显然还不是单独一个人的主张。如果胡萨克现在觉得他的力量非常强大，他当然能够不顾比拉克之流的反对，着手把成千上万有关的专家召回到经济部门。在经济部门别的方面，可以采取一些合理化措施，并且事实上也已经开始进行，例如工资制度的一项改革。报刊上正在发表许多意见，强调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集团的几乎每一个成员都必须理解到：近几年逐渐开展的繁荣局面是表面现象而不是真实情况，缺乏任何真正高效率的经济基础；预料将会出现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有些申述这种意见的人还小心翼翼地提出变革的建议。^②然而，即使在所规定的框框内存在着变革的机会，这里还必须记住两点：首先，无论按照意愿或经验来说，胡萨克都不是真正的“革新者”；他偏爱的是由中央集中控制的计划工作和管理工作，以及坚强的政治控制手段。其次，目前使东欧各国深感苦恼的种种经济困难趋向于使中央对例如投资分配和人力开发等项严加控制，在客观上超过必要的程度。因此，根据人力、时机和所规定的行动范围来看，顶多只会有一点零零碎碎的合理化变革。

与此相似，国内政策的其他方面预料也不会有多少显著

^① 参阅1972年11月9日他在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72年11月13日《红色权利报》）。在这篇发言中，比拉克嘲笑了他所说的“青天理论”，即认为国家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1968年的“罪过”可以被“宽恕和忘掉”这种想法。

^② 例如参阅1975年1月《政治经济》杂志中约瑟夫·戈尔德曼的文章以及1974年12月4日和11日《创造》周刊中赫伯特·杜尔科维茨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托马斯·赫尼根“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问题的讨论仍在进行”一文中有所论列（欧洲自由电台，研究和分析部背景报告，1973年3月19日）。

的变革。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行动会象以往六年期间那样受到镇压，这种镇压一般以不违背法律文字为原则。^①可是，对于那些现在准备合作的以前主张改革的人——例如作家和新闻记者——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加速过去两年业已稍有收获的公开表示和解的过程。另一方面，业已加强的、有时是蛮横的对罗马天主教會的镇压措施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在斯洛伐尼亚，这种迫害将特别厉害，至少在较低的一级是如此，因为那里的天主教义甚至教权主义在当局的眼中看来仍然可能是强大的。

斯洛伐克的宗教迫害同斯洛伐克政府的其他方面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般说来，过去六年来斯洛伐克的正常化过程远远不象在捷克地带实施得那样严厉。其主要原因在于后者的要求改革的动力比在斯洛伐克强烈，而在斯洛伐克，党内外许多人士都认为达到民族主义目标的计划应比政治和制度上的改革优先加以考虑。其结果是，在1968年8月以后，没有多大必要去肃清斯洛伐克的自由主义，因而当局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温和得多，在政治和文化上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这样，虽然联邦的结构——实现斯洛伐克人强烈愿望的手段——从它最初在1968年10月批准以来已经改动很多，

^① 一些为抗命负责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975年遭到住宅搜查和拘留审讯。但法律条款显然得到遵守。社布切克身受其害，被安置在斯洛伐克森林委员会担任较低职务。四方的注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使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免受起诉，这很难说明。然而，胡萨克从来是不赞成政治审讯的。

卡雷尔·科希克特别遭到残酷的折磨，这引起了西方各共产党集团的令人难为难的抗议（根据领导人的观点），其中包括让-保尔·萨特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抗议。

以便给予布拉格的中央政府以更大的权力，可是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人中间似乎至今并没有引起任何程度的民族挫折。事实上，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存在的这种民族挫折往往以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不满的形式而并非在斯洛伐克人中间有何不满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而受到影响的捷克人在正常化期间由于斯洛伐克获得比较宽大的对待而感到生气；他们看到布拉格政府带有过分浓厚的斯洛伐克色彩，也表示不满。（胡萨克高踞总统职位这一点并不会减轻这种不安。）过去两三年访问布拉格的许多人士已经指出这种情绪的有害因素，有些人甚至报道说，人们正在利用这种情绪作为反对胡萨克的政治手段，特别是英德拉正在企图领导一个捷克民族的院外活动集团来反对“斯洛伐克人的统治”。这是政治局势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消长，只能用心理上的说法而不能用其他任何说法来加以解释。然而它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最后谈一谈对外政策。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政策大部分受苏联人所规定的框框的制约，它的对外政策当然就更加取决于这一因素。可是，恰恰就在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没有违背苏联的意愿，也至少畏缩不前，未曾按照莫斯科所希望的速度开展活动。布拉格在1973年就签订两国关系正常化条约、即涉及废除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条约同波恩进行棘手的长期谈判时完全缺乏灵活性。细节本身在这里是毫不相干的。有关的问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集团显然可能用一种在苏联人看来一定是令人灰心丧气的紧张不安的勉强心理对待了那几年同波恩争吵的高潮。

如果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度，那是容易解释的。当时想必还残留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起对德国抱有的敌对情绪；政府里还有象前总统诺沃提尼这样一些在各集中营里关过的人。然而——现政权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的是——西德在其中扮演了角色的布拉格之春有它自己的创伤，因为据说越过西部边境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渗入的颠覆势力被认为是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后，仅仅过了五年，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被大力推进同波恩达成协议。这会不会引起那种促使自由主义复活的关系呢？也许过去被认为来自所谓西德“复仇主义”的危险已经减轻，但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却不得不再度面临意识形态颠覆的潜在危险。并不出人意外，在这方而最畅言无忌的是那些主张采取比较强硬路线的分子。然而，胡萨克领导集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同样怀有他们的疑虑。

这种分析引起一些人的反对。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集团在各方面都依靠莫斯科，它就不会违抗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它的西方政策。因此，甚至在这里，布拉格的勉强态度也可以用苏联的某种外交策略来加以解释。对于这种意见，我们不妨回答说，捷克斯洛伐克同波恩的关系不过是苏联西方政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并且，无论如何，苏联人象别人一样，知道布拉格和波恩之间最后是会达成协议的。因此苏联没有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要它立即接受对方的建议。其次，我们完全有理由不把捷克斯洛伐克的畏缩不前看作一个担心暴露其新缺点的仰人鼻息的孱弱政府的典型反应。所以，这个

政府的态度是与它对苏关系的性质不相协调的。在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和处于孤弱地位的另一方之间的伙伴关系中，后者由于包含着分崩离析的危险，有时具有它本身的讨价还价的力量。

人们通常都承认，东德在同波恩的谈判中态度固执是由于它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比较亲密的关系会带来明显的危险。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看来已经在这方面结成了保卫自身利益的同盟，这是以后还要讨论的一种特殊关系的一个方面。布拉格-东德的这种固执态度等于是消极地表现了两国的自主权。由于东德的固执在苏联看来是比较严重的，这就引起了反响：乌布利希的免职。捷克斯洛伐克的固执关系不大，因而被容忍了下来。最后，在1973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签订了“关系正常化”条约。捷克斯洛伐克人可能已经促使对方接受他们的某些论点；苏联人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自从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第二个德国诞生以来，苏联和东德的关系经历了若干阶段。第一阶段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后半期为止，具有东德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完全依赖莫斯科这一特征。要是没有苏联占支配地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恐怕根本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在1961年8月筑起了柏林墙以前，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后期，东德政府已经逐渐显示出自作主张

的初步迹象,并且这种迹象在1961年以后还要有所增多。例如,在1953年东欧动乱之后,经互会在赫鲁晓夫指示下实行调整,就在这个时候,东德经济学家提出了关于经济专门化的设想,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促进东德已在萌芽中的民族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德国问题已经成为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当赫鲁晓夫1958年制造柏林危机时,很可能是乌布利希对他施加了影响。

当时看来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就东德政府来说,它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就许多东德人来说,他们对于存在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事实逐渐表示接受或顺从。当然,上述两个因素是非常紧密地相互影响着的,而这两个因素本身又深受镇压1953年7月叛乱的影响。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当时逃往西方的途径仍然敞开着,并且被广泛地使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无法或不愿逃跑。至于说到东德政府本身,尽管它仍然风雨飘摇,并不顺理成章,但它终于逐渐形成一个包括其强制机构在内的实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不能独立生存,然而它那时已不只是个名义上的国家了。

1961年修筑柏林墙,显然是乌布利希政府对苏联领导人拚命施加压力的结果,而苏联领导人最初可能是不愿意这样办的。这是一个较弱盟国由于可能发生总崩溃而对较强盟国施加极不相称的影响的一个近乎典型的事例。在国际和国内,柏林墙都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后果。在东德本身内部,分别影响政权和民众的自信和顺从相结合的征候大大地加强了。从1953年以来有所发展但由于逃跑的途径继续存在而大为减弱的民众的顺从心理,在各方而都表现了出来。不管怎么

说，许多反共最力的东德人在柏林墙修筑之前早已离开了东德。东德政府的自信在五十年代末期稍有增长，但在1960和1961年当人们通过柏林背离成风时又受到了打击，这时它得到了恢复，然后又有所提高。接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六十年代有了十分惊人的发展。

这些发展不可避免地对它和苏联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政治和经济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再是苏联的包袱了，它这时成了苏联盟国中局势最稳定和经济最雄厚的一员。瓦尔特·乌布利希是东德的一位坚强、能干和经验丰富的领袖，他要求在东欧各国领导人中间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甚至要求和克里姆林宫本身保持特殊的关系。尽管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情况，在乌布利希统治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提出的要求看来还是范围相当广泛的。例如，按照东德人的看法，1963年实行的新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样板，因为它既带来了经济发展，又带来了政治稳定。东德人声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后来实行的经济改革只求经济发展而显然置政治稳定于不顾，所以应当反对。有理由可以认为，无论在双边或经互会体系内的经济关系中，东德充满自信的主张是同它不断增强的实力合拍的。足以表明潘考夫^①在同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事实是：赫鲁晓夫好象一开始就接受了潘考夫关于经互会各国经济专门化的论点，即欠发达的成员应该主要集中力量从事原料和农产品生产。这项安排在六十年代初期因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反对而遭到否

^① 潘考夫是柏林的一个区，东德党政机关都设在那里，西方把它作为东欧政府的代名词。——译者

决，这对东德人是个打击，但并没有使他们放弃其享受特殊照顾的要求。

可是，既然东西方关系影响到德国问题，正是在这种关系上潘考夫的固执已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也就是国家生存的问题。瓦尔特·乌布利希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所面临的大问题是怎样才能提倡并同时调和两个显然矛盾的概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东德的国家地位。（对乌布利希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个人问题，因为他晚年变得象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样，把他自己和他的国家密不可分地等同了起来。）似乎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教育训练、思想倾向和工作经验的关系，乌布利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并且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愿意接受莫斯科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苏联国家利益等同起来的倾向。但是，在他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的最后五年里，由于东德变得更加强大，同时骤然被推上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他开始认识到，苏联所抱有的凡是对苏联有利的事情也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利这种观点未必对东德总能适用。因此，他直接碰到了其他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所面临的同一问题：明显的本国利益不受苏联利益支配（有时实际上违反苏联利益）的问题。乌布利希对此作出的反应坦率得几乎难以形容。看来越来越对他的政治态度起支配作用的理论是：凡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利的事情，总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利——从而也对苏联有利。^①

^① 关于乌布利希这方面的政策以及东德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相互影响问题的讨论，请参阅德尔夫·克罗恩所写“东德”一文，载《局面混乱的共产党

这就是1964年10月以前使他同赫鲁晓夫发生某种程度冲突的理论，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新领导班子初期的优柔寡断的年月里，这种理论却运用得相当成功。这个时期大致相当于波恩在其东方政策上实行新方针前时期，它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地位带来了危险。乌布利希填补了苏联放松领导后留下的真空，于1967年初开始运用巨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影响，说服犹豫不决的苏联领导人最后代表东欧拒绝了波恩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东德领导集团（正确地）认为西德主动向其他东欧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孤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战略的初步行动。与此相类似，乌布利希在1968年较早的时候就证明是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死敌。布拉格事态的发展不仅违反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观念，而且给东德带来了危险。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取得任何永久性的成就，那就会产生一个敌视潘考夫和比较同情波恩的领导集团。到那时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会在侧翼受到包围。万一——当时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波兰迟早遭到改革派病毒的毒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会四面受敌。由于苏联举棋不定，东德在一场危机中所发挥的影响又变得很大，似乎同他的地位颇不相称。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远不如乌布利希那样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斯科作出的扑灭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决定恰恰成为导致东德对苏影响衰落和最后乌布利希彻底垮台的因素。一方面，入侵消除了德意志民主共

国家》，亚当·布罗姆克和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合编（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3—94页）。

和国颇为担心的侧翼受包围的危险；它也似乎恶化了国际局势，使波恩同东欧其他国家改善关系的前景更形暗淡。而且，入侵似乎也已经消除了政治修正主义的病毒。可是另一方面，苏联入侵的决定证明是一种迹象，表示它的领导集团终于要把同盟国家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缺乏领导的真空时期业已过去，使潘考夫在1964到1968年期间确实得以发挥作用的机会也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上，乌布利希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感到心满意足的日子必定是屈指可数的。他在恢复政治正统观念的广泛行动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愉快心情，势必要被莫斯科在东西方关系方面所采取的或鼓励采取的行动冲得烟消云散。在这里，苏联人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东德的国家利益肯定是有抵触的。1969年3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最高级会议作出决定，要重新提出（虽然以比较强硬的方式）全面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建议，特别要召开曾被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所中断的欧洲安全会议。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是乌布利希1967年春反对西德建议和1968年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坚定盟友，但他在1969年5月却宣布波兰愿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始谈判。1969年秋，一个决心要改善同东方的关系的社会党-自由党联合政府在波恩掌了权。苏联领导人对此决定爽快地作出了表示合作的反应。

事态的变化也确实有它令人宽慰的方面。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并不象上届西德政府的政策那样明目张胆地要从侧翼包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勃兰特政府是在苏联入侵捷克斯

洛伐克以后上台掌权的，它认识到，企图撇开莫斯科同东欧各国政府进行谈判是枉费心机的。它抛弃了哈尔斯坦^①原则，实际上扫除了妨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上获得承认的一切障碍，而这正是东德政府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

主要使乌布利希领导集团感到惊恐的是，西德新的东方政策以泰然自若的坦率态度希望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多方面的官方和非官方接触。尽管东德政府在国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政界上层人物团结一致，一大批掌握实权的优秀技术专家已经形成、得到鼓励并作出贡献，^②它的行政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效率很高，并且出现了“经济奇迹”，但是，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比，除体育竞赛以外，它在各方面仍然颇有相形见绌之感。它希望从波恩那里得到的是全面正式承认这一政治上的胜利（这一点它还没有完全达到）而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即后来众所周知的“划定范围”的姿态。

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当然也是“划定范围”政策的坚定信奉者。这一点它们以后将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对西方提出的某些谈判要点的答复中清楚地表明出来。可是，如果说大多东欧首都关于同西方发生社会接触患有神经过敏症，那么潘考夫就差不多患了偏执狂。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个政府在以东德的国家意识教诲其民众方面还收效甚微。例如，它认为民众的国家主义观念还不够强烈，只能同西德发生一种经过

① 瓦尔特·哈尔斯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长（1951—1958）。——译者

② 参阅彼得·克里斯琴·卢兹《东德正在发生变化的党的中坚分子》（麻省理工学院1972年版）。

十分严格的甄别和挑选的接触，经受不住来自西方的任何影响。乌布利希优先考虑的一项政策是要形成一些在使东德国家永远生存下去的努力中会享有既得利益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已经毫无疑问地有助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取得许多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东德的统治者确实很不愿意让这些阶层去经受那种关于是否效忠国家的唯一真正值得的考验：同西德社会及其相应的阶层进行持久的接触并在必要时进行竞争。（在这方面，比较一下西德和东德的波恩东方政策的反对者倒是颇饶趣味的：前者表示反对，因为那种政策可能减少重新统一的机会；后者表示反对，因为它可能减少分治的机会。）

按常理推测，人们或许以为乌布利希会从这样的事实得到宽慰，即勃兰特的东方政策首先是通过莫斯科而不是直接向东欧各国提出的，而他根据经验知道有些东欧国家是非常愿意同波恩建立充分的外交关系的。一般说来，大多数其他东欧国家一向不喜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这种情况的许多明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因素，即傲慢和妒忌；乌布利希以东欧思想上和实际上的模范自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认为它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它对其他东欧国家奉行区别对待的经济原则，并且（或者）实际上这样做了；它通过“后门”同波恩方面进行贸易并获得信贷；它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最后，许多东德代表看来往往体现着那些通常同“坏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缺点，因此他们个人的傲慢自大已经引起了很多恶感。相形之下，尽管东德领导人不断地想方设法企图证实西德的“鬼怪”形象，西德人就个人来说在六十年代中期

却开始在东欧官方和非官方人士的心目中留下“好德国人”的印象。这一点由于1963和1964年在东欧各国首都设立了小型的西德贸易代表团(只有驻布拉格的代表团到1967年才开始设立)而表现得特别明显。东欧的官员并且常常还有公民,往往把这些代表团看作代理机构或临时使馆,而固执的、惊惶失措的东德大使馆官员必须经常纠正人们的这种想法。这就变成了东德不得人心的另一个原因(现在既然西德的贸易代表团已经升格为大使馆,这种情况想必更加突出)。当然,对乌布利希来说,重要的是权力而不是名望。然而,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众不同的处境中也许看出了权力和名望之间的联系,并且看到它是怎样朝着有利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方向发展的。因此,他本来应当欢迎勃兰特在其贯彻东方政策时不来诱导东欧人的决定。可是,他当时正在丧失他在莫斯科的影响和赞助者。只要乌布利希自己和苏联领导人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下的定义彼此一致,他就可以平安无事,踌躇满志。当双方的定义开始出现分歧甚至发生冲突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和他自己的利益就要受到威胁。当他拒绝让步时,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1971年5月,乌布利希被体面地和巧妙地解除了职务,理由是年老体弱。他保留了国务委员会主席这一显赫的但基本上有名无实的职位,直到他1974年去世为止。^①在一次少有的、事先经过精心安排的、井然有序的酝酿共产党继承人过程中,早就被认为有接班希望的埃里希·昂纳克当选为德国统

^① 按乌布利希死于1973年8月,这里作者有误。——译者

一社会党第一书记。苏联领导人至今还没有任何重要的理由对昂纳克表示不满。在国内事务方面，他把在经济部门着眼于思想教育的措施同比较灵活地对待知识分子的办法（乌布利希也不见得并不灵活）和比较放松的统治方式结合起来。他有意识地力图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其盟国之间的形象，放弃了东德要在同盟内部享有特殊地位或获得尊敬的一些比较容易造成损害的要求。在同西德的关系上，无论在总的方面还是在有关西柏林的具体问题方面，他多方留难，并且以后肯定还会这样做。目前还不清楚的是，究竟哪些麻烦是单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引起的，哪些是由苏联唆使或共同造成的。然而有理由推测，东德的反对推迟了例如1972年四国对柏林问题的最后协议，而潘考夫迟迟不实现它自己同意的与波恩互换外交使节的步骤，其拖延时间之长已使苏联感到不快。可是，对莫斯科来说，这些都不是它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既然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上已经有了充分的突破，这一类的障碍是可以容忍的。

苏联-东德关系中的基本因素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以后想必还会继续如此：双方都有讨价还价的手段。东德领导人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本身是莫斯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可贵的一项收获。在同莫斯科谈判时，他们可以利用本国的力量和弱点。东德的经济是发达的，并且比较现代化；它在苏联的贸易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今仍然向苏联提供很多比较尖端的机器。它在中欧东部由于面对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防止波兰社会倾向西方的屏障。在世界范围内，它得到一百好几个国家的承认。

这些就是它的力量，其他不一一列举。它的弱点在于它非常苦恼地摸不透它所统治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它所扶植起来的上层人物是否忠诚。这是它在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必要时还能利用的弱点。

然而，莫斯科的手段还始终是最初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苏联建立起来的，并且由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存在——以及一个繁荣昌盛、民主气息十分浓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想必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局面——它依然是苏联在东欧建立的最脆弱的国家。其他东欧国家至少了解它们的国家地位。在东德人逐渐了解他们的国家地位以前，东柏林的条条道路毕竟只会通向莫斯科。

匈 牙 利

从1956年革命直到最近，苏联同匈牙利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也没有受到干扰。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的不平等的关系中，无论在国家关系或国内事务方面都没有出现过起破坏作用的分歧。必须指出，这种不平等关系决不意味着匈牙利完全缺乏讨价还价的力量。事实上，匈牙利拥有这样的力量或许是两国关系融洽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赫鲁晓夫在匈牙利革命时期指定卡达尔·亚诺什为匈牙利党的领导人那个时候起，卡达尔就能够利用他的全部弱点、赫鲁晓夫在国内和东欧的既得利益而取得满意的结果，并能利用他们两人之间逐步产生的真正的信任。正是赫鲁晓夫和卡达尔的这种独特的关系，以及东欧在整个赫鲁晓夫时代的特征和气候，使卡达尔有机会在1960年开始实行他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人

们称为“卡达尔的新方针”，而后来经过十分周密的准备之后才在1968年充分实施的“新经济结构”则是该方案体制上的最重要的特点。

赫鲁晓夫还显然相信，只有象卡达尔那样推行民族和解政策的领导人才能使匈牙利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个生气勃勃的成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赫鲁晓夫表现出他的独特的作风，准备承担风险。但是，他在这方面的判断是精明的。在卡达尔的领导下，匈牙利不仅在国内仍然保持稳定，它还支持苏联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有时候它的这种支持显然很勉强；例如，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卡达尔并不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在他被解职前不久努力促成同中国对抗的做法。可是赫鲁晓夫知道，卡达尔归根到底是会一如既往，也对这项政策表示支持的，而正是赫鲁晓夫的这种理解才使卡达尔甚至有更大的周旋余地。

显然卡达尔本人毫无疑问地认为他对赫鲁晓夫是跟得很紧的，卡达尔领导集团却不费什么周折就设法应付了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的转变。不久，他就同新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集团确立了合作关系，纵然他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决不会带有私人感情的因素。

从过去十多年的情况来看，勃列日涅夫就职以来的苏匈关系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1964到1968年的第一个时期里，东欧出现了苏联放松控制的真空状态，这时匈牙利领导集团主要致力于推广“新方针”改革政策，并准备实现新经济结构。在外交政策方面，它表现出乐于接受波恩提出的建议，如果苏联没有在东德和波兰的强烈要求下把谈判的门堵死，

匈牙利很可能在1967年春就成为紧跟着罗马尼亚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二个国家。

包括1968和1969年的第二个时期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关键时刻，这时苏匈关系处于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掌权以来最密切的阶段。苏联人知道，卡达尔与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不同，他竭力主张不要对布拉格操之过急，直到最后才勉强同意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因此，争取他的最后赞同就格外非同寻常，而争取到手也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这件事也许给了卡达尔同莫斯科讨价还价所必需的力量，使他能够不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而且加以推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后来逝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科莫钦·佐尔坦为代表的匈牙利党的大力帮助，苏联共产党得以筹备和组织了最后于1969年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因此，莫斯科在1968和1969年期间有好多方面的理由感激布达佩斯。

从1964年10月开始的苏匈关系的第三个明显时期包括1969年到现在。在这个时期，前一时期密切的、几乎是共谋的合作关系慢慢地、差不多不知不觉地变成匈牙利使苏联伤透脑筋的关系。这里值得比较一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产生“偏离行为”的不同环境。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早在1962年就意识到它们在重大问题上有着根本分歧。后来，这些分歧在两国领导人日益疏远的气氛中加深和扩大了，虽然他们经历了一些比较平静的时期。匈牙利的偏离行为是在一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对苏联的威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被认识到——也许到1972年才被认清。它并没有直接对抗苏联明确提出的任何政策或目标；匈苏关系至少在表面上

仍然是很融洽的。

不消说，按照莫斯科的看法，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偏离行为”之间所以有这种十分明显的差别，其原因之一是前者的偏离发生在国家关系方面，而后者的偏离则发生在国内事务方面。前者由其本质所决定，通常会比后者为人们更清楚、更敏感地注意到。另一个原因是莫斯科在断定匈牙利有“偏离行为”存在时采取了审慎和克制的处理办法，而匈牙利领导人在实行经济改革时常常机敏圆滑地力求尽可能降低它的调门。然而，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匈牙利新经济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即使没有得到莫斯科的同意，也至少在当时得到它的宽容。^①究竟这种宽容是由于苏联人忙于其他事务，官然无知，还是暗中同卡达尔领导集团做一笔交易以换取它在1968年的效劳，并无多大关系。这种情况使苏联领导人在开始了解匈牙利改革的严重含义时不大容易对布达佩斯施加压力。

新经济结构向苏联领导人提出的那种问题已在本书第一部分比较详细地加以讨论，这里毋需赘述。然而，可以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匈牙利的“偏离行为”发生在国内事务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对匈牙利国家关系的政策有某种影响。所谓匈牙利外交政策与苏联外交政策并无不同这种一般的说法是确切

^① 完全可能的是，苏联人容忍了匈牙利的新经济结构计划，以便万一它获得成功时可以在苏联本身全部或部分加以实施。有些苏联经济官员很可能就抱着这种态度悄悄地观察那个计划。然而，苏联政治领导人中间根本不可能有谁会支持人们在其本国采用这样的一种改革型式。这种想法是违反苏联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在东欧执行政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全盘明显事实的。考虑如何应用象保加利亚的农工联合企业这种由党控制的试验是一回事，把新经济结构计划看作一种可以仿效的范例却是另一回事。

的；事实上，前面已经提到，卡达尔领导集团就曾强调它们的类似之处，借以排除或预先消弭对其国内政策的批评。可是，匈牙利改革运动的性质和结构，以及它所引起的情感和强调效率的工作作风，必然影响官方对对外经济关系某些方面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这种情况之所以格外不可避免，还由于匈牙利国民收入的将近百分之四十来自对外贸易。这些影响中的某几种带有同苏联发生矛盾的可能性。

首先，甚至在苏联大肆提高价格从而导致原料危机之前，匈牙利的经济计划人员就显然急于想迫使苏联人作出供应原料的长期保证，而这正是苏联人同样明显地力求回避讨论的问题。所有东欧国家都已蒙受这种回避态度的影响，但仅仅由于匈牙利十分缺乏原料，它所受影响最为严重。

其次，在经互会合作的方法方面，匈牙利人所提出的种种建议完全符合其本国经济体制的相对市场性质，而根本不同于苏联人显然准备支持的建议。那些建议包括采用一种可兑换的卢布，实行有关价格和成本的真正全面核算制，以及排除到处可以见到的社会主义经纪人即统管经济的部委的掣肘，从而建立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关系（这一点大概是所有建议中争论最多的）。

第三，在匈牙利急于想同西方建立经济关系以及在处理这种关系时颇有灵活性方面，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上述的这种“注重市场的做法”。匈牙利人进入这个领域的时间晚于南斯拉夫人或罗马尼亚人，但他们从1970年以来在这方面进展很快，这可以从他们同西方国家签订很多合作协议、西方银行给予匈牙利多笔商业贷款以及西方在匈牙利经济生活的各重

要部门中影响越来越大等事实看出来。^① 在一个日益由注重效率而不是注重教条的技术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系中，这些事态的发展是很自然的。当然，苏联人自己也越来越趋向西方市场，当象匈牙利这样的盟国如法炮制时，他们就很难反对。但是，东欧专家治国论者喜欢同西方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仅在于不同苏联进行贸易——这种特殊的热情不过体现着一般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对东欧社会有强大吸引力的一个方面。

在本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我们谈到了包括苏联某种压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曾怎样使匈牙利改革运动的一些很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不能顺利开展。再说，由于匈牙利必须偿付苏联的原料价格提高了很多——大家知道，这一过分的要求特别从1975年年初以来曾遭到匈牙利人的竭力抗拒——苏联人已经给了匈牙利的经济发展以新的打击，同时给匈苏关系带来了很不愉快的因素。苏联人已经加重了影响的份量，另一方面匈牙利人的经济和自信已经遭到削弱。在新的经济结构缩小规模和原料发生危机以前，匈牙利的许多改革家也许会说，团结的力量和独立生存的力量恰恰是在匈牙利达到了真正的平衡。这种平衡现在已经被打破了：在苏联人看来，团结的力量业已增强很多；而按照匈牙利人已经形

^① 匈牙利新闻社1974年1月7日报道，匈牙利同西方公司签订了“六百多个”合作协议。据估计，从1971年以来匈牙利在西方筹借的款项已达三亿八千万至四亿美元。这包括所发行的三种公债和至少六笔民间贷款。（匈牙利的政策不主张接受西方政府贷款。）匈牙利对非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为西方国家）的贸易赤字总额在1974年为七亿一千四百万美元；仅在1975年第一季度即达四亿美元（引自《统计月报》，1975年第1—5期）。

成的具体看法来说，独立生存的力量却已大为削弱。

匈牙利似乎不可能成为无声无息的卫星国或慢慢地公开表示不满，所以，这种平衡能否很快恢复是值得怀疑的。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匈牙利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将是如何渡过它的经济危机，同时至少维持公共生活中一些放松了的政治、文化、社会和“产生某种气氛”的状况，而这些状况连同它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已经使它从1969年以来在东欧各国中显得极不平凡。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表明个人品格在共产党的政治活动中仍然有其重要意义的因素——在于卡达尔本人。

卡达尔的品格和异乎寻常的政治才干近几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匈牙利国内形势和对苏关系的独特地位。新经济结构的收缩以及目前的经济危机相继代表着他在十九年前成为党的领袖以来第二次和第三次最严重的挫折，而第一次的挫折则是赫鲁晓夫的垮台。他象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并没有企图置身于当代国内问题之外，因此相对来说仍然不受方针政策的必要改变的影响。虽然卡达尔在大多数匈牙利人的政治情感中已上升到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却是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改革运动暗淡下去以后他可能仍然保持他的地位，可是他的政治效果大部分会被抵消掉。因此，在1975年3月匈牙利党代会之前纷纷传说他要引退，那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他没有引退，这使忧心忡忡的匈牙利公众放下心来。目前的问题是他能否继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克服他近年来遭受的几次挫折的极为不利的影

当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现今经济危机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力图做到至少使人民群众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比较长期的任务是防止经济和技术知识分子离心离德。由于匈牙利限制了这些知识分子自行提高的、阔绰的物质消费，这个阶层的成员中间一定已经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离心离德情绪——顺便提一下，技术知识分子的扩大物质享受是新经济结构使苏联来访者感到困惑、忿怒或“沮丧”的一个明显的方面。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个阶层对于新经济结构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确曾抱有热忱，而这种可能性目前大概正在消失殆尽。

如果这种离心离德的倾向蔓延开来，卡达尔的领导地位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的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同时，如果经济状况导致匈牙利的一般生活水平下降，那么，既需要上层人物又需要广大群众支持的卡达尔的政治地位就可能逐渐发生动摇。这就势必会导致匈牙利在政治和行政上加紧控制，从而引起更大的不满。卡达尔本人是最不愿意这样干的；他甚至可能辞职，也不愿硬着头皮这样干。然而，不管是不是由卡达尔执政，上面所说的那种不祥的情景在七十年代的其余岁月显很可能会在匈牙利出现。

波 兰

1970年12月波兰-西德条约的签订是近年来苏波关系中最重大的事件。波恩通过这一条约事实上承认了波兰战后的奥得-尼斯河边界。因此，那时两个德国都已承认了这一边界，不过西德是在东德承认了二十年之后才承认的。世界上

没有任何国家对此还有疑问。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这条约签订几天后就被人民起义推翻了，但人们对他的两项特殊功绩是不会忘记的：1956年他刚上台时稳定了国内的局势，防止了波苏之间的一场战争；1970年他下台前夕获得了西德对波兰西部边界的承认。

对苏波关系来说，波德条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推翻了一项为波兰与苏联结盟辩护的由来已久的理由。有些波兰人认为，从波兰的地理政治的位置来看，与苏联结盟是可以合理地加以说明的。那些最无条件地重视现实的波兰人则认为，能享有类似芬兰与苏联的那样一种关系就不错了。但是，无论党内还是党外，简直没有什么波兰人会爽快地承认同苏联结盟是一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更不必说从属于苏联了。所以，直到1970年12月，波兰人民中间不管有些人在什么程度上同意和苏联结盟，那只是由于明显的波兰民族主义的原因。苏联是保证波兰维持战后西部新边界的唯一强大的力量。

一旦波恩承认了西部边界，联盟的任何一方——莫斯科和华沙——就都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波兰领导人碰到的新问题是怎样制止、扭转或者甚至消除这个国家在文化上、传统上、宗教上本能地倾向西方的趋势。对苏联人来说，根据局势发展的要求，看来更有必要把波兰更加紧密地纳入苏联所控制的双边和多边的联盟体系，从而使它同东方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在国内方面，则应力求削弱一些公共机构和体系——主要是罗马天主教会和个体农民——的作用，因为这些机构和体系严重地阻碍着执政党对权力的垄断。

根据情况推断，看来也有必要对波兰领导集团本身加强

监督。事实上，大多数波兰人的反俄和反苏情绪十分高昂，就连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想求得民族的生存力量也必须设法在一定程度上迁就这种情绪。在斯大林时代的贝鲁特政权下，简直就没有机会并且或许还没有决心这样做，但是毫无疑问，哥穆尔卡总是力图维持他本人及其领导班子的与众不同的“波兰人色彩”。没有理由可以怀疑他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抨击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东欧的控制的讲话并非出于真诚。然而，由于他的统治力量逐渐衰退，由于他失去了他可能有过的促使其采取创造性行动的鼓舞因素，又由于在他执政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趋于凋零，他终于日渐支持来自莫斯科的任何倡议。正是波兰领导集团在六十年代采取的这种随波逐流的态度以及似乎是一贯否定波兰民族精神的做法，为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一个派别——以米奇斯瓦夫·莫查尔将军为首的“游击队员”——的兴起提供了合适的环境，这个派别公开利用了受到挫折的波兰民族主义和隐蔽地利用了它的反苏主要动机。在哥穆尔卡的统治即将结束时，这个派别在工人中间和党内享有相当大的名望；它出版的几种报刊也很有销路。（它公开宣传的反犹主义并不是最没有号召力的。）

当然，谁也不会认为苏联领导人已经对波兰制定了一种新政策，准备在1970年底签订波兰-西德条约后就立即付诸实施。上面提到的大抵看法是根据局势的来龙去脉提出的一套假设。但是，就算推理和现实往往不能一致，以波兰的例子来说，苏联领导人看来确实从华沙和波恩的条约中吸取了必要的教训。这个教训实际上无异于加深了已经从布拉格之春吸取的教训，只不过是具体应用于波兰局势的特点罢了，主

要通过严格实行政程序上的措施来提高警惕和加强控制；通过全面一体化过程在国家一级运用更多的聚合力量；通过扩大党的权力在国内求得更大的团结，而对于党权的扩大，哥穆尔卡本来是逐渐泄了气，不敢轻易尝试的。

根据波兰-西德条约对苏联所包含的风险来看，莫斯科决定支持这个条约的举动也许确实出人意外。究竟在1969年5月哥穆尔卡建议与波恩对话的著名讲话中波兰有多少主动性，究竟这个问题事先同苏联人有过什么样的深入细致的磋商，现在还很难断定。也许这是波兰按照原来莫斯科对西方的政策范围面采取的主动行动，但这种猜测使人怀疑在哥穆尔卡主动姿态的背后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波兰自身的利益，甚至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不信任苏-德恢复邦交的措施（“拉巴洛”精神变态）。哥穆尔卡的这种主动姿态无可否认地类似近年来罗马尼亚，例如在巴尔干以及就欧洲安全问题采取的许多姿态——符合广泛的苏联致策，但出于民族利益的动机，并带有对苏联最终目标的怀疑心情所引起的先发制人的性质。

在苏联人方面，他们一定已经意识到波兰同西德达成协议的历史性意义。他们也一定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会给波苏关系带来什么风险。并且，虽然他们确实怀疑波兰人需要签订这一条约的动机，他们显然认为这是值得冒的风险。但是，波兰在与波恩的条约签订以后随即发生的波罗的海沿岸动乱一定已经至少使一些苏联领导人相信，当初承担风险时所依据的考虑是失算了。现在还找不到证据来表明波兰在1970年12月发生的两项重大事件——一项是国际上的，一项是国

内的——有什么联系，但是，对于在思想上受过训练并在实际上惯于怀疑这样一种联系的苏联领导人来说，他们既然遇到动荡局势的冲击，一定至少确实考虑过两项事件互有联系的可能性。这就使得苏联作出的不加干涉的决定更其引人注目。

苏联的克制态度也许可以用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刚过了两年多，如果再发生入侵事件，那几乎肯定会把欧洲颇有可能实现缓和的希望推迟一个很长时期；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同，许多波兰人甚或武装力量的某些部分势必要起来反抗；至少一些苏联领导人或许认为那些暴乱行动只是波兰国内的动乱，与签订对西德的条约无关；主要是存在着一种经过仔细斟酌的估计，认为这种动乱不会失掉控制而蔓延开来。

爱德华·盖莱克就是在这种不稳定的形势下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的。苏联领导人决定至少在试用的基础上给予信任，所依据的理由很可能有对他充分信任的因素，但也有不愿另作选择的成分。在东欧执政党的领导人中间，他当然是一个新的杰出人物：他不是“莫斯科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在国内经过充分训练的共产党人，而是在法国和比利时的煤矿上有过多年经历的“西方人”，只是在1948年才回到波兰。他不容许别人干涉他曾成功地统治了十三年的西里西亚省（波兰的“加丹加”），以抱有独立见解的坚强的人而名噪一时。盖莱克大概意识到了苏联的犹豫不决，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而作的努力也许是他准备对苏联领导人表示极大敬意的一个原因。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波兰新领导集团最初

完全依赖苏联的好意。例如，如果苏联人不在1971年2月向波兰提供据说总数达一亿美元的大量信贷，使波兰政府能够撤销引起十二月骚乱的基本食物提价，盖莱克领导集团本来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而且，盖莱克本人在领导集团中拥有的权力还不是十分稳固的。莫查尔将军在哥穆尔卡倒台后已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在党内和警察机构内有数量不小的支持者，并且继续进行派别活动。盖莱克不久就要用高明的手段对付莫查尔，并随后在1974年再对付内务部长弗朗齐歇克·什拉赫齐茨了。后者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但也带有类似的色彩。然而，要想有十足的把握做到这一点，他就需要扩大权力，而这是只有通过苏联的支持才能获得的。

就苏联人来说，从哥穆尔卡到盖莱克的过渡本来有可能成为灾难的前兆，结果却证明是处理危机的杰作。他们冒了一些很可能出纰漏的风险——不进行军事干涉，支持盖莱克——结果是收到了效果，并且由于他们在恰当的时刻从物质上帮助了波兰新领导集团，他们促进了自身的事业。苏联1956年对波兰的政策同1970年的政策相比，颇有类似之处。1956年赫鲁晓夫对于严重不稳的局势和新领导哥穆尔卡的处理办法也含有极大的风险，而且大概比勃列日涅夫在1970年所冒的风险还大一些。两种局势都需要判断力、大胆和克制的正确结合，他们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

大约到了1971年年中，在盖莱克上台约六个月以后，国内的危机大体上已经过去了。事实上，波兰的经济已经开始有了惊人的恢复；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在使民众的怨气平息下来。因此，从那以后，应当根据早先提到的条件——由于1970

年12月波兰-西德条约开创的新历史阶段而影响了波苏关系的那些条件——来检查波苏关系了。

在短时期内，认为苏联会有某些担心的说法看来是没有根据的。在国家一级，通过由苏联发起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联盟，波兰已经充分参加了一体化的过程。甚至可以看出它已经是满腔热忱地这样办了。但是，在与苏联的双边经济关系中，要苏联长期提供原料几乎肯定是有困难的，并且由于1975年初苏联提高了价格，这些困难已经大大地增加了。甚至在苏联的这项决定公诸于众之前，波兰就在1974—1975年冬设法购买了大量的中东石油，并制定了在今后十年急剧增加从非共产党国家进口石油的计划。每个东欧国家在与苏联的双边经济关系中都处于接近某种危机的境地，波兰当然也不例外。这里的问题是，这种预料到的危机是否会引起苏联对波兰关系的任何特别紧张的局面。

这样一个问题不能单纯就波兰与苏联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范围以内的事情来加以说明。波兰对西方贸易的突然大量增加，可能已使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忧虑。不消说，东西方贸易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因素，并且，既然莫斯科创了先例，那就不能阻止财力较小的伙伴跟着这样做。但是在1974年，面方在波兰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急速上升，波兰的进口远远超过出口，同时波兰渴求西方信贷的胃口看来漫无止境，因此莫斯科很可能已经开始担心，波兰与西方经济关系的大规模发展正在破坏它要使波兰与东方进一步一体化的努力。^① 让

^① H. 彼得·德雷尔在1975年5月7日的《商业杂志》上援引了一个银行家关于波兰对外负债二十八亿美元——实际数字可能还要高些——的估计，

波兰及其十分敏感的经济界知识分子自由接受那种根据现有政局来看也许在波兰比在东欧其他地方更为危险的影响，乃是助长波兰政局中已有的倾向西方的趋势而不是制止这种趋势。

在当前波兰对外经济关系——对苏联集团以及对西方——的这两种趋势中，显然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苏联想要对波兰领导集团施加重大压力，以限制它与西方的那些经济关系，那就可能使盖莱克（也可能使匈牙利的卡达尔）在其与经济界和技术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挑起一场关于责任问题甚至合法性问题的危机。知识界是最欢迎盖莱克那种注重效率的形象的社会力量。这部分人还把效率看成是西方而不是东方的产物。如果波兰被迫停止或减少向西方的这种开放，那就可能使盖莱克的权威，当然还有他的名望，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如果说最近四年来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由于同西方有了经济联系，那就不但打击了经济界和技术界的知识分子，而且也打击了人民中间的其他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从不隐讳有反苏情绪存在的社会来讲，不用说它也会加剧这种反苏情绪。^①

可能引起将来波苏关系恶化的，还不单纯是波兰与西方

并说同一估计认为波兰肯定还要再负债五亿美元。从那以后，由于1975年6月德斯坦总统的访问，法国已经同意向波兰提供七十亿法郎的贷款。在1975年8月，波恩终于同意给予十亿马克的长期低息贷款。

① 反苏情绪——使盖莱克领导集团深感为难的情绪——的一种有趣的反映发生在1974年12月，那时波兰的许多知识分子写信给华沙的文化部长，请他注意生活在苏联的波兰人缺乏享受文化和旅行的方便条件这一事实。那封信措辞温和，但它含蓄地提出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吞波兰东部大片领土的问题。

的经济关系问题。虽然经济因素目前似乎毫无疑问地起着主要作用，这些关系也许并不是没有政治或外交上的意义的。例如，盖莱克在1974年亲自访问了美国，1975年又访问了瑞典。同时，1975年6月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问了波兰，随后福特总统在7月份访问了波兰。这些访问都不能单纯从波兰想获得经济援助这个角度来看待。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波兰想在世界上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无疑是作为苏联联盟的一个忠实成员，但不是俯首帖耳的成员。同样，在最近波兰与西德关系的曲折进程中，华沙渴望从波恩得到一大笔信贷（最后在赫尔辛基会议厅的走廊里达成协议）这一点，无疑地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波兰的谈判立场还显然带有一种民族的风格和特性。这种立场表明波兰既不向波恩摇尾乞怜，也不是苏联的走狗。可以看出，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框框内，盖莱克领导集团不仅寻求财政援助，而且企图使人们承认波兰凭它自己的资格有权成为一个重要的实体。由于罗马尼亚在苏联联盟之外的政策的必要补充是怠慢它在联盟内的义务，在这里把盖莱克的政策同齐奥塞斯库的政策作任何比较，只会使人误解。盖莱克的动机和目的是大不相同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莫斯科总会象这里所指出的那样看待他的动机和目的。

在盖莱克的领导下，国内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肯定与苏联人希望在12月之后的波兰——在有了华沙条约和波罗的海暴乱之后——所看到的措施相符合。这些措施的意图是，在损害社会的机构、制度或进程的情况下加强执政共产党人的机构即共产党的权力，以加强波兰的政治国家，削

弱仍然十分强大的现实国家。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强加给盖莱克的政策，甚或先由莫斯科发动然后由他的领导集团加以接受的政策。事实上，在不论带有何种政治色彩但适应现代要求的领导人看来，波兰的国内局势本来就有一点蔑视尊严的味道：一个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主教团，它声称大多数波兰人都忠于国家和宗教；以邮戳大小那样私人小块耕地为主的落后的、即使是能迅速恢复生产能力的农业；落后的教育制度；摇摇欲坠的地方政府机构——可以列出的项目还远远不止这些。所以，对盖莱克来说，根本的改变是他的国内计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国内计划具有双重目的：使国家现代化，并使现实国家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性质。所运用的手段必须是灵活的、实际的和有节制的。但是目的必须明确，并且是非达到不可的。

在莫斯科看来，到现在为止还不能不说盖莱克领导集团的国内施政成绩是很实在的。从收拾烂摊子开始，经过妥善的管理和碰上好的运气，这个领导集团给国家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并且主要由于那个原因，也给国家带来了明显的稳定局面。它已经采取了全面的措施来加强党对若干生活方式的控制，但这是在避免局势发生动荡的情况下机智地完成的。在国家一级，波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经济关系一定象上文所说的那样使莫斯科感到焦虑，但与此对比，华沙支持了苏联在国际政治活动方面的一切倡议，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是苏联坚定可靠的盟邦，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出过什么问题。

但是，更仔细地观察一下，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甚至在

已经取得十分可观的进展的经济部门，早在 1974 年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险。对西方的贸易赤字开始呈现出令人吃惊的规模，^① 用增加包括煤炭在内的出口商品来缩小贸易赤字的努力还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在国内，当时经济正在开始出现人们所熟悉的兴旺和发展过度的迹象，这些迹象在 1975 年变得更加不妙。最为严重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压力特别导致了除肉类和奶制品以外的大部分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而肉类和奶制品的价格是在哥穆尔卡垮台后由于纯属政治上的原因曾经被冻结了的。盖莱克的难题在于经济问题也成了影响国内稳定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因为前者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而这个难题是由哥穆尔卡因之倒台、盖莱克上台头几个月勉强度过的那种局而引起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他任何东欧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如果说他需要提醒一下来注意这种情况，那么提醒他的事情就在 1975 年出现了，那时除了他碰到的另外一些经济问题外，许多波兰城市发生了食品短缺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民众普通的不满并产生了一些需要警察出面干预的事件。这些问题本身并不严重，但它们是一种不祥的迹象，表明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决不是领导人说说好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只要波兰群众的生活水平继续上升或至少维持原状，他们将继续支持盖莱克领导集团。如果这两项的任何一项得不到保证，就有发生政治和社会动荡的真正危险。盖莱克的政治地位已经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是否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就。

^① 前引德雷尔的文章说明 1974 年波兰对西方的贸易赤字达二十亿美元。

过去五年他在博得公众的支持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他还没有能够达到使群众把他本人和他的目标等同起来的地步，为此，他必须在取得民众谅解的情况下顶住经济困难，而不是在民众不满和存在着不稳定局面的威胁的情况下去应付经济困难。

不稳定局面的另一个根源很可能在于党所推行的力图赖以加强或扩大其权力的种种政策。在若干引起争论的问题上，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它同波兰的另一个管理机构——教会——发生冲突。盖莱克领导集团已经竭力想避免同教会发生严重的对抗，这番努力大部分获得了成功。但是，既然它决心要扩大党的权力，那就迟早会发生冲突。就波兰大主教即红衣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来说，他现在似乎认为时间不在教会一边。所以，他——面首先不是政府——倒是可能发动一场多半会产生十分严重后果的对抗。这个教会对农民的控制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那些受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威胁的农民可能是它手中的一件危险的武器。然而，这仅仅是可能发生对抗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所颁布的关于现代化的每一措施都可能成为不稳定局面的根源，因为各个措施无不意味着增加党的权力，而不利于一个仍旧深受罗马天主教教会影响的社会。

关键问题似乎在于这个领导集团能否维持经济繁荣。如果它能够做到这一点，上面所提到的危险可能还是潜在的。如果它做不到，那就可能再次出现象 1956 年或 1970 年那样的局面。当然，那时直接的问题是盖莱克的，而更大的问题则是勃列日涅夫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莫斯科在联盟内部实际

上对原料的垄断，必将大大增加苏联对其东欧盟国的经济影响。如果这种影响运用得不够妥当，那么，特别是在波兰的情况下，它就很可能使苏联自食恶果。

罗马尼亚

先是在格·乔治乌-德治以及后来在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政权，一直推行一种维护民族利益的政策，至今已有十多年了。这项政策既忽视了苏联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总的想法，又忽视了苏联对某些关键问题以及某些地区的具体政策，因此它已经带有离经叛道的性质，尽管至少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公开地这样批评过。^①

从历史上看，罗马尼亚离经叛道的突出特征是，在苏联建立的欧洲共产党政权中，罗马尼亚是头一个把偏离行为发展到了国家关系方面，而不是在国内事务方面有所偏离。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国家的偏离都是国家关系这方面的，而发动这种偏离行为的政权却基本上是靠它们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在东欧出现的另外两大偏离现象，即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先从国内事务这方面开始的，虽然匈牙利人的偏离同样很快地就发展到了国家关系方面，而捷克斯洛伐克本来也很可能会这样发展下去。在匈牙利革命的高潮中，纳吉·伊姆雷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

^① 关于下文所作分析的背景，参阅加布里埃尔·费希尔“罗马尼亚”一文，见前引布罗姆克和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合编书，第158—179页。关于罗马尼亚偏离行为起源的引人入胜的精辟分析，参阅肯尼思·乔伊特《革命突破和民族发展，1944—1965年罗马尼亚的情况》（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约组织。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对苏联控制华沙条约组织和整个联盟的行径所提出的批评日益增多。更为重要的是，杜布切克领导集团硬是不理睬苏联对其国内事态发展的抱怨，这就使布拉格的偏离也开始发展到国家关系方面。

所以，由于来自象苏联这种外来因素的干涉，或者甚至由于只是有这种外来因素的存在，凡是在国内事务方面开始的偏离差不多必然要发展到国家关系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迹象还不能证明反过来也一定如此，至少是如果人们认为国内事务的偏离只是具有“右倾”或“修正主义”性质，也就是说偏离只是趋向于减少党的专制主义的话。当然，南斯拉夫倒确有朝相反方向发展的情况：在加紧党的控制的最初阶段之后，南斯拉夫领导人开始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但是，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却表明它们的国内事务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偏离的，即逐渐加强在个人控制下的党的统治。

我们还可以考虑另外一些类似的和截然不同的情况。发生了国家关系方面偏离的三个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都没有受到军事压制，^①而只出现了国内事务方面大偏离的两个东欧国家——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却受到了这种压制。能够从这种现象得出的任何结论，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外部的和偶然的因素可以部分地

^① 南斯拉夫人在1948到1951年间遭受一场包括许多边境事件在内的神经战。1961年，阿尔巴尼亚海军上将塞梅·塞伊科由于企图对霍查领导集团采取一次显然获得苏联支持的海军行动而被处决。但是，这些行动都没有构成军事压制的重大尝试。

说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为什么没有挨整，而就罗马尼亚来说，大概在某程度上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但是，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并不在地理上与苏联毗邻，如果物质因素和战略因素使苏联难以对它们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它们国内的偏离是否会不受压制而仍然进行下去呢？对此是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的。促使苏联作出决定的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带有主观成分，不断发生变动，并且它们的重要性随着时间和看法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然而，就罗马尼亚来说，关于苏联采取克制态度可能有哪些原因的问题，这几年来引起了观察家们很大的兴趣。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罗马尼亚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是一种原因。尽管罗马尼亚与苏联漫长的共同边界使它很容易受苏联的侵袭，这种情况倒使苏联人觉得它在战略上并不那么重要。由于它不同西方盟国接壤，它总的说来是被“包藏”在苏联同盟体系的防线之内的。苏联采取克制态度的一些主要原因是政治方面的。所提出的根本理由是，虽然罗马尼亚的领导集团已经拒绝了——尽管间接地——苏联关于共产党合法性的两种观念之一、即苏联的领导，它却坚决地维护了另一种观念、即党的领导作用。

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罗马尼亚的领导集团把它在国家关系方面的偏离行为甚至同一种卡达尔式的国内政策结合起来，苏联领导人就会抛开当时所抱有的一切克制态度，入侵罗马尼亚。最低限度他们也会谴责罗马尼亚人。可是，南斯拉夫人至少在起初确实保持了由党占据领导地位这一正统观念，而阿尔巴尼亚人则自始至

终都是这样做的。它们受到公开的谴责，被逐出教门，并遭到除军事入侵以外的各种压力。罗马尼亚有时显然也曾受到压力，其中明显地包括某种经济压力。但只是到了1968年，当罗马尼亚谴责苏联带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也许在1971年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之后，苏联才公开批评了罗马尼亚的政策，而甚至在这个时候，批评也还是不多的，并且调门很低。总之，所看到的一切迹象表明，苏联的克制态度是异乎寻常的。

是不是单凭罗马尼亚坚持党的绝对统治这一点就能说明上述的问题呢？如果苏联领导人由于其他迫切的原因认为有必要用军事手段压制一个东欧国家，并且如果苏联可以丝毫不受限制地运用种种军事、后勤或外交手段，那么罗马尼亚坚持由党居于领导地位这一事实是否就足以阻止苏联领导人采取行动呢？不可能。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虽然党的绝对统治这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其他一些因素的混合，这些因素同上述原则在一起，构成任何特定时候的决策动力。

有人往往提到，罗马尼亚至今没有挨整的另一原因是它运用了巧妙的外交手腕，特别表现在它的领导人应付中苏争端的问题上。这种论点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我们始终应该牢记它应付这个问题的方式。把罗马尼亚的对华政策同阿尔巴尼亚的对华政策比较一下，是颇有启发的。地拉那的霍查领导集团利用中苏争端作为反对莫斯科的武器，可是，阿尔巴尼亚人早就选择了一种联合中国人以反对苏联人的政策，虽然直到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攻击他们为止，他们

一直没有公开谴责莫斯科。罗马尼亚人也曾利用中苏争端反对莫斯科，不过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某些准则的范围内进行的。他们知道苏联人本身不愿公开违反这些准则，因此就尽量不去违背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各种事项。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领导集团装模作样地宣称奉行一种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的政策，并有时在表面上试图调停莫斯科和北京的争端，这就使苏联人更难越过有正当理由的恼怒这个限度去进行“情有可原的”干涉了。

只是到了1971年，罗马尼亚人看来已经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在中国问题上所使用的策略。那年春天，齐奥塞斯库风头十足地访问了中国，后来中国政府同意向罗马尼亚提供将近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在同一年里，中罗两国的军事合作似乎已经加紧进行，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两国军事官员进行多次重要互访的现象中看出来。所以，莫斯科正好在1971年夏季增加了它对布加勒斯特的压力，这决非偶然。在此以后，罗马尼亚人用比以前低得多的调子保持他们同中国的关系，这也不是巧合。

所以，阿尔巴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在其与苏联的争执中利用中国这一因素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这些差别至少部分地使苏联领导人没有公开指责罗马尼亚。不过，罗马尼亚有关中国的策略始终是危险的策略，因为苏联对此作出反应的真正关键——莫斯科本身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是罗马尼亚无法掌握的。苏联领导人可以随时把苏联同中国的关系看作糟得很，以致他们对于布加勒斯特同北京的关系变得不能容忍。到那个时候，罗马尼亚人要么是俯首顺从，要么是公开反

抗，没有其他的办法。

除中国这一因素以外，罗马尼亚还利用国际关系的其他因素来保持和提高它的独立程度。尤其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同美国的关系。1970年尼克松总统访问罗马尼亚是建立关系的开端(福特总统1975年8月的访问是这种关系的继续)，不久，这种交往的意义对布加勒斯特就显得比对华盛顿要大得多。应该把齐奥塞斯库1971和1973年对美国的访问看作是旨在促进罗马尼亚的安全以对抗苏联的大胆外交行动。事实上，也应当部分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齐奥塞斯库在世界各地不辞劳苦的旅行，对他同南斯拉夫搞好关系的举动也应该这样看。十分明显，同扎伊尔或哥斯达黎加的良好关系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罗马尼亚不受苏联干涉，但引起世界各国更多的关注意味着自己的国家不那么孤立。罗马尼亚确实处于这样一种独特的地位，即它必须常常在显然是它的敌手的各国中间寻求保护力量来抵制自己的盟国。

如果不探讨一下苏联在布加勒斯特开始偏离以来执行政策上的轻重缓急，那就无法完整地解释为什么罗马尼亚至今没有挨整的问题。虽然人们早就可以觉察到苏罗关系有些紧张，罗共中央在赫鲁晓夫被罢黜前六个月即1964年4月的著名决议中才第一次公开地全面阐述了罗马尼亚的新政策。这个决议特别抵制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宣称各党在世界共运中和各国在联盟内部应享有平等地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拥有主权，并且它们有权处理本国各方面的事务而不受外来干预。如果赫鲁晓夫还继续当权，两国的关系就很可能发生公开的破裂，而苏联在此前后就会千方百计力求推翻齐治乌

-德治的领导权。但是，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下台了，嗣后东欧出现了长时期没有苏联挥舞指挥棒的真空局面。除非罗马尼亚决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或经互会，或者采取类似的极其严重的挑衅行动，苏联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不去处理应当优先考虑的国内问题而专门努力迫使罗马尼亚就范的。后来，苏联的注意力集中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方面，因为这个国家出现了比罗马尼亚更为危险的偏离，何况对苏联来说，捷克斯洛伐克在战略上比罗马尼亚更加脆弱，更加重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压制以后，确实立刻可以看出罗马尼亚本身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齐奥塞斯库不但拒绝参加而且强烈谴责了苏联的入侵行动。然而，当时有若干牵制因素发生作用，使苏联不敢动手：约翰逊总统对勃列日涅夫提出了警告；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震惊；苏联人知道罗马尼亚在遭到入侵时至少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抵抗；缺乏任何真正“有理可据的”借口；罗马尼亚在最初谴责了那次入侵以后就突然保持缄默。

1968年8月以后，尤其在齐奥塞斯库1971年访问中国所引起的紧张事态以后，苏联对布加勒斯特的政策似乎越来越寄希望于罗马尼亚会变得十分孤立，以致不断地丧失其国家关系方面的偏离势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看来也肯定在这方而发生了作用。例如，罗马尼亚在它和西德的关系上就曾经享有受优先照顾的地位，当东欧其他国家都被迫不去响应波恩1967年初提出的倡议时，这种情况就显得更为突出。然而，现在既然西德政府通过莫斯科同东欧有了交往，不准与被愿往来的禁令已经撤销，罗马尼亚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复存

在了。自从 1969 年以来，西德集中注意的国家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有时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罗苏不和在对抗时代曾经由于具有制造麻烦的价值而一度受到西方的欢迎，现在到了谈判时代却被西方看作是头痛的问题了。例如，罗马尼亚在日内瓦欧洲安全问题审议会上以及在维也纳中欧均衡裁军谈判时提出的倡议，并不总是受西方代表团、特别是大国代表团的欢迎的。

齐奥塞斯库很可能已意识到国际局势正朝着不利于罗马尼亚的方向发展，这就促使他开始主动采取新的行动，以维护和扩大罗马尼亚的独立性。前面所提到的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没有中断。自从 1972 年以来，他大力加强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即使说这两个国家已经结成非正式的防御性联盟也并非夸大。他还明确表示罗马尼亚愿意出面“斡旋”，依靠他同双方的良好关系尽力调停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最后，他不仅力图加强罗马尼亚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努力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1976 年在科伦坡举行的下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而且从 1974 年以来还一直企图使各国承认罗马尼亚也是发展中国家，但这方面的成就不大。

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想法只不过是表明罗马尼亚人认识到无论经济上或外交上的发展趋势都对他们不利的一个例子。罗马尼亚的对外贸易额大量地由东方转向西方（苏联所占的份额从 1958 年的百分之五十一下降到十年以后的百分之二十五），已经给罗马尼亚带来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好处。不过，同它近年来在对西方的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赤字相比较，

这些好处是否值得，则很值得怀疑。事实上，由于世界性通货膨胀和原料危机增加了罗马尼亚人的困难，^①他们目前似乎正在谋求实行一种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基本上比较平衡的经济政策。对西方，他们仍旧继续争取按照尽可能优厚的条件进行贸易和获得援助。只要看一看1975年6月齐奥塞斯库如何令人惊讶地在华盛顿同美国国会议员举行会谈，事情就很清楚了；他力图（这番努力最后在8月间被证明是成功的）使议员们相信罗马尼亚的移民政策是有诚意的，因而有资格享受最惠国待遇。^②布加勒斯特还在设法加强与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的联系，并且看来罗马尼亚人很可能会同它建立直接联系。与此同时，他们日益表示愿意参加苏联所发起的某些经互会活动，而在几年之前，他们甚至都不会考虑到要这样做。

可是，罗马尼亚人不能把他们的经济局势的严重性完全归咎于外来的因素。虽然罗马尼亚的经济还表现出某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特征，它却仍然暴露出质量上的严重缺点。效率不高，管理不当，劳动热情和劳动生产率低落，经常改组机构，

^① 虽然苏联提高原料价格的决定使罗马尼亚所受的影响不如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严重，罗马尼亚却仍由此遭受了损失，因为它依赖苏联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大量原料供应。我们还应当记住，虽然罗马尼亚过去不从苏联进口石油，它在1974年却必须进口大约六百万吨的原油。它曾希望进口苏联的石油，因为至少在以后的两年内，苏联的石油仍将比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来得便宜。显然，罗马尼亚在这方面的需要是莫斯科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可以加以利用的。

^② 然而，这里的话本事实是，为了获得最惠国地位，齐奥塞斯库公开准备容忍美国就移民出境问题对罗马尼亚事务的干预，而他一向是把抵制苏联的这种干预列为一项明显的原则的。

但始终不愿进行改革；甚至按照巴尔干半岛的标准来看，农业也是落后的——所有这些都是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罗马尼亚经济方面的一些标志。

事实上，正是由于罗马尼亚在经济上存在着这种缺点，并有可能继续恶化，苏联才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齐奥塞斯库的独立地位会逐渐遭到侵蚀方面，并基本上因此准备耐心等待。苏联人也许还有理由期待，齐奥塞斯库从他的“发展中国家”的策略中将得不到什么经济上的好处；罗马尼亚拼命设法获得西方援助的打算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空。^①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罗马尼亚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就只有回过头来求助于东方、求助于经互会，并在经济上更多地依赖苏联本身。这些做，对罗马尼亚的政治影响是严重的，但纯粹经济上的效果可能不会太坏；事实上，罗马尼亚为了打开同西方的贸易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已使广大民众蒙受了相当大的牺牲，因此罗马尼亚的一般生活水平甚至有可能从经济上重新趋向东方的政策改变中得到好处。在这方面，波兰的情况就显然不同：波兰向西方开放的经济是近五年来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如果要不断提高对波兰的稳定至关重要的生活水平，那就完全有必要保持——甚至扩大——那种经济开放。因此，波兰远比罗马尼亚更难大量减少它同西方的关系。

苏联人可能还从齐奥塞斯库的统治方式和不当之处看出

^① H. 彼得·德雷尔在前引《商业杂志》上谈到了西方金融界关于罗马尼亚对西方国家贸易赤字日益增多的情况表示关切。据说一位银行家讲过：钱柜是空的；到期的付款甚至比往常拖得更久。显然，罗马尼亚在1975年夏季的十分严重的水灾将进一步削弱该国的财政、经济和政治地位。

某种潜在的趋势。他在经济方面管理不善的情况近来已使罗马尼亚的经济界和技术界知识分子对他日益离心离德，并且有迹象表明在过去比较驯从的罗马尼亚工人中间已经产生了不满情绪。他所执行的政策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他拼命突出个人的统治作风，^①也造成他声望的下降。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各级干部对齐奥塞斯库前后矛盾和不可捉摸的性格日益恼怒。任何党的官员对自己可以在职多久都没有把握。不消说，干部们基本上赞成齐奥塞斯库坚持贯彻的不多几项政策中的一项：加强各级党组织的作用。但是，这位领导人的工作方法所造成的个人不安全感已经使他颇有吸引力的理论体系大为逊色。有理由认为，党领导机构在1974年3月的改组、齐奥塞斯库使其个人统治合法化的明显企图，以及过分提倡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等等的做法，已经大大地加深了党内的不满情绪。事实上，有一些迹象表明，这种不满情绪在1974年11月的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就曾充分集中地表达了出来，要求遏制这位党领导人的专制主义的某些方面以有利于加强集体领导。^②

究竟各种不满情绪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齐奥塞斯库以其(暗中反苏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合法地位，现在还很难说。到目前为止，损害的程度也许微不足道。但是从长远来看，损害的可能性还是不容忽视的。甚至现在，领导集团的民

^① 参阅罗伯特·R.金“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领导集团的政治活动”(自由欧洲电台东欧研究和分析部背景报告,1973年3月29日)。

^② 参阅罗伯特·R.金“分析齐奥塞斯库在罗共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所起的作用”(自由欧洲电台研究和分析部背景报告,1975年2月28日)。

族主义就远远不如从前那样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即使在巴尔干半岛，单靠民族主义也是不够的。齐奥塞斯库政权不能继续单纯依靠那个因素来维持它的合法统治了。

苏联领导人对于这种事态的发展只会感到宽慰。事实上，如果看情况有这样的必要，苏联人是可以利用近来齐奥塞斯库统治的若干方面提出一些仿佛颇有道理的批评。他们显然不能指责齐奥塞斯库放弃党的领导，但他们可以谴责他搞个人迷信，说他歪曲党的制度、原则和实践，因而在他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党已不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了。这样的指责在那些思想上完全陷于混乱的党的干部中很可能引起强烈共鸣，而不管这些指责会对罗马尼亚精心培育的国家主权带来多大的危险。

要是果真提出这样的指责，那同对国家关系方面的偏离提出的主要指责相比，大概只能算是次要的了。事实上，究竟会不会提出这样的指责，取决于苏联领导集团如何考虑它的许多问题的轻重缓急、即那些促使它在任何具体情况下作出决策的多种多样的复杂因素。

阿尔巴尼亚

自从1959年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关系明显开始破裂，直到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谴责霍查领导集团，阿尔巴尼亚在欧洲和全世界都很引人注目。从那时起，它并没有产生比往常更不愉快的感觉，成了依附于中国的微贱角色，并从1961年以来一直以北京唯一持久的卫星国著称。紧接着它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西方观察家们就普遍认为，地

拉那政权将效法南斯拉夫在 1948 年以后的做法，在外交上和经济上打开同西方的关系，从而避免遭受苏联的全面抵制所造成的绝大部分损失。

结果证明完全错误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以对阿尔巴尼亚局势的几个基本因素作了错误的理解为根据的：第一，阿尔巴尼亚领导集团决心要抵制同西方交往所带来的腐蚀性危险。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它害怕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这三个最邻近的国家的缘故，而这种害怕虽然是不正常的，但却又是可以理解的；第二，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程度都很低，这就使它大可不必象南斯拉夫那样设法替苏联及其盟国的贸易和援助；第三，中国完全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设备、专家和技术，使阿尔巴尼亚正在发展的冶炼工业得以运转；第四，霍查领导集团几乎完全不关心——而且也并不感到有必要去关心——阿尔巴尼亚的舆论（过去就是这样），也几乎完全不关心公众的种种愿望（那些愿望可能逐步发展）。

其结果是，阿尔巴尼亚作为一个奉行斯大林主义的死气沉沉的巴尔干国家已经勉强生存了十多年。它的政治制度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并且它是现在还系统地使用恐怖手段作为统治工具的唯一欧洲国家。然而，它的经济倒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它的基础冶炼工业甚至达到了比较高级的水平。这当然是中国援助的结果，但这种援助的规模和性质是不容易搞清楚的。^①阿尔巴尼亚还同苏联的东欧盟国有了少量的贸易

^① 关于到 1969 年为止中国给阿尔巴尼亚贷款的数字，参阅库尔特·塞利格“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的依附”，载《东欧》杂志（斯图加特，1975 年 4 月，第 235—

往来，但显然同苏联没有贸易联系，至少是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许多人估计它在1961年以后，可能要垮台的推测并没有成为现实。事实上，结果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成了霍查领导集团的理想保护人。中国维持了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但离得太远，无法对它进行干涉或威胁。在1913年以来整个波澜起伏的短暂历史时期中，阿尔巴尼亚还从来未曾有过这样一个保护人。

在中国保护的这个时期，地拉那与莫斯科的关系就始终限于通过报纸和电台互相进行侮辱和谩骂。阿尔巴尼亚的宣传工具还常常攻击苏联的东欧盟国的内外政策（罗马尼亚

245页）。然而，那里所列的数字也许并不能充分说明情况；承允在1968和1969年提供的信贷数字应当还要高一些。在谈到1968年11月的经济协定（由阿塞尔·查尔查尼在北京签订）时，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戴胡指出，中国的贷款按规模来说是“空前的”（《人民之声报》，1968年12月3日）。他说，根据1968年贷款协定预定在1971—1975年期间兴建的工程项目包括：

一个冶金联合企业，每年加工约八十万吨铁炼矿石并制造二十五万吨钢产品；一个能够处理一百五十万吨石油的炼油厂；一个装机容量为四十万千瓦的水电站；一个生产氮肥的工厂；过磷酸钙工厂的扩建工程；一个生产聚氯乙烯基和氢氧化钠的工厂；一个印刷厂；一个塑料产品工厂；将拖拉机备件工厂扩大一倍的工程；若干富集铬以及铜矿石、煤和石棉的工厂；若干新矿山的兴建工程。

除了扩大商船队和加强农业以外，根据1968年的规定要兴建的新工厂共有三十个。相比之下，六十年代中期建造的大工厂只有二十个。据认为1968年的贷款将近二亿美元。

1972年4月11日在北京签订了一项农业贷款协定，这是为三十个预定在目前（第五个）五年计划兴建的大工业工程项目提供的资金的补充。农业部长皮罗·多德比巴（他签署了这项协定）关于这笔贷款作了如下的说明：

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数量将有所增加，以便使我们能够加速春季农业工作并不失时机地完成一切必要的任务。我们将提高牲畜部门机械化水平，建造大面积的温室以生产大量的早熟蔬菜。维修现有的和添置的机器的机械基础将得到加强。新的贷款将使我国能保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

除外，其原因是很明显的)。①阿尔巴尼亚反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宣传主题是，它们的领导是修正主义者，并且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自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阿尔巴尼亚附和中国，指责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

然而，除了西方和东方少数几个密切注视阿尔巴尼亚动向的人以外，这类反苏活动几乎全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阿尔巴尼亚领导集团在整个六十年代推行极端严峻的对内政策，阿尔巴尼亚照搬中国1968年文化革命的做法，以及它毫无疑问取得了真正的经济进展等等，这些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事实是，只有当阿尔巴尼亚在外交组合或站队方面起了可能影响国际现状的作用时，人们才加以注意。先是作为苏

大量的杂交谷物、大豆、高粱和棉籽，此外还有机器设备以及生产除草剂、杀虫剂等等的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将帮助我们采用商业捕鱼的新方法和新设备。《人民之声报》，1972年4月27日。）

当然，贷款也包括资助阿尔巴尼亚的重武器，虽然这一点从来没有详细谈到过。

1975年7月3日，报刊披露李先念和查尔查尼在北京签订新协定的消息。议定书规定提供“一笔长期的无息贷款，这是向阿尔巴尼亚供应某些工程项目所需的成套机器设备的议定书，是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是1976—1980年关于两国换货和支付办法的协议。”（《人民之声报》，1975年7月4日。）

我非常感激路易斯·赞加向我提供了这份材料。

① 阿尔巴尼亚所喜欢攻击的目标是波兰。这是地拉那已经成为波兰共产党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派别的总部而产生的后果。这个小派别由1966年离开本国的前中央委员卡齐米日·米雅尔领导。他和他的朋友们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并在地拉那电台主持色彩浓厚的波兰语广播，先是攻击哥穆尔卡，后来攻击盖莱克，以激烈的措词弥补精确的言论所缺少的内容。1975年初，米雅尔访问中国，逗留了几个星期。他的活动也许是由中国人资助的——间接依靠北京为维持地拉那电台的大量外语广播节目而给予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大笔款项。

联的盟国，后来又作为中国的盟国，阿尔巴尼亚只有看来在其依附苏联或中国方面成了问题的时候，才骤然在世界上处于突出的地位。自从1971年美国开始谋求与中国和解以来，人们对于中阿联盟的前途如何，的确有过不少揣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才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又多少对阿尔巴尼亚发生兴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孤芳自赏，以其自动不参加当代两个最强大的世界联盟体系而洋洋得意，它们在这方面基本上是互相倚重的。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用处是明显的；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潜在用处是作为在东欧开拓地盘以反对苏联霸权的桥头堡。尽管谣传中国在1971年支持地拉那-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组成一个轴心来对付苏联高压统治的威胁，阿尔巴尼亚最后却并没有起到中国最初所希望的那种桥头堡作用。不过，只要中国人决心在既定的世界外交范围以外进行活动，阿尔巴尼亚还保持一种象征性的作用。然而，一旦外交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开始谋求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人们自然就要怀疑北京和地拉那过去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否能持久不变。

大多数的问题一定会从阿尔巴尼亚而不是从中国方面产生。虽然阿尔巴尼亚远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但对中国人来说，它仍旧有它在象征性、宣传、声望和心理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如果阿尔巴尼亚摆脱现有的地位，重新受苏联的统治，那就意味着中国遭受重大的失败。至于说到为保护一个国家面付出的代价，那当然是不小的，不过北京仍然重视政治利益而不考虑所花的费用，至少就阿尔巴尼亚来说是如此。

阿尔巴尼亚人提出的问题肯定是集中在这种保护关系能

否继续下去这一点上。不幸的是，阿尔巴尼亚分明是个被保护国。它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单独国家的简短历史中，先是受奥地利的保护，然后是受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德国的保护，接着又受南斯拉夫、苏联以及现在受中国的保护。如果被中国抛弃，阿尔巴尼亚迟早必须向别处寻求经济上和外交上的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领导集团显然不赞成中国对美国开展的外交策略。它没有公开地这样说，但是从1972年起中阿关系的热烈劲儿看来已经有点冷淡下来。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的电台报刊对美国的攻击并没有减轻，而美国的建议——例如副国务卿拉什1973年4月在安纳波利斯的发言中提出的建议——却被置之不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明显的预防措施，阿尔巴尼亚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步骤，与南斯拉夫和希腊这两个传统的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1974年期间，人们显然可以看出，对于阿尔巴尼亚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前途如何捉摸不定这一点正在影响国内政权的团结。两名中央委员显然由于是“自由派”和同情西方而被清洗，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反映武装部队内部不团结的重大得多的事件。这些事件都与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将军这个人有关。这年夏天，他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并在10月份正式由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兼任国防部长。同时，在国防部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层中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看来，阿尔巴尼亚政权的第二号“铁腕人物”谢胡接管了国防部（至少是暂时地），以便恢复秩序并遵循正式的霍查路线办事。

对于巴卢库销声匿迹的原因，人们推测纷纷。一些西方观

察家认为他主张改变阿尔巴尼亚的结盟路线，要恢复同苏联的较密切的关系，或者至少同它实现关系“正常化”——事实上，有些人把他当作阿尔巴尼亚的彭德怀或者甚至是林彪。这种说法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是根据情况所作的纯粹的猜测而已。由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阿尔巴尼亚有完全陷于孤立的可能，同时巴尔干半岛、东地中海和中东等地的局势日益不稳，这些因素所提出的问题都严重地影响着由巴卢库领导的军事部门，如果军方在面临这些问题的同时很可能还要关心中国是否有能力向阿尔巴尼亚部队提供现代化装备，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不满情绪会在军队方面集中表现出来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阿尔巴尼亚政权公开承认了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严重不团结现象。在巴卢库销声匿迹的同时，霍查、谢胡和其他人猛烈攻击苏联，并且间接暗示说苏联进行了干预（虽然巴卢库本人并未受到批判，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们再次大力肯定了与中国的联盟，排除了那种担心霍查-谢胡领导集团对于所承担的联盟义务摇摆不定的说法。事实上，领导阿尔巴尼亚政权的紧密团结的小集团除了维持其现行政策外看来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对他们来说，所面临的危险在于他们手下的一批官员要求改变现状的压力日益增长。

因此，中阿联盟关系仍然没有受到损害。只要阿尔巴尼亚并不遭受具体的威胁，这种联盟关系不但对阿尔巴尼亚没有坏处，而且还是一件相当可取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阿尔巴尼亚实际上要处于毫无防御的地位，不过受侵略或攻击的可能性还是很小。希腊比较稳定的立宪政府（目前看来它

在短期内还将是稳定的)不会谋求抛弃它前届政府推行的对阿尔巴尼亚的和解政策。总之,只要想到对塞浦路斯采取灾难性行动以及随后为此问题花费大量精力这一经验教训,就足以使雅典在今后若干年内不去对北方邻邦做任何不负责任的事情。

至于说到苏联,它要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军事干涉是十分困难的,这也就是阿尔巴尼亚能够首先摆脱苏联监护的主要原因之一。再说,中国那怕只是为了维护它自己的信誉,也必须以某种方式设法保住它的这个长期忠诚的盟国;否则,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都会看到中国丢脸并从中吸取教训。周恩来可以用“远水救不了近火”这句警句让南斯拉夫不要指望(如果南斯拉夫有这种指望的话)万一苏联进行干涉时会得到中国的支援。但是,他不能用这类民间格言去搪塞中国多年来唯一的盟国阿尔巴尼亚。或许中国在苏联边境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就足以制止苏联对地拉那采取任何干涉行动了。苏联不得不考虑,不仅中国会对这样一种针对阿尔巴尼亚可能采取的行动作出反应,而且也还要考虑美国和西欧的反应——而这方面恐怕是更为重要的。苏联对东南欧这一部分的侵略会破坏结盟的希腊和中立的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威胁意大利,为苏联舰队提供一个海军基地,或许还要修复发罗拉的潜艇基地——所有这些可能性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不能接受的,也是脆弱的东西方缓和纽带所无法承受的。

阿中联盟会不断受到侵害,这种可能性比阿尔巴尼亚的安全遭受任何军事威胁或阿中联盟突然破裂的可能性都来得大。甚至这种情况也决不是在短时期内、比方说在今后五年

内肯定会出现的，虽然经过较长的时期以后是十分可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阿两国的领导集团是否稳定。在阿尔巴尼亚人方面，他们必须比大多数人更加密切地注视中国领导集团中间的派别活动，强烈希望它会出现一反六十年代顽固地反对西方的态度，同时又坚持不可调和的反苏立场。他们甚至还要更加密切地注视中国领导人的接班问题，而接班问题高潮的到来是不会遥遥无期的。至于说到阿尔巴尼亚的领导集团，除非它改弦易辙，似乎不大可能结束三十多年来以着眼于国内的，偏执狂的残忍为其特征的统治。可是，党书记霍查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都已六十好几岁了。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可疑的，并且据说他们最近都曾去西方接受治疗。不论阿尔巴尼亚目前的领导集团怎样关心中国的政策，它大概将会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与中国的联系。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它不可能回到莫斯科的怀抱，也决不会同南斯拉夫修好，因为阿尔巴尼亚对它从前的这两个保护国是深有了解的。自从1973年以来就有迹象表明，阿尔巴尼亚或多或少准备扩大它与西欧的关系，特别是与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和西德的关系。阿尔巴尼亚也有可能追随中国的做法，同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接触。但是，很难说霍查领导集团会赞成同西方达成这样一种和解，即阿尔巴尼亚因此将向西方敞开大门，接受它的巨大影响并同它进行很多接触。

要是地拉那和北京都换了新的领导班子，阿尔巴尼亚同中国的关系继续遭到损害，情况也许就会有所不同。随着霍查时代的结束，阿尔巴尼亚很可能出现一个国内局势不稳定的新时期，而派系斗争和地方政治活动则会重新发挥它们历

来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这种局面还可能使阿尔巴尼亚在外交上重新站队，从而可能产生相当大的国际影响。象在十九世纪的希腊宫廷那样，有多少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国际后台，那里就会有多少派别。肯定会有一派人主张重新恢复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也会有一派人要求恢复与莫斯科的关系；南斯拉夫人几乎肯定会设法拥有他们自己的支持者；还可能有一派人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榜样很感兴趣，竭力主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西方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认为这才是至少可以取得某种程度的国家自主权的最好办法。

当阿尔巴尼亚在大约十五年前选择追随中国这条出路时，人们认为那是包含着最有爆炸性影响的一件外交大事。现在，如果阿尔巴尼亚的任何新领导选择继续追随中国的路线，人们也将认为那是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稳定因素。任何别的选择肯定将带来不稳定的趋势。至少就国际方面来说，选择接近西方的路线所包含的不稳定因素多半是最少的，如果在推行这种路线时能够持克制态度的话。（当然，这种选择在国内可能会导致非常不稳定的局面。）考虑到阿尔巴尼亚对塞尔维亚人抱有的宿怨和恐惧，南斯拉夫派在地拉那占优势的可能性也许是最小的，然而，万一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会把阿尔巴尼亚同苏联的关系搞得十分紧张。它还可能使南斯拉夫本身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因为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可能企图利用地拉那从贝尔格莱德获得更多的让步。此外，这种形势的发展只会使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关系恶化。因此，万一阿尔巴尼亚选择了靠拢南斯拉夫这条不可能实现的路线，它看来也难以长久保持一帆风顺的趋势。

当然，选择追随苏联这条路线大概会成为最不稳定的因素。其结果将等于是苏联占领这个国家，让苏联占尽便宜而丝毫不受上文提到的在对阿尔巴尼亚实行军事占领的情况下将从中国或美国招来的那种惩罚。如果阿尔巴尼亚的新领导集团本身想要恢复它与莫斯科的联系，那么无论中国或美国都无法在军事上或外交上采取报复行动。另一方面，地拉那的领导集团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何任一个派别都不占决定性的优势，这就可能导致一种相当危险的局面。到那时候，错误估计形势和造成灾难的机会就太多了。阿尔巴尼亚潜在的国际意义与它幅员的大小和固有的重要性形成反比，作为这样一个国家，它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巴尔干地区将来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局面多半会由南斯拉夫所产生。他们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不应该忽视在阿尔巴尼亚出现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

东欧国家内部关系的各个方面

尽管所有的东欧国家（除去阿尔巴尼亚，也许还有罗马尼亚）都带有鲜明的苏联印记，尽管共产党统治了将近三十年，关于七个东欧国家的这种论述多少可以使人了解到，每一个东欧国家还怎样保留着它的非常强烈的个性特征。而且，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多么依赖苏联对它表示忠诚，甚至唯命是从，却已经用某种方式向它提出了彼此的关系问题，或者有可能这样做。

现在值得考虑一下东欧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往往被忽视的

方面，即东欧国家相互的关系。忽视这个问题有两种原因：(1)苏联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2)由于苏联占有这种统治地位，人们往往认为那些东欧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个性，因而它们彼此的关系是无足轻重的。

这种推论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苏联的统治对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比对内政策甚至更有约束性的影响，并且苏联的政策已经表明它不信任有关国家之间的那种可能体现其形象和声势的联系。斯大林最初好象曾经鼓励成立一个包括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内的南部斯拉夫联邦，但后来在1948年突然改变了主意。在他自己同东欧的关系上，他竭力希望采取双边联系的办法。他的后任赫鲁晓夫固然并不忽视双边关系，在1956年以后却通过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坚定地趋向于一种更加多边的结盟体系。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词儿才开始被采用。勃列日涅夫已经多方面加强了这种多边的联系方法。这个体系乍看起来似乎可以促进东欧国家成为集团的组织形式，但苏联决心保持其权力垄断这一事实总的说来已经妨碍了那种集团的组成。在这方面，东欧国家内部的分歧已经帮助了苏联人。历史上的敌对情绪（例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敌对情绪）、民族成见以及与苏联结盟体系内部争端有关的一些更加直接的因素，也已妨碍纯由东欧国家组成多国联盟的行动。例如关于经济合作和专门化问题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曾建议罗马尼亚改变它的全面工业化计划并满足于继续成为一个以农业和原料生产为主的国家，这可能就是罗马尼亚采取独立自主政

策的根由。^①大概还存在着东欧国家对苏联贷款和原料分配问题的严重抗衡。事实上，单是无孔不入的苏联的势力和统治就一定无可避免地会引起联盟内部较小成员国之间一系列的猜疑和戒备。

然而，六十年代东欧国家三个非正式集团的例子表明，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抗争，它们出于政治、经济或地理上的考虑是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的。意味深长的是，在1964到1968年期间，当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显得最为薄弱的时候，人们约略可以看出有这样几个集团。

首先是包括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铁三角”。这三个国家在地理上毗邻并在许多经济方面实现了工业化——或者以波兰来说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所以，尽管历史上有过对抗行动，它们确实形成了一个自然的联盟。同苏联在一起，它们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所谓“北方一排国家”，掌握着那个阵营绝大部分的人口、工业财富和资源。^②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成员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接壤，所以它们仍然考虑敌对的西方的矛头所向问题。

现在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足以说明这个三角集团的真实性质或意图。一些观察家甚至往往不相信有这种集团。但是有某种迹象表明，这些国家主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鼓动下，通过以广泛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各种各样的接触，曾非

^① 参阅约翰·迈克尔·蒙蒂亚斯《共产党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7年版）。

^② 关于“北方一排国家”这一概念的最早的讨论，参阅戴维·J·达林《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外交政策》（纽约利平科特书店1961年版，第364—365页）。

正式地力求在苏联联盟内部组成一个具有特殊性质并执行坚定不移地敌视西德的政策三国联盟。这种努力并没有加紧进行下去。首先，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提尼领导集团本来对这种想法并不热心，这时又忙于处理非常严重的国内纠纷。其次，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乌布利希本人的盛气凌人的主张可能怀有戒心。此外，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对抗情绪，使得任何积极的合作更难实现。^①因此，“铁三角”这一概念最后剩下的只是波兰和东德领导集团之间一种消极的但决不是不起作用的利益共同点——敌视西德以及在1968年敌视捷克斯洛伐克新的改革派领导集团。

在六十年代中期，显然得到几分官方支持的匈牙利国际法学家们悄悄地和非正式地提出了中欧和东欧国家实行联盟的更加有诱惑力的设想。这种设想就是“多瑙河流域国家之间的合作”。当时有些观察家认为这是匈牙利的一种尝试性的企图；尽管它是苏联联盟中的一个忠实成员，它却想在对外事务方面多争取一点活动的余地。匈牙利所提出的建议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把奥地利包括在合作计划之内。当然，苏联由于它本身是濒临多瑙河的国家而没有被排除在外，但是情况非常明显，三个主要的国家是匈牙利、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反应最积极的正是这后面两个国家。在苏联于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这种讨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1968年，曾短暂地出现了第三个非正式集团。它包括罗

^① 欧文·韦特《在共产党的最高层：铁幕后内情的解释者》（伦敦麦克米伦书店1973年版）列举了这种厌恶心理的生动事例。

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由此使人想起了战前的“小协约国”。这个集团基本上是以捍卫共同利益防止苏联干涉为基础的，并受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有权采取其自行选择的政策这一立场的鼓励。它的显著特点是加强有关的三国之间的正式互访和强烈地表示互相同情。象匈牙利提出的多瑙河合作建议一样，1968年8月事件一发生它就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更为突然。

自1969年以来，苏联在东欧积极实行统治的措施已经足以阻止这几类国家集团的建立。在经互会内部实行“有关一方”的原则，很可能在将来导致一些成员国联合起来从事一种不包括苏联在内的具体计划。但是，直到现在为止，经互会内部的每一种联合行动或计划都包括苏联在内并受苏联的指挥，排除苏联参加任何重要的经济联合行动的前景似乎非常渺茫。

在东南欧，苏联只对保加利亚实行牢固的控制，因此这一地区为今后形成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地区性集团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已经有一种密切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几乎是对抗苏联压力的一种防御性结盟。有些观察家认为1971年在中国的保护下正在形成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地拉那防御性的反苏“三角联盟”，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然而，鉴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已经有了密切的关系以及阿尔巴尼亚显然有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主动表示，这三个国家在中国的同情和给予道义支持的保证下决不是不可能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基本上反苏的联盟。最近几年，罗马尼亚也竭力提出建议，要求建立包括巴尔干地区四个共

产党国家以及希腊和土耳其在内的该地区多边合作关系。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一部分原因在于希腊和土耳其有着敌对情绪，但也由于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宁可**通过双边接触以取得一致意见**。保加利亚也已提倡双边接触这一事实可能表明苏联是不赞成罗马尼亚提出的多边关系的。然而，苏联的这个观点可能发生变化。例如，莫斯科可能看到了把希腊更密切地纳入巴尔干地区性集团从而使它进一步疏远西方联盟所带来的好处，认为这种好处足以抵消它并不直接控制的一项活动所包含的危险或不测事件而有余。

因此，在整个东欧，苏联常常劝阻它的盟国组织多边集团。然而，它确实容忍并且可能赞成某些特殊的双边关系。目前这些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布拉格和东柏林已经有了密切的经济合作，1972年以来它们有过多**次互访**，并且就范围广泛的种种问题举行过一系列非常密切的双边会谈。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保持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是由双方策划的，并且几乎一定是得到苏联领导人的认可和同意的。这是一种在经济上自然形成的关系，并且这两个国家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共同的边界，尽管现在它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经和六十年代不同了。但是，看来这种关系也还有东德在政治上处于监护地位的方面——至少根据东柏林的观点来看是如此——莫斯科对此可能也是充分了解的。的确，苏联人挑选不到一个比东德共产党更可靠的助手来帮他们监督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常化过程了。至于胡萨克领导集团，他们在正常化初期的不稳定阶段可能是欢迎这种监护的。然

而，当那个政权变得比较稳定和较为自信时，这种满足现状的心情可能就要消失。

由于1972年取消了东德和波兰之间的旅行限制，看来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正在不仅影响国家而且影响其社会的令人鼓舞的新道路上发展。可是，这种大胆的实验后来不得不大加压缩，其结果好象只是让民众留下了一系列无补于立即恢复自由旅行的怨恨情绪。从那以后，虽然昂纳克和盖莱克的个人关系似乎比他们前任之间的关系好得多，并且他们还顺利地发展了经济关系，但是东柏林和华沙之间的关系却谈不上是特殊的双边关系。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形成的关系，甚至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特殊关系还要引人注目，并且更难解释得多。人们本来预料这两个国家只会有冷淡的一般性交往，因为它们同苏联的关系差别太大了。然而，过去五年内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作却有了惊人的飞速发展，所包括的面很广，并且是热诚的。在苏联和罗马尼亚关系紧张的时期——例如，1971年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之后——当东欧其他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公开攻击罗马尼亚时，保加利亚却保持缄默。事实上，保加利亚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在谈到罗马尼亚时语气几乎总是友好的，强调意见互相一致的地方，掩盖有尖锐分歧的问题。两国的特殊关系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说明，即早在1975年，两国党政首脑齐奥塞斯库和日夫科夫正式同意以后彼此每年至少会见两次。没有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作出过这样的诺言。

这两个大致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毗邻的社会主义国

家显然有着重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其中之一当然是希望在经互会内部提高农产品价格。它们之间没有象马其顿问题这种引起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关系恶化的问题，也没有同样地影响着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国关系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①因此，人们完全可以预料它们之间会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但是，从它们在同苏联及其联盟体系的关系方面所存在的根本分歧看来，它们之间似乎是不可能产生现有的这种密切关系的。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事实是，苏联专门指定保加利亚作为苏罗之间的桥梁，并作为一个最适宜于以下工作的忠实盟国：在平时维持良好的关系；在关系十分紧张的时期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起到调解或接触的作用。至于罗马尼亚，它大概并不反对保加利亚被用来充当这样的角色，并且很可能看出它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苏联的一种类似的考虑也许有助于解释东欧的另一特殊双边关系，这就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过去五年期间，特别是从1971年9月勃列日涅夫成功地访问了南斯拉夫以来，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各个领域迅速地得到发展，以致苏联联盟中的一个忠实成员国和不受约束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建立了异常友好的关系。苏联人对于它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一清二楚的，并且他们显然看出，同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地想置于掌握之中的一个国家发生这种联系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所以，在苏联人的心目中，可能有意要让匈牙利对

^① 当然，南多布罗加问题一度影响了罗保关系。（这片地方是罗马尼亚在1940年割让给保加利亚的。）然而，这个问题同马其顿、特兰西瓦尼亚或比萨拉比亚问题相比，就不算什么问题了。

南斯拉夫起到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所起的那种作用。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苏联人正在施展一种十分巧妙的策略，这种策略在一般国际关系中并不新鲜，但在斯大林甚或赫鲁晓夫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可是，这种策略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危险的根源倒不在于保加利亚或匈牙利受到其伙伴的独立政策精神的影响，而在于这些特殊关系本身会产生一种力量，最后出现一种不要苏联人参与或者实际上把苏联人排除在外的局面。例如，既然匈牙利无论怎么说都由于南斯拉夫对待伏伊伏迪纳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开明政策而表示赞赏，它就可能认为它同贝尔格莱德的关系能够在苏联联盟严密控制的范围以外提供某种程度的自由行动余地。因此，在六十年代促使其提出多瑙河流域合作建议的同一动机也许在七十年代同南斯拉夫的特殊关系中正在悄悄地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受到新经济结构精神鼓舞的匈牙利经济官员几乎肯定认为他们与南斯拉夫对等官员的合作要比与苏联或东欧许多国家官员的合作来得容易。

有人推测保加利亚在同罗马尼亚的交往中会遇到危险，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不过，危险仍然是存在的，谁也不能保证保加利亚人永远不会遭受危险。只要东欧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不管苏联支持与否，这种关系都有受到某种程度和某种性质的控制的危险，因为苏联的领导集团认为这种控制是为保持其霸权地位所必不可少的。

第三部分 型式、结论和预测

在本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我们曾试图论证苏联在东欧的目标，并分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达到那些目标方面所采用的方法的差别。第二部分以较长的篇幅论述近年来苏联和东欧关系的总的趋势以及影响这些趋势的因素，并稍稍详细地讨论了苏联和各个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

第一部分的分析表明，在本十年的头五年，苏联人在六十年代东欧骚动之后恢复该地区的团结和稳定方面无疑地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而在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在与苏联的国家关系方面和国内事务方面出现的离心力曾产生了一种在莫斯科看来有损于苏联霸权地位的不稳定局面。捷克斯洛伐克大体上已经达到“正常化”。匈牙利国内的发展已经被抑制，甚至受到约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集团已经撤换，新的领导集团向苏联的西方政策提出的问题不象以前那么多，它在苏联联盟本身内部引起的令人头痛的事也少一些。1970年被兰严重的动乱在明智和慎重的处置下被控制住了。罗马尼亚的背离行为虽然远没有克服，在最近六年的大部分时间虽却已被遏制在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在整个地区方面，多边的一体化过程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整个东欧、特别是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显著地有所提高，在象波兰这样一些国家，甚至提高得格外引人注目。经济和技术知识

阶层在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占据有影响的地位。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即作家们的政治势力已经大部分受到压制。最近，苏联利用世界通货膨胀的影响和提高其原料交货时的价格，在经济上已加强了对东欧各国的控制。

因此，苏联有合情合理的理由感到满意。然而，感觉敏锐的苏联领导人或许认为并没有踌躇满志的理由。首先，六年的期间要用来判断勃列日涅夫的东欧政策是否真正取得成就，未免太短。苏联已顺利地克服了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并恢复了“正常化”。但我们不能过早地断言，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危机并有必要进行干预的根本原因已经消除。也不能完全有把握地说，苏联确实看来是为了消除那些原因而提出的一体化概念在其今后贯彻的过程中不会使那些原因死灰复燃，火上加油，甚至酿成不稳定和分裂局面的新因素。

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

本研究报告的第二部分、特别是论述各个国家发展动向的那一节表明，东欧仍然不时向苏联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局势——现实的和潜在的。而结一致和一体化措施尽管取得一些进展，至目前为止却显然没有能够排除这些问题。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民族主义。 这仍然是苏联人在其对东欧的关系中所面临的最严重、肯定也是最有爆炸性的问题。南斯拉夫于1948年以及阿尔巴尼亚于1961年与苏联决裂，原因就在这里。这

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罗马尼亚要叛离苏联。民族主义在波兰仍然是个频繁发生的问题，因为那里的一些因素（已在第二部分讨论过）很可能在将来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轻得多的程度上，它可能由于保加利亚对马其顿问题所持的态度而引起一些纠纷。在一种不稳定的形势下，它可能在匈牙利危险地引起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甚至在人为的产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它迄今为止几乎十分明显地是苏联的一个附属国，象乌布利希这样的领导人都违抗苏联的愿望，达到最后被悄悄地撤换的地步。哪怕在目前，引起东欧各国坚持其自身权利的危险可能也没有完全被排除。

社会上的紧张气氛。 由于东欧大多数国家以及苏联本身采用了审慎的“消费主义”政策，产生社会上的紧张气氛的危险在过去五年期间已经有所减轻。波兰1970年的动乱肯定加速了采取消费主义政策的步骤，但是那些动乱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的紧张气氛即使隐忍未发，也是始终存在的。事实上，这些紧张气氛在波兰仍然具有最大的危险，因为波兰胆大的工人阶级现今是在经济和社会决策方面一个隐约可见的、不受欢迎的但不可避免的伙伴。波兰存在着由另一个管理机构即罗马天主教会所支持的占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同时政府显然打算逐渐改变农业的结构，这些因素也使波兰的问题更加复杂化。然而，如果说波兰是个特殊的事例，这可并非唯一的事例。近三十年来东欧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已使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大量增加，扩大了东德、捷克地带、波兰和匈牙利一部分已经存在的工人阶

级中心。^①目前，规模大得多的工人阶级觉悟正在开始显现出来。尽管在人口过分拥挤的城市中心住房条件很不充分，但近几年由于工资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并且按西方的标准来说工作松散，这部分人还是比较满意的。（顺便提一下，这些因素一般说来使东欧的工人们在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表示怀疑，因为经济改革强调合理化、效率、较高的生产率等等，从而可能推翻至今享有的还算不错的工作条件。）然而，既然现在由于世界通货膨胀、苏联原料价格上涨以及东欧严重缺乏劳动力，经济前景比五十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暗淡，东欧各国政府正在告诫它们的人民要对今后十分艰难的生活有思想准备，并且需要更加认真、更加努力地工作进行。因此，如果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甚或以前盼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心愿完全落空，整个东欧社会就会产生紧张气氛。所以，苏联必须谨慎从事，避免把它大大加强了的对盟国的经济控制逼得太紧，以致出现社会不稳定局面。

东欧讨价还价的力量。 这个因素是同上一个因素密切相关的。以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例，它们也许会顺利地利用它们的软弱和从属地位作为对苏关系中的讨价还价力量，象在第二部分所讨论的那样。在由国际发展引起的经济危机的处境下，经济上比较软弱的东欧国家——匈

^① 关于东欧已经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化，还需要作更多的研究工作，而这种变化无疑将对东欧和苏联的关系产生长远的影响。但是，可参阅戴维·莱恩《不平等的现象结束了吗：论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等级问题》（哈蒙兹沃思，企鹅丛书，1972年）；以及弗兰克·帕金《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秩序：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党社会中的社会等级》（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1年版）。

牙利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也许能够从苏联取得重大让步，只要它们指出，如果苏联拒绝给予那种让步，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破坏性后果。受到严重影响的东欧国家可以采取的另一策略将是表明，如果执行苏联新近制定的每年改变其原料价格的政策所造成的中央经济计划，那就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危险。从1975年初而不是从1976年起开始提高价格这一意料不到的决定，无疑也曾使东欧各国经济体系的短期计划工作陷于混乱，计划工作发生混乱，其结果必然带有缺乏事先周密安排的临时凑合的性质，这样一种不利的预兆也许是东欧各国手中的一项有效武器，用以在莫斯科对抗苏联的十分担心自发性行动的领导集团。或者，如果在两三年内苏联原料的价格确实与世界市场上流行的价格并无什么差别，我们就不难看到，一些东欧国家势必要另辟途径来满足它们更多的原料需要。事实上，早在苏联人提高其价格之前，它们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因为莫斯科本身曾经发出警告，就长期而言，它不能全部满足它们日益增长的需求。1975年6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经互会会议上，苏联人再次尽量向他们的盟友保证，他们正在竭尽全力来维持和增加原料的供应；他们还利用这个机会来强调说明苏联的价格仍旧低于世界的价格。他们是否能够完全使有关各方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或许是个疑问。

上层领导集团内部的紧张气氛。 同五十年代骚动时期相比，东欧目前的领导集团从外表上看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派别活动在某些领导集团中肯定仍旧存在（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如此，尽管胡萨克居于支配地位），但一般说来是受到抑

制了。除铁托以外，有些东欧领导人也可以自夸其漫长的任职经历：霍查从1941年起就担任党的领袖，日夫科夫从1954年起、卡达尔从1956年起、齐奥塞斯库从1965年起担任同样的职位。可是，正因为他们的任期已经很长，在不久的将来有些国家就必然要发生领导人的继承问题，也许需要苏联从政治上进行干预。当然，继承问题的危机固然不再被认为是共产党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1964年在苏联，1965年在罗马尼亚，以及1971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员的更换是处理得非常沉着和顺利的。然而，并不能保证每次都这样办理。在匈牙利，情况可能是如此，但是在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更不必说南斯拉夫，当现在的领导集团发生人员更替时，显然有可能出现不稳定局面，而发生这些事情的地区，正如在第二部分已经提到的那样，也许将引起苏联日益密切的注意。然而，除那些领导集团内部可能关系变得紧张而外，有些东欧国家也许会出现影响经济和技术知识阶层的紧张气氛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就眼前来说，这批杰出人才或许感到满意或满足，但是，正如在第二部分有关匈牙利的报道中提到的，新经济结构计划规模的缩小可能在那些倡导和贯彻这一计划并从中得到利益的专家治国论者中间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而且，在其他东欧国家，领导集团所奉行的“而向工人”的坚强政策，特别是在报酬和职业上的提升方面，可能会严重地威胁经济和技术知识阶层的地位和特权。最后，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可能挫伤这个阶层的士气，从而使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计划所倚重的这一类人离心离德。

苏联国内的问题及其对东欧的影响

第一部分提到的一些因素中有一项对苏联所形成的关于东欧重要地位的看法起了作用，这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因素。它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统治下开始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它看来已经成为近六年来十分令人注意的反复强调团结一致这一做法的主要动机。这个因素之所以重要，部分是由于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看到有必要恢复赫鲁晓夫时代之后的稳定局面和肃清那个时代的不良影响，部分是由于它在执行其西方政策并随之出现国际局势缓和的同时认为有必要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

但是，第三个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苏联领导集团本身内部专门依靠中央控制的官僚机构以及采用保守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越来越难以应付它自己的国内问题。我们不当夸大这些国内问题，把苏联说成是濒于崩溃的国家。然而，即使是最保守的分析似乎也足以表明，在经济系统、少数民族问题以及与比较重大的政治和文化表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方面，苏联迫切需要一种经过大量改革的管理体制。然而，现在的领导集团不但是不愿意而且是无法办到的。它依靠它的高级成员过去在所受的训练中学到的原则和方法，往往用陈旧的官僚政治特有的镇压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和日益高涨的问题。象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一样，新的思想不受欢迎，而且遭到怀疑和畏惧。因此，苏联领导集团面然在国外表现出大胆和力量，却自相矛盾地同时在国内显得异常胆怯，并怀有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只要现在的领导集团继续掌权，重新强迫要求东欧各国恢复正统观念和一致性以及更严密地对它们进行控制的努力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它将用新的镇压手段来对付国内新的挑战，或者至少是加紧采取旧的一套方法来进行镇压，而这种镇压是很可能也会对东欧实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履行的团结一致的要求也许将在苏联政策中甚至占更大的比重，而独立生存的权利甚至降到更不重要的地位。因此，过去六年间偏向于宣扬团结一致精神的政策考虑可能更趋极端。

所以，在七十年代后半期苏联对东欧实际执行的政策方面可以预料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根据形势推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苏联将加速和加紧努力，以增强经济、军事、政治、外交政策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协调工作——统统归纳到一体化这个名称之下。以前作出的所谓一体化是长期计划的保证，现在不再被认为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了。

在经济领域内，我们可以料想苏联人将在经互会内部加速一体化的计划工作进程，迫使东欧国家在苏联原料工业部门投入更多的资金，并提倡作出一些经济安排以加强苏联—东欧合作中的超国家成分或跨国成分而有损于各个国家目前对其经济事务的管理上所掌握的大量国家控制权。苏联人的所有这些做法，是想充分利用他们对其处于从属地位的盟国的关系中已经捞到的巨大好处。或许并非巧合的是，罗马尼亚人又已开始对于“西方国家的”新闻界所报道的要设立“国际生产联合企业”之类机构的建议表示不满；他们显然没有忘记瓦列夫教授 1964 年在莫斯科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明显地反

映了赫鲁晓夫的志趣，而他们当时是尖锐地作出了反应的。^①

关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作用，我们可以料想苏联将继续维持其支配地位，而这种支配地位现在已经十分明确，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说到条约组织的政治协商作用，如果苏联人力求实现所传说的愿望，建立某种中央集权的机构便于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更密切、更迅速的配合，那将是不足为奇的。这将是对于有可能出现国际缓和以及最后就欧洲合作和安全问题达成协议这种明显危险的典型回答。

在意识形态方面，正如在第二部分提到的那样，苏联人处于特别微妙的境地。毫无疑问，在思想上，他们会希望在东欧确立更加密切的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以及制定某种保障这一一致性并使其永久存在下去的手段。1975年上半年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的准备工作证实了这一点。可是，象第二部分所论证的那样，他们了解得很清楚，这样做势必使欧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重要的党同他们疏远——事实上，他们已经疏远了。然而，以前的经验表明，特别是关于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当东欧出现的局势被认为有重大利害关系或那里的危险被认为相当严重时，苏联人将首先关注东欧，必要时甚至牺牲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威信和影响也在所不惜。这方面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苏联人将对那些具有独立主张的党的敏感性作出一些让步，并在欧洲共产党会议和最后召开的任何世界会议上不再坚持要求更紧密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团

^① 对于这些条款中若干条款的简短讨论，请参阅亨利·特伦德“经互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背景”（自由欧洲电台研究和分析背景报告，1975年6月16日）。关于1964年瓦列夫事件，请参阅布朗“新东方……”一文，第129—130页。

结。但在东欧那些愿意接受他们的要求的党中间，苏联人将要求具有受他们控制的更大程度的正统观念和协作精神，甚至达到设立某种非正式机构的地步——例如意识形态秘书处的定期会议。象罗马尼亚以及当然还有南斯拉夫这样的党其势将拒绝合作；但是在这个领域，“有关一方”的原则可能也是会被容许发生作用的。而且，第二部分已经提到，所冒的风险不小，因为欧洲和世界运动中其他的党看到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认为这是苏联关于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真实看法。不过，情况虽然如此，这却是莫斯科不得不冒的风险。

所有这些保证要有较大程度协调动作的措施，必然会遇到若干东欧国家政府和党的或多或少的抵制，并不仅仅限于罗马尼亚一个国家。抵制得最激烈的，可能是在经济领域，因为那些国家领导集团的执拗态度——例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匈牙利——将受到经济和技术知识阶层的有力支持。如果苏联人逼得过紧或逼得太急，一些东欧国家就可能出现类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促使罗马尼亚叛离的局面。当年苏联逼迫罗马尼亚修改它的全面经济发展计划时，罗马尼亚领导集团看出了它所拥有的或希望拥有的无论何种合法性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景。它作了对抗的回答。今天，如果苏联要求一个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参与削弱其本国明显的民族身份，这个领导集团就很可能面临一场有关合法性的甚至更大的危机，并决定加以反对。在这方面，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就会重新冒头，象波兰或匈牙利这样一个国家就可能随之暴露反苏情绪。

而且，如果苏联人决定加速一体化过程，那么他们至今用

以进行这一过程的耐心和巧妙而熟练的手腕就会由急躁和笨拙所取代；直截了当的飞扬跋扈气焰就会代替至今采用的在其指挥下取得一致意见的方法。万一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尽管苏联人在其对东欧人的关系中占尽了便宜，他们不能指望自己的道路象过去六年那样比较平坦。

苏联的继承问题和其他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对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来说可能是异常重要的因素：苏联领导人的继承问题。统治苏联的老化的寡头政治集团一定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开始解体。许多人正在预测，勃列日涅夫本人在1976年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不再担任党的领袖。即使这不过是他自动离职的问题，但那也将是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和笼罩着可能出现不稳定局势的疑云的重大时刻。^①可是，苏联寡头政治集团最有势力的成员中的其他一些人——柯西金、格列奇科、基里连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年龄比六十八岁的勃列日涅夫还要大一些。这一定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个已经严重的问题复杂化，因为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领导人的更迭，而且是前卫队的一次迫在眉睫的改变。

在这些情况下，苏联是否能在七十年代结束以前避免其领导集团经历某种不稳的时期，看来还是疑问。如果这个假

^① 关于苏联继承问题的一篇资料丰富的讨论，请参阅格雷·福内特“苏联继承问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共产主义问题》，1973年3—4月，第二十四卷，第二期，第1—21页）。

设是正确的，那么所发生的变化可能会对东欧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如果先例是可据以作出判断的事情，这里当然也不例外。斯大林的逝世终于使东欧出现严重的动乱；赫鲁晓夫罢黜后三年多时期领导人员的真空状态导致了从苏联人观点来看不稳定局面的严重滋长。但过去的先例也并未表明，继承过程是动乱还是平稳，其间出进很大。在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集团有一个长期的危机；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之后的继承问题却是经过巧妙的安排而完成的。

虽然在勃列日涅夫自动离职之后可能发生危机，但即使不发生危机——比如说，仍旧掌权的老干部作出领导集团内部的安排——勃列日涅夫在东欧贯彻的团结一致政策也很可能会沿着上文概述的方针更其加速进行，但执行这种政策的统治者们比以前怀有更大的忧虑，并且缺乏勃列日涅夫在其统治年代所取得的威信。至少在短期内，即使寡头政治集团一位比较年轻的成员掌握控制权，也很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因为在国内享有威信以前，他大概不会采取冒险的行动步骤，即使他心里想这样做。因此，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的东欧政策仍会维持下去，但它的步伐将比以前来得快，所采用的方法不会过于讲究。

然而，如果象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样，苏联出现长期的继承问题危机，那么我们就很难看出，勃列日涅夫曾经十分精心地开始安排的一体化基础将经受住东欧国家关系上和国内方而重新冒头的离心力的动摇而不致圯倒，因为不管那些离心力多么不露形迹，它们根本没有被消除。归根到底，那个基础将仍然残缺不全，相互依存的关系还十分脆弱。不是六年

甚或十年，而很可能是需要三十年或多一点时间的耐心建设才能使人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的一体化进程的持久性感到有些信心——甚至在那个时候也未必就是确实无疑。考虑到东欧地区情况各异，需要、动机和愿望颇有差别，苏联的政策命令是否能同真正东欧的发展不发生矛盾，更不必说相协调，还是个很大的疑问。

那么，具体地说，如果苏联出现严重的继承问题危机，东欧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1. 苏联的威信在整个东欧将急剧下降。

2. 大多数的领导集团在密切注视莫斯科逐渐演变的局势时，多半会滋生一种初步的紧张不安的情绪和静观其变的态度。在有些领导集团，这种捉摸不定的事情可能使公开的派别活动死灰复燃。

3. 由于比以前有了较多的自由，一些领导集团——也许是波兰的、匈牙利的、甚至东德的——将开始按照比较合乎本国需要的方针调整它们的政策，并且由于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组成的一体化结构趋于削弱，这种调整政策的工作变得容易进行。罗马尼亚大概会借此机会进一步减轻它对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承担的义务。（如果南斯拉夫本国的继承问题与苏联的继承问题大致同时发生，那就会容易解决得多。）

4. 那时欧洲国家的集团和联盟组织可能会不受阻挠地开始形成。特殊的关系——例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系，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关系——多半会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以前被苏联的统治所约束的民族仇恨——例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关于马其

顿问题——可能会突然猛烈地爆发出来。

5. 在经济方面以及较小的程度上在政治方面，一些国家——显然有罗马尼亚，但或许还有波兰和匈牙利——将谋求同西方进行比较密切的合作。在东欧所有的国家，会出现要求实现这一方针的强大社会压力。

6. 在国内事务方面，政府最初的紧张不安可能导致对有关国家的社会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特别在波兰，但或许也在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种措施可能引起广泛的不满甚或暴乱。万一由于同苏联的经济合作出现故障而产生种种麻烦，随之而来的经济苦难肯定会引起人民群众普遍的不满。或者，在大多数或所有的领导集团中，有些或员会竭力主张在国内采取放宽的政策而对苏联采取一种直言不讳地维护本国主权的政策。这样做无疑地将使他们显得更有正统性并受到民众的欢迎。直接受领导阶层统辖的许多经济和技术知识分子将力求采用或重新采用现已放弃或经过修改的经济改革方案。

这些可能性未必都能变成现实。但其中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却或许会变成现实。许多事情可能单独地或互相配合地导致对苏关系方面的严重摩擦，甚至达到引起军事干涉的地步。然而，即使不需要进行军事干涉，从继承问题危机中胜利地崛起的苏联领导人中间的那位领导人或许也必须再次开始从事没完没了的艰苦工作，为东欧规划一种团结一致与独立生存相结合的体制。与此同时，对东欧实行一贯的西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实行这项政策的必要性将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

文献目录：兰德公司关于 东欧的出版物

R.V.伯克斯：《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技术革新的政治变化》，兰德公司，RM—6051—PR，1969年8月。

同上：《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和前途》，兰德公司，P—4761，1971年10月。

F.W.厄马思：《国际主义、安全和正统性：对苏联在东欧利益的挑战，1964—1968年》，兰德公司，RM—5909—PR，1969年3月。

W.E.格里菲思：《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东欧》，兰德公司，P—3983，1968年10月9日。

A.R.约翰逊：《南斯拉夫的前途》，兰德公司，P—5243，1974年5月。

同上：《波兰的暴乱和哥穆尔卡的垮台》，兰德公司，P—4615，1971年4月。

同上：《波兰共产党领导集团中的权力斗争，“三月事件”——一个时代的结束》，兰德公司，P—4238，1969年11月。

同上：《中苏关系和南斯拉夫，1949—1971年》，兰德公司，P—4591，1971年4月。

同上：《华沙条约组织争取“欧洲安全”的运动》，兰德公司，R—595—PR，1970年11月。

同上：《南斯拉夫的总体国防》，兰德公司，P—4746，1971年12月。

A.罗斯·约翰逊和L.泽卡尔斯：《苏联和东欧国家关于欧洲安全的预测：摘自1972年瓦尔纳会议文件》，兰德公司，R—1272—PR，1973年6月。

T.W.沃尔夫：《苏联的权力和欧洲，1945—1969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70年。

同上：《华沙条约组织的演化性质》，兰德公司，RM—4835—PR，1973年6月。

同上：《华沙条约在苏联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兰德公司，R—1272—PR，1973年6月。

同上：《苏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策略上和军事上的利害关系》，兰德公司，P—4549，1971年1月。